大师
谢晋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大师谢晋》 内容简介
- 《大师谢晋》 连载目录
- 《大师谢晋》 引子
- 《大师谢晋》 童年时期（1）
- 《大师谢晋》 童年时期（2）
- 《大师谢晋》 中学生涯
- 《大师谢晋》 离家出走（1）
- 《大师谢晋》 离家出走（2）
- 《大师谢晋? 美丽的初恋（1）
- 《大师谢晋》 美丽的初恋（2）
- 《大师谢晋》 重庆岁月（1）
- 《大师谢晋》 重庆岁月（2）
- 《大师谢晋》 《女篮5号》（1）
- 《大师谢晋》 《女篮5号》（2）
- 《大师谢晋》 《女篮5号》（3）
- 《大师谢晋》 找火辣辣的大眼睛（1）
- 《大师谢晋》 找火辣辣的大眼睛（2）
- 《大师谢晋》 找火辣辣的大眼睛（3）
- 《大师谢晋》 找火辣辣的大眼睛（4）
- 《大师谢晋》 慧眼识陈冲
- 《大师谢晋》 朱时茂当“牧马人”
- 《大师谢晋》 不满从珊“激情戏”
- 《大师谢晋》 争夺“花环”（1）
- 《大师谢晋》 争夺“花环”（2）
- 《大师谢晋》 改“花环”苦熬十天
- 《大师谢晋》 唐国强毛遂自荐
- 《大师谢晋》 武珍年东北逮“老虎”
- 《大师谢晋》 “花环”练兵（1）
- 《大师谢晋》 “花环”练兵（2）
- 《大师谢晋》 “花环”实战（1）

- 《大师谢晋》“花环”实战（2）
- 《大师谢晋》“花环”实战（3）
- 《大师谢晋》轰动观众（1）
- 《大师谢晋》轰动观众（2）
- 《大师谢晋》确定《芙蓉镇》演员（1）
- 《大师谢晋》确定《芙蓉镇》演员（2）
- 《大师谢晋》锁定“芙蓉”外景
- 《大师谢晋》刘晓庆姜文成“搭档”
- 《大师谢晋》谢晋片场戒酒
- 《大师谢晋》转移“芙蓉”阵地
- 《大师谢晋》“芙蓉”一波三折（1）
- 《大师谢晋》“芙蓉”一波三折（2）
- 《大师谢晋》酝酿“贵族”（1）
- 《大师谢晋》酝酿“贵族”（2）
- 《大师谢晋》酝酿“贵族”（3）
- 《大师谢晋》林青霞爽约“贵族”（1）
- 《大师谢晋》林青霞爽约“贵族”（2）
- 《大师谢晋》林青霞爽约“贵族”（1）
- 《大师谢晋》林青霞爽约“贵族”（2）
- 《大师谢晋》林青霞爽约“贵族”（3）
- 《大师谢晋》“贵族”赴美谢晋抠钱（1）
- 《大师谢晋》“贵族”赴美谢晋抠钱（2）
- 《大师谢晋》谢晋大骂潘虹“混蛋”（1）
- 《大师谢晋》谢晋大骂潘虹“混蛋”（2）

《大师谢晋》 内容简介

《大师谢晋》是导演谢晋生前唯一认可的个人传记。作为谢晋生前好友，作者顾志坤先生揭开了寻常人所不知的大师谢晋在影坛燃烧五十年的情感和心路历程，还原了一个完整的最真实的谢晋。《大师谢晋》娓娓讲述了谢晋如何从一个喜爱读“闲书”的懵懂少年，到叱诧国际影坛的一代宗师，如何成长为一个电影时代的典型代表，树立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本。从让人眼睛一亮的《女篮五号》到让人热泪盈眶的《鸦片战争》，谢晋充满着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精神的影片，始终受到万人瞩目。《大师谢晋》一书带您重温经典之旅，感受大师谢晋的大情大义、心理纠结和强烈似火的爱国主义情操，看大师谢晋轰轰烈烈的“生命的燃烧”。

作为重庆出版集团天下图书公司隆重推出的精品图书，《大师谢晋》一书内容丰富精彩，内含谢晋成长过程中鲜为人知的老照片、珍贵的生活照以及谢导所拍影片的剧照等。同时《大师谢晋》囊括以下精彩内容：

动荡岁月的叛逆少年：谢晋的传奇伊始

白色恐怖下才子佳人的传奇爱情

《红色娘子军》：寻找“火辣辣的大眼睛”

师生情重：谢晋慧眼识陈冲

不满丛珊床上戏，谢晋大为光火

好事多磨《芙蓉镇》：与刘晓庆的银幕之缘

谢晋永远的遗憾：与林青霞的失之交臂

结缘《清凉寺的钟声》：谢晋与日本女星栗原小卷的忘年之交

《大师谢晋》 连载目录

连载目录

大师谢晋一

这是1925年仲冬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夜晚，这个夜晚，对许多人来说，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对于东晋名相谢安第五十四世孙的谢晋来说，则是他漫长而曲折人生道路的开始……

引子

一、童年时期（1）

一、童年时期（2）

二、中学生涯

三、离家出走（1）

三、离家出走（2）

大师谢晋二

这一天，江安女中初中部17岁的女生徐大雯从学校的矮墙边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人，一个身材高大，英俊潇洒的人，这个人后来改变了徐大雯毕生的命运，同时，这个人后来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就是谢晋。这一年，谢晋还不到20岁。

一、美丽的初恋（1）

一、美丽的初恋（2）

二、重庆岁月 （1）

二、重庆岁月 （2）

三、迎娶新娘

大师谢晋 三

现在，谢晋的机会也来了，而这种机会，对一个导演来说，即使在一生当中，也不会很多，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个导演拍什么片子，不是由自己说了算数，而是由上面分配下来，点到谁就是谁，就像荐

头行里的老妈子等候雇主挑选那样。现在，上面把拍摄《女篮五号》的任务交给了谢晋，接下来，就要看谢晋如何去拍这部片子了。

一、《女篮5号》（1）

一、《女篮5号》（2）

一、《女篮5号》（3）

一、《女篮5号》（4）

二、为“娘子军”寻找火辣辣的大眼睛（1）

二、为“娘子军”寻找火辣辣的大眼睛（2）

二、为“娘子军”寻找火辣辣的大眼睛（3）

三、 慧眼识陈冲

四、朱时茂当“牧马人”

五、不满从珊“激情戏”谢晋大为光火

大师谢晋 四

任何一场正义的战争，都会在这场战争的进行当中或结束之后，催生出与这场战争同样辉煌和伟大的文学作品。16天的战争，铸就了16天的辉煌，而16天的辉煌，则成了文艺家们创作中取之不尽的源泉和宝藏。

一、 争夺“花环”

二、 李准改“花环”苦熬十天

三、 唐国强毛遂自荐

四、武珍年东北逮“老虎”

五、“花环”练兵（1）

五、“花环”练兵（2）

六、“花环”实战（1）

六、“花环”实战（2）

六、“花环”实战（3）

七、“花环”亮相轰动观众（1）

七、“花环”亮相轰动观众（2）

大师谢晋五

正在这时候，他收到了一份电报，电报打出的地点是长春，他拆开一看，是刘晓庆打来的，电报的第一句是：“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想演胡玉音……”短短的电报中，一连用四个“非常”，谢晋禁不住笑了。

一、确定《芙蓉镇》演员（1）

一、 确定《芙蓉镇》演员（2）

二、锁定“芙蓉”外景

三、刘晓庆姜文成“搭档”

四、谢晋片场戒酒

五、转移“芙蓉”阵地

六、“芙蓉”一波三折 （1）

六、“芙蓉”一波三折 （2）

大师谢晋 六

可见，对自己在晚年走变法之路，谢晋是充满着何等的信心和决心。正是这信心和决心，才支撑着谢晋在古稀之年向广大的观众奉献出一部又一部不同凡响的力作，并用自己的心血、汗水乃至生命，浇铸着中国光辉灿烂的电影丰碑。

一、 酝酿“贵族”（1）

一、 酝酿“贵族”（2）

一、 酝酿“贵族”（3）

二、 林青霞爽约“贵族”（1）

二、 林青霞爽约“贵族”（2）

三、 赶潘虹“上架”（1）

三、 赶潘虹“上架”（2）

四、“贵族”赴美谢晋抠钱（1）

四、“贵族”赴美谢晋抠钱（2）

五、 谢晋大骂潘虹“混蛋”

《大师谢晋》引子

大师谢晋一

这是1925年仲冬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夜晚，这个夜晚，对许多人来说，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对于东晋名相谢安第五十四世孙的谢晋来说，则是他漫长而曲折人生道路的开始……

引子

民国十四年仲冬，即1925年冬天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会稽上虞县的一个海边小镇谢家塘已进入了沉沉的睡乡，只有在该镇宋景畈村那处围着高墙，紧闭着大铁门的谢秉初先生家的客堂里，还透出些许微弱的烛光。客堂很大，像所有这一带的大户人家的摆设一样，堂中是一张红木八仙桌，两侧一溜太师椅，桌后面是一张两边微微翘起的搁几，搁几上供奉着一尊瓷质的观世音菩萨，在袅袅的香烟和摇曳的烛光中，观世音菩萨面慈目祥，爱光融融。在搁几后面，是一堵高大的略显微黑的壁板，壁板上挂着一幅不知由谁画的文靖公巨像，经过装裱的画像上已有些斑驳泛黄，想必已有些年代了。像的两侧是一幅同样不知由谁书写的对联：天下奇观书卷好，世间美味菜根香。此联不俗，在龙飞凤舞的字行间里，流露出谢氏祖辈的高洁操守和对后人的殷切期盼。

客堂里坐着的人大多都上了年纪，他们是谢安第五十二世孙谢秉初、谢椒生以及各房房长、董事谢宗长、谢炳贤、谢鼎泰、谢仲龄、谢桂芳、谢洪绪、谢永顺、谢惠塘诸君。这些人是这一时期谢氏盖东支家族当中的掌门人物，他们今天要完成一件对谢氏家族来说至关重要的大事，就是要将已经中断了六十余年的谢氏家谱续修完成。为此，他们专门邀请了浦江籍的清戊子科举人，年已75岁高龄的续谱高手张晋鑑先生担此重任。在定稿之前，由张晋鑑先生照本宣读。读到族谱中《盖东宗支图略》一节时，张晋鑑先生稍稍停顿了一下，呷了一口浓浓的香茶，因为他即将要读到的是这个族谱中的最后一个人，

这个人出生于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今天才两岁，尚在襁褓中。于是他读到：“廿三世，镇方，又名晋，号淝捷，民国癸亥十月十四生。”读毕，张晋鑑先生将族谱轻轻地合拢，用那双混浊昏花的老眼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包括谢洪绪的脸上，谢洪绪号佐清，又称佐清公，是那位刚入谱的小儿的祖父。各位颔首微笑，重修的族谱终于通过。

这是1925年仲冬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夜晚，这个夜晚，对许多人来说，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对于东晋名相谢安第五十四世孙的谢晋来说，则是他漫长而曲折人生道路的开始……

《大师谢晋》 童年时期（1）

一、童年时期（1）

历史是迷人的，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在研究某个家族盛衰的时候，总会不知不觉地将这个家族的兴衰与所处的时代、这个家族的背景乃至这个家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

西晋末年，当世居河南陈留阳夏，在朝任国子监祭酒的谢衡因北方战乱，率谢氏一族迁居会稽始宁县（今上虞市）的东山脚下时，有一位云游的高僧路经山下，抬头一望，只见东山上云雾缭绕，怪石嶙峋，时有紫气从参天的苍林间透向天际，便颔首道："此乃文武将相之地也。"果然，没过多久，这山上后来便出现了像谢安这样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像谢玄这样有名的骁将，像谢道韫、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后来，已茂于江南的谢氏一族由东山迁居到盖东谢家塘聚族而处的时候，谢家祠堂的后面，正好是岿然特峙、高出重霄的夏盖山。电影界泰斗大导演谢晋便出生在这里。谢晋既出生于这样一个名门望族，而且又是长房长孙，因此，从祖父佐清公，到父亲谢春溥及各房长辈，对他的出世，都倾注了极大的钟爱并寄予了厚望，就连他的名字，也浸淫着长辈们的苦心和寄托。他的小名叫镇方，正式的名字叫晋，号淝捷。晋，即东晋，淝捷，即淝水大捷。他们的老祖宗谢安在东晋为相时，以八万之众击溃苻坚百万大军，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佐清公给孙子取这个名字，其苦诣婆心，不言而喻。

父亲谢春溥对长子的管教和庭训可以说是严厉的，虽然那时他的工作在上海，但每次回来，他总要对儿子进行极严厉的教诲。这种教诲有时是有的放矢的，因为他看到或听到了什么，有的则是泛泛而谈的，不过讲一些大道理而已。每当这时候，母亲总是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目光中流露出爱怜和温柔。只有祖父出来呵护他，祖父在当地是极有威望的人，他虽然没有当过官，但熟识的或不熟识的人都管叫他"佐清老爷"，因为大家知道他曾当过挂名的修候同知，其实他真

正的职业是教书先生，族谱中对他曾有很高的评价："读书稽古，重义尚侠，与徐烈士锡麟友善，建石塘、发仁粟、创小学、立自治、整理公益，栽培后进"。这里说的"与徐烈士锡麟友善"，1907年徐锡麟发动起义前后，当时很多人对革命党人唯恐避之不及，而与徐锡麟、秋瑾同在绍兴大通学堂执过教的佐清公却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在风声最紧的时候，徐锡麟还逃到他的家，躲避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佐清公不仅给秋瑾写了很多信，还冒险帮徐锡麟与秋瑾取得联系。光复后，佐清公成了当地的红人，连县太爷也上门来拜访他。因此，当地人只要说起佐清公，没有一个不佩服他，无论出了什么事，只要佐清公出场，都能很快平息。

若干年以后，谢晋在回忆童年时期的这段往事时，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他虽然生长在这个封建意识很强的大家族里，但由于祖父和父亲思想的开明，在他开蒙读书时，从未强迫他像一般人那样去念"三字经、百家姓"或去铭记科举八股之类的东西，而是允许他在课余的时候，读一些古典名著甚至科普读物之类的闲书。在他十岁生日时，他父亲竟然还送给他一套《小学生文库》。这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多达500余册的文库不仅激起了童年谢晋浓厚的阅读兴趣。还极大地开阔了他知识眼界。成为他人生道路上一个不可多得的启蒙教师。谢晋说他父亲的教师叫胡庆阶，他就是胡愈之先生的父亲。胡庆阶性格豪放，思想开明，曾任上虞县教育会会长，是当时上虞的维新派首领，由于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任职期间，曾极力主张开创女学，兴办新学堂等，所有这些，给他的父亲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同样，父亲也把这些新思想、新观念传导给了谢晋，使他年幼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他今后人生和艺术道路上追求进步、崇尚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他的童年时期，就在祖父和父亲给他营造的宽松环境下博览群书，从而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养，这为他以后攀登电影艺术的高峰，夯实了最初的基石。

同样，母亲陈振美对谢晋童年思想的形成也产生巨大影响。陈振美是余姚马诸镇上一位大户人家的千金，家中除了有许多田产外，在北京、上海还开着多家银楼和钱庄，当时一些啸聚山林的强盗，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八十八团团长田胡子（田岫山），把陈家看做是一块肥肉，经常从四明山下来，到陈家敲诈勒索，后来干脆明夺暗抢。陈振美是这个家庭当中最小的一个女儿，也是谢晋外婆最宠爱的一个女儿，因为宠爱，外婆甚至允许女儿在缠脚之后又重新放开，在这陈家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先例的。民国7年，即1918年的一天，年方二八的陈振美经媒人牵线，与同样年龄的谢春溥订了婚。一个是出身名门望族的少年公子，一个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大家闺秀，因此，这桩婚姻一经传开，便在当地引起轰动。

转眼又过了两年，即民国十年，世道有些太平，佐清先生和龙店王经过几次磋商，决定给两个孩子完婚。这一年谢春溥和陈振美都是18岁。结婚那天，一乘顶上装有“五岳朝天”锡制饰物的大轿，将谢家企盼已久的新媳妇抬了过来，前面有大红灯笼开道，后面是浩浩荡荡长达六里的抬嫁妆的队伍。新媳妇下轿时，谢晋的祖母，也就是陈振美的婆婆在谢家铺着红地毡的正堂门前接受新媳妇跪拜的时候，悄悄地对旁边的佐清公笑着说：“相貌倒不错，就是脚大点。”

《大师谢晋》 童年时期（2）

一、童年时期（2）

新媳妇进门，不仅是佐清公一房的喜事，也是整个盖东谢氏家族的喜事，于是各户长幼，远亲近邻，纷纷前来贺喜。就在陈振美进门后的第三年，她便给已经等得有点心急的谢家生个了虎头虎脑的胖儿子，他就是谢晋。这一天是民国十二年的10月14日，是金秋一个天高云淡阳光灿烂的好日子。

谢晋的出生，对陈振美来说，多了一根生命中的精神支柱。她认为，儿子的命运与她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因此，当她由孝顺媳妇的角色转换成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她几乎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投放到相夫教子中去了。

儿子开始牙牙学语了，儿子开始会走路了，儿子要读书了，所有这一切，都牵系着陈振美作为母亲的心。这期间丈夫谢春溥已去上海电器公司工作，教育孩子的重担，自然地落到了陈振美的肩上。当然，这对知书识字，甚至熟读了不少唐诗宋词的她来说，算不了什么，难的是对儿子人格的教育。儿子好学，她听了高兴，儿子好动，她心里不安，生怕有个什么闪失，不好向谢家和丈夫交待，有好几次，她是把儿子从演“草头戏”的台下找回来的，看这种粗俗的乡下戏，对谢家的子孙来说，是有失身份的。为此，她曾狠狠地教训了儿子几顿。她常常用最朴素的语言教育儿子要自爱、自立、要奋发向上，要尊敬长辈，要善待穷人。而所有这一切，她又往往从自身做起。在家里，对长辈，她是公认的孝顺媳妇，对丈夫，她是公认的贤惠妻子，对儿子，她是公认的慈爱母亲，而对穷人，她又是公认为最具菩萨心肠的人。在家里无论做长工的或做短工的穷人，经常会得到她资助的衣物，而这一切，对童年时期的谢晋来说，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陈留小学，他常常学着母亲的样，将自己多余的文具用品送给同学们，有的同学因家境贫穷，常常饿着肚子来上学，谢晋看到

后，就会趁课余时，到家里拿来食物给饿肚子的同学吃。可以这么说，谢晋这些美德，就是在母亲潜移默化的教育下养成的。数十年以后，已成为大名鼎鼎电影导演的谢晋与笔者说起这段往事时，不无感慨地说："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艺术家，小的时候，我从我的祖父母，我的父亲、母亲身上受到了人道主义的教育，走上从艺道路以后，我从许多优秀电影，如《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当中受到了启发。我认为，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时候，对人的爱，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谢晋于1932年离开老家谢家塘，随母亲及大姐善芳、大弟治方一起去上海与父亲团聚，这一年他八岁，正好读小学二年级。已升任为上海电器公司总会计师的父亲专程来乡下接妻子和儿女，行李不多，不过是一些衣物细软，但祖父和父亲送给谢晋的那口还崭新的小书橱——"小学生文库"还带着，虽然很重，但500本书一本也不能失少，这是谢晋的宝贝，不论到什么地方，他都会带着它。

他们上海的新家在宁波路。房子不高，是两层楼的石库门房子。住惯了老家谢家塘那花园般宽敞的房子，这地方简直就像鸟笼一样的狭小和气闷。尤其令谢晋不适的是，这里没有乡下那样的树木，没有自家天井中那满地都是的青翠欲滴的花草，没有婉丽啁啾的小鸟。这里的房子是灰色的，这里的灯光是炫目的，这里的人互相不搭界。谢晋感到很不习惯。

母亲觉察出了儿子情绪的变化，从内心来说，出生于乡间大家闺秀的她，也不适应这大都市繁杂而烦躁的生活，但看到儿子放学回家后一脸的不开心，她心里也忧虑，她有点怀念起家乡的那些"草台班子"了，因为儿子喜欢看这样的戏，每次当她板着面孔将儿子从戏台下拉出人群时，儿子总是恋恋不舍地不肯走，而现在，这里有什么东西可让儿子产生兴趣呢？这里有电影，但这由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玩意儿他们从未见识过，虽然它在四十年前就已在上海生根开花。也不知道儿子喜欢不喜欢。于是她拣了一个星期日，将儿子穿戴得干干净净，来到了同孚路附近的一家电影院。当时上海的电影院已很

多，上乘的也不少，如海宁路上的维多利亚大戏院，四川路上的爱普庐影戏院、新爱伦大戏院、上海大戏院、南京路上的夏令配克大戏院（今新华大戏院）、大光明大戏院等。但由于这些戏院设施好、价格贵，一般老百姓光顾不起，因此，陈振美母子只好到一些档次较低的戏院里去看。

陈振美第一次陪儿子看的电影叫《姐妹花》，儿子一开始不懂，她就将儿子搂在自己的怀抱里，为他作着启蒙的讲解，而每当这时候，她总会看到，在影院昏暗的灯光下，儿子的那双眼总会睛睁得老大老大，他的小脸也会随着母亲柔声的讲解，呈现出各种天真的变化来。这一时期，他们母子俩究竟看了多少部电影，已很难说清楚。而影响较深的，似乎有《魂断蓝桥》、《关东大侠》、《荒江女侠》、《摩登时代》、《人猿泰山》和《桃花劫》、《大路》等。总之，只要有新电影，他们都去看，而且看得很入迷。这些电影，对当时年幼的谢晋来说，未必全能理解，但有一点可?肯定，这些电影，对以后引导谢晋的心灵走向艺术的殿堂，并且在日后将自己毕生投入到电影艺术中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师谢晋》 中学生涯

二、中学生涯

1937年夏，已移居上海四年并在上海小学毕业的谢晋在度完暑假以后就要升入初中读书了。这时候，父亲谢春溥和母亲陈振美几乎在同时想起了一所有名的学校——上虞春晖中学，这所由著名国民党元老、教育家经亨颐（子渊）先生创办的中学，因学校环境优美，办校方针新颖，而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许多莘莘学子纷纷慕名前来求读。因此，把年已13岁的谢晋送到这样的一所学校里去读书，是再理想不过的了。

1937年是个多事之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就在谢晋到春晖中学不久，杭州就告陷落，地处沦陷区浙西的一些学校当时只好被迫停课、迁校。相对来说，宁绍一带这时还比较安全，因此，许多沦陷区的学生便纷纷前来春晖求学，一时学校的学生剧增，热闹非凡。

抗日战争的烽火，随着1937的过去和1938年的来临，在全国各地越烧越旺。从外面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坏消息：日本鬼子在南京实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被杀人数不计其数。大家的心里都清楚，日本鬼子的铁蹄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谢晋在这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收到了父母的来信，从下学期开始，他将转到上海读书。这个决定，对谢晋来说，似乎是太突然了些，因为从内心里来说，他对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学校已产生了深深的感情，这里的老师，这里的同学，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吸引着他，激动着他。但学校里正在传播的日本鬼子即将进攻浙东的坏消息，已经得到了证实，过不了多久，这块美丽的土地，也要被敌人蹂躏了。因此，转到上海读书，也是不得已的事。

谢晋怀着惆怅和无奈的心情离开了春晖中学，在家人的陪同下向校长及教师和同学们告别。在离开春晖中学的最后时刻，他怀着依依

不舍的心情再一次回头怅望：春晖中学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碧波荡漾的白马湖中。湖畔，夏丏尊先生的“平屋”、丰子恺先生的“小杨柳屋”、经亨颐先生的“长松山房”、何香凝先生的“双清楼”和李叔同先生的“晚晴山房”等形态各异的建筑在明媚的日光下，多姿多彩，熠熠生辉。而在谢晋心中更加辉煌灿烂的则是在这里曾结集过的那些中国最具影响的文化巨匠们，他们是：经亨颐、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匡互生、朱光潜、扬贤江、王任叔、范寿康、何香凝、张大千、柳亚子、蔡元培、黄炎培、俞平伯、刘大白、刘薰宇、刘叔琴、赵恂如、冯三昧、吴梦非、沈泽民等。谢晋和同学们正是在这些文化巨人的熏陶下，接受了文化的甘露，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启蒙。现在日本鬼子就要来了，他们不仅要践踏我们国家的大好河山，还将剥夺谢晋和同学们读书的权利。这个历史的耻辱，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38年10月初的一天，即将开学的上海浦东中学来了一位个子很高，但又略显瘦削的中学生，他就是谢晋。他从老家上虞的春晖中学转学到上海读书。按当时上海教育当局的规定，凡从外地中途转学到上海的学生，不论他在原校的成绩如何，一律都要经过考试，合格后方能录取。在校长办公室，稚气未脱的谢晋红着脸，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校长递上了他的一份简历。谁知校长看了他的简历后，脸上便露出了微笑，和蔼地对他说：“谢晋同学，你被录取了，凡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转学过来的学生，我校一律免考，因为，我们信得过那里的老师，也信得过他们教育出来的学生。”

谢晋在上海浦东中学也只读了一个学期的书，因为日本的侵华战争已全面展开，武汉上海相继陷落，市面上混乱不堪，已于一年前被国民党交通部派驻香港的谢春溥与妻子反复商议后，决计还是将儿子送出上海为好，当然再回上虞老家，已是不可能了，因为萧甬线已全面沦陷，日本鬼子实行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变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许多乡下人都纷纷来上海逃难，没想刚逃出虎口，又落入了火坑。因此，左右盘桓，谢春溥夫

妇认为还是将儿子送到香港读书，是为上策。经过多方联系，好不容易在香港的思思中学找到了门路。原以为可以有一段平静的读书日子，没想读了还不到一年，战争形势发展很快，香港的命运也危在旦夕，在万般的忧虑和无奈之中，谢春溥夫妇又只好将儿子从香港接回上海。

这时已是1939年的9月，年仅15岁的谢晋已发育成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在家里度过了漫长而焦虑的暑假，父亲又在上海大夏中学为他报了名。不过，这时候，谢晋已经初三毕业，下个学期，他就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了。

在大夏中学大概读了一年，谢晋又在1940年9月，转入到上海稽山中学读书，其实这是有名的绍兴稽山中学的一所分校，它创办于1932年9月，也就在“九一八”事变后，是由当时绍兴的学界名人和乡绅朱仲华、金汤候、姚慧尘、徐柏堂、陈洁人、张琴荪、刘振等人创立的。学校以管理严谨，校风正派，思想开明，讲究质量而闻名。一向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甚至有点苛刻的谢春溥不厌其烦地为儿子物色这样一所学校，其良苦用心，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谢春溥感到，摆在他儿子面前的不外乎是两条不同的路，一条是继承父业，弃学经商，再一条就是继续升学，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路，但经商，谢晋的祖父一向就不同意，对这个长房长孙的前程，老人家是寄予厚望的。他虽不奢望孙子日后能成为出将入相、重振谢门雄风的英雄，但起码也该是一个知书识礼，能光宗耀祖的君子。因此，无论是佐清公也好，还是谢春溥也好，或是谢氏其他的房头也好，都希望谢晋能继续读书，将来读出名堂来，谋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但世上的事，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的事，你明明觉得应该这样做，但结果却又是另外一回事。谢晋的长辈们一心期望谢晋走一条读书入仕的路，但结果是，这个被长辈们一向视为听话的并

且寄托着厚望的孩子，竟会背着他们走一条与他们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路。

《大师谢晋》 离家出走（1）

三、离家出走（1）

1941年7月，十八岁的谢晋从绍兴稽山中学上海分校高二级毕业，他在这所学校断断续续读了两年，但在读完了高二之后，他就再也无法回到这所学校里去了，因为这年的年初，日本人占领了上海英法租界，他们强令学校向日伪立案，自然遭到了稽山中学师生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抵制。于是就在日伪人员的百般干扰和破坏下，上海分校在上完最后一堂课后宣布结束。那一天，谢晋和其他师生一样，默默地坐在教室里，大家心事重重，谁也不愿离开。这时老师宣布："同学们，从明天起，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了，不是我们不想教书，也不是我们不想读书，而是日本鬼子不让我们教书和读书，让我们记住这个屈辱的日子吧"。老师说到这里，早已泣不成声，谢晋和同学们也都流下了眼泪。这时，不知是谁轻轻地哼起了学校的校歌来，接着大家也都跟着唱起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稽山风景清幽，卧薪尝胆，有志竟酬，光荣历史长流，莘莘学子，负笈来游，相期远绍旁搜，缅怀先烈，品学勤修，会看轶美加欧。"

暑假在闷热的天气中和重重的心事中很快过去了。按照常规，度完了暑假，谢晋就该去考高三，但谢晋的眼光似乎并没有放得那么远。就在父亲和母亲为他的锦绣前程精心筹划的时候，他却在一天的晚餐时，向父母突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从下个学期开始，他不打算再读高三，而准备去考上海的戏校。正在吃饭的父母以为儿子在说昏话，自然不加理睬，但当儿子又重新宣布了这一决定之后，才将十分惊愕的目光投向了儿子。他们发现，儿子的脸是认真的，因为认真，原先红喷喷的脸今天显得有些苍白。谢春溥将饭碗放下，胖胖的脸因为气恼而有些发抖，他待自己稍稍镇静了一下后问道："为什么要去考戏校"。儿子答："我喜欢"。谢春溥又问："你记得爷爷说过的话吗，他说你长大后，一不要炒股票，二不要当戏子，难道你都忘了

么？”儿子说：“我没忘，但我想，做戏子也有出息的。”说毕，谢晋偷偷地瞧了瞧母亲，母亲被儿子这样的决定吓坏了，她想不到，这个平日话语不多的孩子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这太令她失望了，她想狠狠地教训儿子一顿，但一看到儿子那满脸委屈的样子，她的心又软了下来。毕竟，儿子还太小，他作出这样的决定或许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或是受了别人的唆使，待过一些时日，再慢慢地劝导他。

消息很快传到了乡下。乡下的反应似乎比上海更激烈，首先是族里的长辈们，当他们得知上海这个乳臭未干的族孙竟执意要报考戏校的消息后，竟气得脸色煞白，胡须抖翘，嘴里连连地叫道：“唉，败家子，败家子。”其他几个住得较远的房头长辈也闻风赶到谢家塘，大家神情严峻，有大骂谢晋“败坏门风”的，有批评佐清公家教不严的，有提议将谢晋从谢氏家谱中除名的，也有指责谢春溥纵容儿子的。说起谢春溥纵容儿子这一点，他们是有根据的，早在一年前，他们就已得知消息，春溥的这个儿子在学校里参加了一个什么业余戏剧活动，还扮演了岳云的角色。他们认为谢家门里的风水要被这个小子破坏了，以前日本人破了谢家祖宗坟头的风水，现在谢晋这小子则破了谢家门里的风水，怪不得谢家门里的人一直没有在朝廷做官，只有在戏台上做官。为此，他们曾派人和去信，严厉地指责谢春溥，叫他别只顾做生意赚银洋，得好好管管自己的儿子。春溥后来来信说，这事只不过是小孩子玩玩，并不当真的，并保证不让谢晋再上舞台去“胡闹”，这场风波才平息。谁知还没过几个月，又听说这小子在学校里竟偷偷地考上了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和金星电影训练班，拜什么黄佐临、吴仞之等人为老师。虽是业余的，但仍是做戏子的勾当。族里的长辈们更是气急败坏，想他们谢家，自文靖公以来，凡一千余年，可以说是英才辈出，但就是没有出过戏子。如今，这不肖之子竟大言不惭地，说做戏子也有“出息”，这事若是传到外面，堂堂谢氏门面，还往哪儿放？

这些各房的长辈们，一边怒气冲冲地在家里大骂谢晋，一边在想着法子：如何才能去上海教训这个不听话的小畜生。

谢春溥在家里也长吁短叹，想到伤感处，禁不住热泪纵横，如果说，以前他曾对这个自己最宠爱的长子抱着最大希望的话，那么，现在，则只有深深的失望了。可以这么说，这件事对他的刺激是很大的。他万万想不到，这个自己平素最喜欢、认为最有出息的儿子，竟会在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叛逆者。不错，谢氏家族的族规是很严的，按照族规，这个儿子将毫无疑问会被从族谱上除名，但他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这使他在失望之余更增添了几分忧虑，他觉得，儿子走到这一步，他做父亲的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太袒护儿子，凡事总是站在他这一边，从而弄成了儿子性格的倔强和在选择人生道路时的草率和固执。但谢春溥恰恰没有想到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与儿子之间在选择人生道路上的矛盾，其实是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是代表两个时代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矛盾，是很?调和的。

1941年年关前的一天，天气阴沉，寒风凛冽。在同孚路上的一幢石库门的二楼上，谢春溥的脸色分外难看，就像外面的天气一样，阴沉而灰白，甚至还有些苍白。他今年还不到四十岁，正是盛世年华，但看上去他却显得是那么的疲惫不堪，那么的忧心忡忡，这是可恶的社会和时局给他烙下的印记。还有就是他的儿子给他带来的创伤。

对于谢春溥来说，他儿子谢晋给他带来的创伤似乎是难以愈合的。虽然后来，他原谅了儿子，但那是一个父亲对自己亲生骨肉的宽容和本能的接纳，从根本上说，即使到死，他仍然认为儿子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在数十年后那个充满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当上影厂反动学术权威对谢晋的父亲谢春溥和母亲陈振美进行不堪忍受的折磨和侮辱，先后愤然自杀的时候，他的这个念头肯定会更加强烈。当然，这是后话了。

《大师谢晋》离家出走（2）

三、离家出走（2）

一天，谢晋离家出走，不辞而别，这给他上海的家庭和谢塘老家带来的震动、恐惧和气恼是可想而知的。谢春溥和陈振美还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谢春溥认为儿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做母亲的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谁让她经常带着儿子去看电影呢，有时一天还要看好几场，现在好了，儿子入迷了，走了，你到哪儿去找他。虽然，儿子也给家里留下了一封信，但去哪里，他没有说，处在当时混乱的时局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突然离家出走，而且还带着意气，其后果不堪设想。起初，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小孩子与大人闹别扭时的惯用手法，因为在当时，这种少男少妇离家出走的新闻在沪上的报屁股上登得满满的，但过些天，这些几行字的小广告就突然消失了，这说明，那些意气用事的孩子们重又回到了亲人的身边。凡是与佐清公一家有联系的人，不管是姓谢的还是不姓谢的，谢春溥均以最快的速度，以各种方式与他们取得联系，就像梳头一般，几乎梳了个遍，他估计，这个淘气的孩子一定是躲在某个亲戚的家里，不出几天，他一定会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所有反馈回来的信息均令他大失所望。这才使他有点恐慌起来，而在老家谢塘的长辈们又隔三差五地来信，频频催问谢晋的下落，字里行间，谢春溥感觉到了那一颗颗忧急如焚的心。是啊，作为晚辈，谢春溥是最能体味长辈们的心情的，但是，作为自己的儿子，谢晋是否也会体味自己的心情呢？不错，谢春溥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他又承认自己是个很封建、很重孝道的人，他信奉“父母在不远游”这条古训，但是这条谢家自古以来一直遵循的古训被自己的儿子破坏了。

直到这时候，谢春溥才真正预感到，儿子可能已经不在上海了，可他会去哪儿呢，以前他从事业余演出的剧团没有见过他，连所有与他有过往来的同学家里也去问过，回答自然令人失望的。

当然，谢春溥的脑海中也跳出过‘失踪’两个字。这两个字他开始连想也不敢想，他认为这不可能，但当儿子的踪迹遍寻无着的时候，他的脑海中还是无法控制地跳出这两个字，因为在当时的上海滩，每天失踪的人是不计其数的。大四开版的申报和各种大小报纸的中逢和边头角尾间，到处都是寻人的广告，为此，他决计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也去报馆登一则寻人的启示，没想启示还未登出来，邮差倒给他送来了一封信。信上面的笔迹是他最熟悉不过的，是他的宝贝儿子谢晋写来的，信封上的落款是：四川省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话剧系。

来不及与妻子分享找到儿子下落的喜悦和激动，谢春溥便颤抖着手将信拆开来。儿子在信中向父母作了检讨，并对自己为何要离家出走作了解释，当然，说来说去，无非一句话，他酷爱艺术，他要为艺术而献身，等等，未了，他还大致介绍了一下学校的情况。儿子的信并不长，并且从他的口气中看，也并无回心转意的意思，但对谢春溥来说，这已经是老天保佑，谢天谢地了。

谢晋离家出走后，到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报考了话剧科，因为当时时局不稳，学校正常的考试制度已无法坚持，只好请一些资深的老师对学生进行一些口头的提问，或进行一些小品表演，谢晋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对于江安这地方，谢晋以前从未听说过，直至到了一看，才知它原是一个小县城，人口才一万多，况且离当时国民党的陪都重庆还有三百多公里。不过别看它地方小，在当时的四川，也算是一个比较富庶的鱼米之乡，这里出产桂圆，荔枝，盛产毛竹，因此，又是有名的竹制品的出产之地。当时重庆、成都街上买的竹制品，大都是由这里的小贩用船运去的。

江安国立戏专当时就座落在县城城西紧靠城墙的文庙里。与这所名声显赫的学校所不符的是国立戏专目前的处境实在有点太寒碜。这里远离都市，远离文艺界，消息闭塞，总使人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但这又是迫不得已的事，无论从各方面来说，自然是不能与在长

沙时相比。那时的长沙国立戏专是多么的风光，大地方，大校园，大教室，不过这种风光也很快被日本鬼子的炮火摧毁了。随着战火不断地向内地蔓延，戏专只好奉命向重庆转移，时间是1938年2月，戏专到了重庆，先被安顿在上清寺。没料才过了一年多，日本鬼子又开始了对重庆的轰炸，于是戏专又只好奉令迁移到江安。虽然，习惯了都市生活的学生和教师们是极不情愿到这种闭塞落后的小地方来的，可为了能使戏专正常开学，自然也为了师生们的身家性命，大家也只好听从这样的安排了。

但话又说回来，江安的地方虽小，生活虽苦，但戏专的文化名人却不少。校长叫余上沅，是当时很有名的戏剧理论家。教授中有洪深、马彦祥、焦菊隐、黄佐临、张骏祥等，还有一位在解放区和国统区早已闻名的大名人，曹禺。他是戏专的教务主任，又是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理事，那时才不过30岁左右，但已有多部大作品问世，如《雷雨?、《日出》、《原野》等，因为是当时有名的才子，所以他的周围始终围着一大批名人，还在重庆时，就有许多文化名人聚集在他的身边，如陈鲤庭、梁秋实、方令孺、张平群、戈宝权、陈白尘、孙增爵等。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没有随戏专迁到江安，但他们与戏专的联系却一直没有中断过。

不到20岁的谢晋就是在这样一批文化精英的教鞭下接受着艺术的熏陶。作为话剧科的一名普通学生，谢晋十分勤奋好学，那时戏专在上课之余，经常组织学生到外面去演戏，如曹禺的《蜕变》等。谢晋通常的任务是搞剧务，有时因为剧情需要，他也会在戏中扮演一名角色。同时，由于他身材魁梧高大，相貌英俊，有时还兼任拉大幕的差使。外行人以为拉大幕无足轻重，实际上戏剧舞台上的大幕启下极有讲究，由于谢晋在拉幕时能细细体味剧情并根据剧情的需要，然后做到该快则快，该慢则慢，从而有效地烘托了剧情，达到了很好的舞台效果，因此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洪深发现这个大个子学生悟性极高，后来每次演出，又给他加了一个差使，叫他作场记，没想他竟

能在排演场上将导演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并能协助导演排戏，被洪深老师称为“最好的场记”。

当然，表扬多了，谢晋有时也会流露出一些骄傲的情绪，有一次，焦菊隐老师负责排戏，谢晋不知因为想起了什么，竟在排演时开起了玩笑，将严肃的剧情破坏了，焦菊隐气得叫他立即到排演场的墙角里去反省。这件事对谢晋的影响很大，直至他后来成名以后，他常常讲这个故事教育大家，并且身体力行，只要他一到拍摄现场，就不准人随便走动，不准聊天谈笑，不准接电话，甚至不准女演员找男朋友，因此常被演职员们称为“法西斯”导演。

《大师谢晋? 美丽的初恋（1）

大师谢晋二

这一天，江安女中初中部17岁的女生徐大雯从学校的矮墙边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人，一个身材高大，英俊潇洒的人，这个人后来改变了徐大雯毕生的命运，同时，这个人后来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就是谢晋。这一年，谢晋还不到20岁。

一、美丽的初恋（1）

江安的生活是枯燥而萧索的，这里很少名胜古迹，更无闹市街景。对于年青的学生们来说，正是贪玩的时光，可是到哪里去玩呢，戏专没有运动场，连篮球场也没有，唯有一个小小的类似天井一般大小的场地，下课的时候，大家便抱出一只篮球，十几个人挤在一起，你掷给我，我抛给你，有时兴之所致，也会拥上去作一番抢夺，弄得满身灰土，虽然这种活动单调了些，但因为客观条件只能如此，大家也就打消了一些奢侈的念头，因而有时玩得也算开心。

不过到了春天，师生们的活动范围和空间似乎比平常要大一些了，因为课余时间和休息天，大家可以到城外的山上田野去走一走。对于大多数从大城市来的师生来说，春天的江安可以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那苍翠峻伟的南崖，那城北连绵起伏的丘陵，那随风摇曳的桂圆树，那金黄万点的油菜花以及在那花蕊间飞来飞去的蜜蜂，使正处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暂时忘却了求读生涯的艰辛和时局动荡所带来的不安。他们尽情地在这大自然的怀抱里享受着春天赐予的生命甘露。的确与那些在日本鬼子的炮火下挣扎的同龄人相比，他们这里可以算得上是人间天堂了。

或许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端庄的姑娘走进了谢晋的视野。她叫徐大雯，是地地道道的江安城里人，她的父亲也是个读书人，家境很殷实，在农村有田地，在城里有货栈，在当地很有些声望，但后来不知怎的竟渐渐地败落了，就在徐大雯12岁那年，父亲又因病去世。

因此，在她的印象中，老人们常常忆及的她的家庭当时那种鼎盛和富有的情景对她来说是遥远的，而对于父亲，她又感到是朦胧的，甚至是陌生的。这使得这个昔日的富家千金常常处在一种郁郁寡欢的心态之中。虽然，已经家道中落的她在生活上尚不至捉襟见肘，比起一大帮穷学生来说，她仍是富有的，但不知为什么，她总感到自己的心里是苦闷的，她总想找一个人，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向他诉说心中的苦闷。可是，这个可靠的人，这个可以信赖的人又在哪里呢?

这一天，江安女中初中部17岁的女生徐大雯从学校的矮墙边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人，一个身材高大，英俊潇洒的人，这个人后来改变了徐大雯毕生的命运，同时，这个人后来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就是谢晋。这一年，谢晋还不到20岁。

几十年以后，当昔日这位江安城里顶呱呱的“上江”女子在忆及她与谢晋这段一见钟情式的美满姻缘时，目光中仍掩饰不住流露出少女般的羞涩与润湿。她有一次在回答广东电视周刊的记者时曾这样回忆说：“我与谢晋相识，可以说是天公作的美，因为我们江安女中与国立剧专只是一墙之隔，墙的这边是我们的学校，墙的那边是谢晋的学校。”

“我认识他时他还不到20岁。我更小，他年轻时就长得魁梧高大，喜爱运动，更爱打架，他的打架是出了名的，当时国立剧专的情况非常复杂，有不少进步师生，也有国民党的特务，谢晋血气方刚，爱出头，爱打抱不平，看到有人欺侮女同学，不管对方有着特务身份，就冲上去打架，他打架打得可凶呢，谁也劝不住，别人不敢出头的事他敢！其实，他也不太懂事……”

“我之所以对他产生好感，其中一个原因也正因为他有正义感，并且是个直肚肠，说真话！”

“江安距离重庆有几百公里，是一个小县城，一向很封闭，我那时爱演进步话剧，又常与谢晋这些爱国学生在一起抛头露面，就已经为

当时的反动势力所注意。另外，我们那儿的人排外情绪又十分厉害，一向讨厌抗战后到这里来的‘下江人’，我爱上了‘下江人’谢晋后，又惹怒了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两股势力糅合在一起，就使我再也无容身之地了！”

“谢晋20岁生日的那天，他邀了好几位女性朋友吃饭，我也去了，我们堂而皇之地在茶楼上吃饭。这还了得，于是一阵风地传开了，次日我就被开除出校。从此，我在家乡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坏女人，走到那里，都有人指着我的脊梁骨骂，说我父亲死得早，没人管，丢了江安人的脸。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母亲哭着让我去重庆找舅舅。于是，我不得不只身一人来重庆投奔我的舅舅。我学校的几位好同学偷偷地帮我把留在学校里的几件衣服拿出来，送我上路。谁也不敢与我多说话，因为一个女学生被学校开除，在江安城内，可以说是破天荒的，所以，在人们的心中，我简直是坏透了……直至1958年我回故乡时，他们见我还不差，才慢慢改变了以往的看法。”

《大师谢晋》美丽的初恋（2）

一、美丽的初恋（2）

经过了江安的这场风波，谢晋与徐大雯一下子似乎成熟了不少，如果说，他们两人以前的相识只不过是一种少男少女之间朦胧的初恋的话，那么现在，则是一种经过了严峻考验的生死之恋了。尽管，年仅20岁的谢晋还不可能对爱情理解得那么透彻，但有一点他心里清楚，为了和他好，徐大雯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这种牺牲，对多数的人来说，都会望而却步，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而她，一个17岁的女孩子，却勇敢地作出了抉择。

江安是很难再继续待下去了，这是因为徐大雯的原因。与一个在当地被认为名誉扫地、被赶出家门的女孩子在一起，谢晋的处境也是可想而知的，但这一点，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经过了那一次风波，谢晋和徐大雯都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既然人们这样不公正地对待他们，他们一定要争一口气，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然后明媒正娶，给那些鄙视他们的人看看。但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首先是读书，只有读好书，才能在社会上站住脚。但江安是没有他们尤其是没有徐大雯立足的地方了，因此，只有到外面去，寻一所合适的学校，最起码把高中读完。另一个原因，是江安的政治环境，已变得越来越险恶了。“皖南事变”以后，陪都重庆也很快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随即，这片白色恐怖便像瘟疫一般蔓延开来，并很快笼罩在小小的江安县城上空，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是令人不安的，中共川南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因泸县中心县委书记叛变，江安县委书记也遭被捕。随着上级和外围党组织的破坏，戏专内的政治空气也变得相当紧张，一些原本潜伏着的在暗中监视进步学生的国民党特务也开始显露出他们的真实面目。如CC派特务、戏专训导主任张秉钧之流，他们不仅诱骗学生加入国民党，还不时将戏专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向国民党江安宪兵

队报告。后来发生的宪兵队突然搜查戏校、谢晋的老师曹禺和戏专党员方琯德等人被逼逃离江安的事件，就是这些人干的。

在这种环境下，年轻的血气方刚的谢晋，心情感到十分的压抑和迷茫，他原本希冀有一天要以自己的热血之躯报效祖国的愿望如今遭到了破灭，残酷的现实摧毁了谢晋和同学们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想，他们在戏剧王国中所塑造的那个梦幻般浮现的那个理想的花团锦簇般的祖国，如今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和国民党反动派腐败的侵蚀及血腥的摧残。他们的路在何方？环顾茫茫四周，全是漆黑一片。在这种报国无门、前途无望的情绪的煎熬下，一些人开始堕落了，有的人在烟花场上醉生梦死，有的人加入了国民党，有的人以打牌取乐，消磨时光，有的人开始酗酒，在浑浑噩噩中寻求解脱，也有人在当地做起了生意。

而与谢晋最为接近的一些进步师生，因无法承受江安城里这种肃杀的政治空气和腐败沉闷的环境，逃的逃了，避的避了，走的走了，在这支萧瑟的队伍里，有不少是谢晋所敬重的老师，其中之一就是曹禺。五十年以后，已是著名电影导演的谢晋有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这一生中最崇拜的是“两曹一托”，就是曹禺、曹雪芹和托尔斯泰。曹雪芹和托尔斯泰已是故人，他无缘谋面，只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接受熏陶和影响，而曹禺则是他的执鞭教师，他在江安的三年多时间里，曾多次聆听曹禺为他和同学们讲授《西洋戏剧史》、《编剧技巧》和《名剧选读》等。作为一名对学生怀有浓厚感情和责任感的老师，曹禺总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丰富的知识传授给他的学生们，使他的学生终生受益匪浅。谢晋有一次回忆说：听曹禺老师授课你会感到是一种享受，他讲的课精彩绝伦，而又往往一气呵成，讲到兴奋处，他甚至会手舞足蹈，当场表演。有些英文原版，还没有翻译过来，他就当场朗读原文。因此，每当他讲课的时候，连别的班的学生都会过来听讲，有时甚至连过道里也坐满了人……

但就是这样一位蜚声海内外的戏剧家，国民党却常常发难于他，在江安戏专时，先是无故搜他的家，后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发文“禁演曹禺所著的《雷雨》剧本”等等。在这样的情形下，曹禺只好辞去戏专的职务，离开曾执教过近三年并在这里创作过《蜕变》、《正在想》和《北京人》剧本的江安戏专，到重庆另谋生路去了。

他这一走，影响了在江安戏专就读的整整一批有志向的进步学生。有许多人，包括马彦祥、洪深、焦菊隐等人，也因此而离开了戏专，其中也包括谢晋在内。

这时已是1942年的年底，江安的冬天显得格外的寒冷，旧历岁暮，新春来临，处在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中的江安人不会注意一个提着一只旧皮箱的青年学生离开这个萧瑟的小城，但谢晋真的要离开这儿了，又不免产生出一丝淡淡的留恋之情来，这里，毕竟是他向往的地方，三年前，当他来这里报考戏专的时候，他是举目无亲，人地两生，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他的心里却鼓荡着对未来美好理想的憧憬，脉管里奔腾着的是滚烫的热血。生活虽是非常艰苦的，但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坚持下来了，在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下，他们不仅学到了许多戏剧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从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如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有骨气的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在几个要好同学的送行下，谢晋告别了戏专的老师和同学，告别了尚在冬日的晨雾中沉睡的江安，告别了三年中曾在这个小小县城中留下过他无数脚印的大街小巷，搭乘江安至重庆的小火轮，走了。这一走，他何时才能再回来，他还能不能再回来，谁也说不准，但谢晋已无心再去考虑这些问题了，他只巴不得小火轮快快地开，巴不得一步就跨到重庆去，因为，那里有新的生活在召唤他，那里有许多他所敬仰和熟悉的老师叫他去，当然，那里还有他的恋人、重庆文德女中高中部学生徐大雯在等他。

《大师谢晋》 重庆岁月（1）

二、重庆岁月（1）

1943年年初，重庆中央青年剧社来了一位年轻的场记，他就是谢晋。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的重庆已有五大话剧团，即中华剧艺社、中国剧团、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在这么一个不大的都市里有这么多剧团，可想而知是够热闹的，但与江安相比，重庆更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作为陪都，重庆的白色恐怖比其他地方更厉害、更直接。

那时中青社的领导人是张骏祥和杨村彬。1938年，刚刚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的张骏祥刚回国，就被在重庆国立戏专任教导主任的曹禺请到了学校任教，后因战事发展，国立戏专迁到了江安，张骏祥也随戏专一起到了江安，但张骏祥在江安待的时间并不长，因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就离开江安，先期回到重庆，创立中央青年剧社，因其突出的组织才能和导演才华，把剧社搞得红红火火。1942年初，随着曹禺的加盟和不久后从江安国立戏专前来投奔的马彦祥、洪深、焦菊隐等人的参加，剧社的阵容更加强大，加上当时从上海来的一大批著名影剧演员如白杨、赵丹、魏鹤龄、舒绣文、王为一、张瑞芳、章曼蘋、顾而已、江村、高占非等，都与剧社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与这么多名家在一起工作，对谢晋艺术素养的提高，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当然，对于谢晋来说，通过与这些艺术家们一起排戏、演戏，更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可贵的人品和艺品。

中青社当时演出的主要剧目以抗战题材为主，如曹禺的《蜕变》、《北京人》、《家》、《正在想》、《镀金》和《雷雨》、《日出》、《原野》等，也演其他的一些进步剧目，如《少年游》、《黄花岗》、《鸡鸣早看天》等，谢晋在这些剧目中常担任剧务、场记，有时也扮演一些次要的角色。这些剧目的演出，向黑暗统治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喊出了正义进步的声音，从而也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当

局的恐慌，便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千方百计的干扰和破坏。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不得人心，因此，此举的最后结果，总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

在重庆文德女中高中部读高一的徐大雯常在谢晋排戏的间隙来看望他，有时也在谢晋排戏的时候来看他。对于戏剧，徐大雯不仅是一个爱好者，也是一个参与者，早在老家江安时，她就上台演过进步话剧，后来因为家中的阻拦，才没往这方面发展。

徐大雯现在住在舅舅家，舅舅在重庆的一家公司里任职，家境尚过得去。对于谢晋这位未来的外甥女婿，他曾有过几次接触，也把他叫到自己家里吃过饭，总的印象是，除了对他的演戏职业表示不敢恭维外，对人品是无可挑剔的，因此，他是赞同并鼓励外甥女与谢晋好下去的。而这对于徐大雯来说，则差不多要高呼“万岁”了。她后来回忆说：“经过了江安的那场周折，我们的感情更进了一层，他对我的感情十分专一，我也一定要与他好下去，一方面我真心喜欢他，另一方面我们也只有正大光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挽回我的名誉……”

1938年—1943年，日本对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的大轰炸。1944年，已濒临垮台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作最后的挣扎，加速了对中国的进攻，于是便在3月间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对豫、湘、桂地区的进攻，从而企图打通从中国东北到广州和南宁的大陆通道，为挽救其海上交通线被切断的危局。面对日本鬼子的进攻，国民党反动政府却采取了消极抗战的政策，从而使大片国土沦陷丧失，无数同胞惨遭蹂躏。

雾都重庆，整日间处在一种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当中。那些日子，敌机的骚扰也多了起来，不时有炸弹从头顶上扔下来，在人群中爆炸，一些由记者现场拍摄的人体被炸得血肉横飞的照片次日便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中央时报》、《大公报》等各大报上登出来，更使人产生一种窒息而绝望的感觉。

中青社仍在坚持每天排戏，但演职员们也早已是人心惶惶，特别是有时正在排戏，一阵警报响起，大家赶快扔下道具，躲到防空洞里去，每天几次下来，吓得人的精神快要崩溃，哪还有什么心思排戏。有时敌人真的扔下几颗炸弹，不时有炸中的楼房从半空中哗啦啦地倾倒下来，尘雾散尽之后，常常可以看到在人行道或马路中央，有缺胳膊断腿的伤者在呻吟，间或有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被人从瓦砾里中挖出来，然后用破败的草席一盖，不知被人拉到什么地方去。但尽管如此，重庆的市民仍是不屈的，每次敌机飞走，在硝烟未散尽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一边含着眼泪，一边抬着伤者或死者，哽哽咽咽地唱着当时十分流行的一首防空洞避难歌："让你龟儿子炸，让你龟儿子轰，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烧，让你龟儿子杀，老子们人多来地方大，怕啥，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大师谢晋》 重庆岁月（2）

二、重庆岁月（2）

面对这种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谢晋与徐大雯常常处在一种迷茫和彷徨的煎熬中，他们常常问自己，怎么办？再在重庆这样的地方待下去，何年何月才有出头的日子。但离开重庆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中国的江山，一半被日本鬼子占领着，一半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势力笼罩着，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哪里都一样。当然，谢晋也曾想到过回家，是的，有一段时间里，他曾十分强烈地想念自己的家，毕竟，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回家了，那里有为他和他的弟妹们操了一辈子辛劳的父亲和母亲，有他离开时尚小、而现在一定长高了的弟妹们。总之，那里是他这个身心疲惫的游子最安全的港湾和最舒适的憩息地，只要他愿意，无论什么时候，那个家都会向他敞开最温暖最宽阔的胸膛，而这，正是他三年来所梦寐以求的。

但是，谢晋又很快并且很痛苦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觉得现在回去还不是时候，他的事业还没有成功，他还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没有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真正属于他的工作。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现在已经不是孤身一人，而是多了一个徐大雯。

在焦虑、企盼和等待中，1945年终于来临了，虽然时局仍然动荡不定，但毕竟有一些好的消息从外界传来：苏联红军已直捣德国法西斯巢穴柏林；英美联军也长驱直入敌人的腹地；解放区所有的武装部队开始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这些通过不同渠道传来的消息，就像在漫漫长夜中突然划过的一道闪电，给谢晋和他的同事们带来无限的遐想和期望，似乎胜利的曙光，就要出现了。

8月15日早晨，谢晋还没有起床，这时，大街上似乎特别的宁静，突然，一个盼望已久的振奋人心的消息从广播中传来：日本天皇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广播还没结束，整个山城便已沸腾起来，

谢晋与他的同事们从床上一跃而起，匆匆穿好衣服，就跑到大街上。这时听到广播的和没有听到广播的重庆市民几乎全都涌到街头路边，许多人的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大家互相重复着一句简单的但又是等待了太久的话语："胜利了，胜利了。"

入夜，多年来一直实行灯火管制的重庆市第一次灯火通明，嘉陵江上的汽笛声鞭炮声整夜不停，叫喊了一天嗓门已经嘶哑了的报童仍在挥舞着手中的报纸："号外，号外，日本鬼子投降了。"尽管这些报纸到了晚上已经过时了，但他们仍在固执地叫喊着。显然，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在推销自己手中的剩余报纸，而是，当一个企盼已久的大好消息突然降临的时候，他们有点欣喜若狂了。

在弥漫着浓浓鞭炮硝烟的大街上，谢晋拉着徐大雯的手，在人群中漫无目的地行走着，他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沉醉在欢乐的海洋中，是啊，八年抗战，八年了，人们遭受了多大的苦难啊，现在，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可这是多么来之不易的胜利啊。

正当山城的人民还沉浸在因抗战的胜利而带来的狂喜之中时，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了。8月27日，也就在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后的第十二天，重庆《新华日报》登出了一条消息："毛泽东同志即将来渝。"8月28日毛泽东主席果然从延安飞到了重庆，并在《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他的谈话："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

三、迎娶新娘

抗战的胜利给黑暗的大地带来了光明，也给苦难的人民带来了希望，而对于谢晋来说，则是想和家人团聚了。在1941年春天那个闷热的晚上，当谢晋提着一只旧皮箱，悄然离开上海同孚路那幢灰色的石库门至今，已经整整四年过去了。四年前，上海还处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现在，日本人投降了，和平了，该是回去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团聚了。

谢晋是个急性子，心里想干什么事，巴不得马上就办成，当他把这个想法与徐大雯一说，徐大雯也赞同。

1946年3月的一天，谢晋告别了中央青年剧社的老师和同学们，登上了从重庆开往上海方向的小火轮。在他走前，他的许多老师也相继离开了中青社而各奔东西，老师曹禺受美国国务院聘请，与作家老舍一起赴美讲学，老师张骏祥、黄佐临等已先期去了上海。还有一些暂时不走的，也都打算在近期离开。

徐大雯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在码头上与谢晋道别，她暂时还不能跟谢晋同赴上海，因为她高中尚未毕业，她还得在重庆留一段时间。因此，对于徐大雯来说，除了与恋人分别时的恋恋不舍外，她的内心深处还隐含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心情：重庆与上海远隔千里，谢晋此次一去，会不会变心呢？再说他们又尚未结婚，就说谢晋对她一片忠心，那么他的家庭呢？1943年，当“下江人”谢晋与“上江人”的她相好的消息在江安小城传开以后，不就在她的家庭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吗？现在，当一个外地破落地主的女儿要嫁给一个名门望族出身的谢家公子的时候，那个家庭，是否会友好地接纳她呢？

小火轮在徐大雯痴痴呆想的时候，渐渐地离开了码头，因为加大了马力，从轮船的烟囱中喷出了一股股浓浓的黑烟，徐大雯固执地站在码头上，透过浓重的烟雾，她看到有一张她熟悉的面容在她的视线中远去了，模糊了。

后来，她在一次记者采访时，曾谈到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她说：“抗战胜利后，谢晋先是乘船，后来又经川塞公路，到宝鸡，由于车少人多，他只好买黄牛票，到了徐州，再转到上海，回到家时，身上长满了虱子。到了上海，谢晋开始时颇有一番雄心壮志，自己筹款组织了剧社，聘请了上海舞台上的一些明星来演《郁雷》，可是由于没有后台靠山，也没有声望经验，不久就破产。1946年夏天，我如期在重庆文德女中毕业，谢晋特地从上海赶来重庆，把我接到上海。他告诉我办剧社失败的情况，问我怎么办？对此我倒无所谓，一个23岁

的青年，赤手空拳要在上海滩闯出一条路来谈何容易，而我关心的是他有没有变心，在上海有没有‘原配夫人’。因为抗战时期，‘下江人’到了重庆后，隐瞒原来的婚姻，让我们‘上江人’做小老婆的确实很多，抗战一胜利，这些问题都开始暴露了，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她也对此放心不下……到了上海后，我见谢晋确实真心实意地只爱我一个，早就做好了明媒正娶的准备，我也总算没有白爱他一场，感到感情有了寄托……”

1947年的一个良辰吉日，两位历经磨难的年轻人的婚礼终于在上海隆重举行，前来参加婚礼的人很多，除了亲友，还有谢晋少年时的一些同学和朋友，大家多年不见，分别的时候差不多还是孩子，而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了，大家回忆往事，自然要感慨一番。婚礼由德高望重的剧作家洪深老师当新郎新娘的证婚人。因母亲陈振美的坚持，婚礼采用新派的方式，比如拥抱、接吻，也沿袭老派的做法，如拜天地、喝交杯酒等。总之，婚礼办得热热闹闹，欢欢喜喜。

婚后不久，新婚夫妇便在父亲谢春溥的陪同下，到上虞谢塘老家谒拜祖坟，多年不见，各房长辈都已变得苍老了许多，大家相见，自有一番唏嘘。好在谢晋已经长大成人，如今又领回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早年谢晋因当“戏子”而在家族中引起的不快，也早已在老人们的心中烟消云散了。

《大师谢晋》《女篮5号》（1）

大师谢晋三

现在，谢晋的机会也来了，而这种机会，对一个导演来说，即使在一生当中，也不会很多，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个导演拍什么片子，不是由自己说了算数，而是由上面分配下来，点到谁就是谁，就像荐头行里的老妈子等候雇主挑选那样。现在，上面把拍摄《女篮五号》的任务交给了谢晋，接下来，就要看谢晋如何去拍这部片子了。

一、《女篮5号》（1）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1957年就到了。

这一年，谢晋已经34岁了，作为一个人来说，谢晋这时候正当盛年，气血两旺。作为一个父亲，他此时已是四个孩子的爸爸了，而作为一个导演，这个年龄可以说是该出真正作品的黄金时期。许多与谢晋相熟相知的大艺术家，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年龄段，拍出优秀作品的，如孙瑜在30岁时就拍出了中国第一部配音声片《野草闲花》和轰动当时影坛的《故都梦》。谢晋的老师张骏祥在31岁时，就导演了曹禺老师创作的《蜕变》《北京人》《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名剧。他所十分敬重的石挥在35岁以前就在电影导演上达到了高峰阶段，他导演的《腐蚀》《关连长》等影片，在中国的电影史上曾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可以这么说，在电影界当中，要举出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数不胜数。

现在，谢晋的机会也来了，而这种机会，对一个导演来说，即使在一生当中，也不会很多，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个导演拍什么片子，不是由自己说了算数，而是由上面分配下来，点到谁就是谁，就像荐头行里的老妈子等候雇主挑选那样。现在，上面把拍摄《女篮五号》的任务交给了谢晋，接下来，就要看谢晋如何去拍这部片子了。

《女篮五号》的剧情很简单，说的是篮球名手田振华与其女友解放前后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揭示了两代球员新旧社会里不同的遭遇

与命运，整个故事始终贯串着一条爱国主义的主线，因此，是很适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需要的。作为一个解放后经历过多次政治风雨洗礼的导演，谢晋是知道这部片子的分量的，也就是说，对这部片子，他只能拍好，不能拍坏，这不仅关系到他一生的艺术生命，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他一生的政治生命。

《女篮五号》剧本基础较好，因此改动不大。而演员的挑选，则令谢晋有些头痛，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让上影厂的一些名演员来演，上影厂有的是名演员，许多演员长年累月接不着本子，正闲着没事干，另一种意见认为除起用一些名演员以外，还应大胆物色一些新面孔，这样可使电影增添一些新鲜感，说不定，还能通过拍片培养出几个好演员，谢晋选择了后一种意见。

上影厂演员剧团的刘琼是谢晋确定的第一个演员，刘琼在解放前就蜚声影坛了，是很为谢晋所熟知的，虽然从年龄来说，刘琼正好比谢晋长10岁，从出道的年龄来说，刘琼也要比谢晋早得多，刘琼参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联华影片公司孙瑜导演的《大路》，那时他才21岁，而谢晋参拍第一部影片《哑妻》的时候已是25岁了。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谢晋都应该称刘琼为老大哥。虽然两人同在一个电影制片厂，抬头不见低头见，但真正在电影上合作还没有过。然而，对于谢晋来说，他对刘琼更为熟悉的，似乎还在运动场，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厂里的篮球运动员，刘琼1.86米，谢晋1.80米，两人经常在球场上相见，有时是朋友，有时是“对手”，刘琼打球时以风度潇洒而闻名，由于父母赋予了他一副难得的身材，使他的身材呈现出一种肩宽、胸阔、臂长、腰细的形状，刘琼看上去修长、挺拔、匀称、五官端正、眉俊目秀，只要他往运动场上一站，就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而他这种得天独厚的体形天赋，又促使了他在球场上奔跑、跳跃时以及传球、接球、投篮时的节奏明快，姿势优美而舒展，极富造型感。而谢晋打球则以敢拼敢“杀”而著称，谢晋身材虽没有刘琼高，但他比刘琼壮实，像一辆“坦克”，因此，他在场上常常打中锋，但“坦克”有时

也有抛锚的时候，有一次上影队与人艺队比赛足球，足球他也喜欢，因此，他也去参加了，谁知当时天气冷，手脚没有活动开，再加上他踢得又太猛，上场没多久，就把右腿的小腿骨给踢断了。

刘琼作为《女篮五号》的男一号演员（饰教练员）定下后，接下来就要物色女一号演员，也就是剧本中林洁的扮演者，有人推荐了秦怡，谢晋同意了，因为秦怡也是谢晋的老朋友，早在重庆的中青社学习时，他就认识秦怡了，不过那时秦怡已经较有名气了，而谢晋则还是个穷学生。

秦怡接拍《女篮五号》时，正遇她与影帝金焰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可以说她的情绪已到了最低点，但她还是以艺术为重，以大局为重，坚持着把片拍完，而且拍得相当成功。

《大师谢晋》《女篮5号》（2）

一、《女篮5号》（2）

相比之下，物色女篮九号汪爱珠的扮演者，倒是很费了一番周折。汪爱珠虽是九号，可她的戏分很重，情节起伏也大，因此，也是个主角。有人起初建议再在上影厂找一个现成的，谢晋不同意，可偌大的中国哪里去找这样的演员，这时有一个叫向梅的女孩子出现了。

向梅的原名叫武杨梅，老家在北京，她父亲是著名的生物学教授，母亲也是学生物的，向梅从小就有一种艺术天赋，不过她的这种艺术天赋启蒙于她的大姐，她大姐年轻时就喜欢戏剧，常常自写一些剧本，自任导演，而演员又是现成的，就是向梅和她的二姐。演出时，三姐妹将床单当大幕，挂在家中最大的一间房间里，就活灵活现地演起来，剧本是粗糙的，演技是低劣的，但对向梅的教益是终身的，因为这培养了向梅对艺术的兴趣，并由此种下了艺术的种子。

高中毕业的时候，向梅瞒着父母，报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她原本想报电影学院表演系，可电影学院这年不招生，她想电影演员当不成，当个戏剧演员也是好的，反正总是搞艺术，可正当她背着父母在悄悄地复习功课时，班主任却突然找到她，说清华大学新成立了一个保密系，在他们学校挑选两名学生，其中一人就是她，虽然她心里不太愿意，可学校里决定了，她也不好违背，于是，她又重新填写了报考志愿书，但由于从文科改报理科，加上仓促应试，成绩不太理想，幸好天津大学建筑系接纳了她，于是在1955年9月的一天，向梅离开了北京，来到天津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活。

令向梅意想不到的是，正当她自灭了心头的艺术之火而静下心来幻想着将来当一名出色的建筑师时，艺术之神再次叩响了她心中那扇已经关闭的大门。而这恰恰是一次偶然的巧合，这次巧合的发端，是她上海外婆家的一位与电影界非常熟悉的远房亲戚，他在得知上影导演谢晋正在物色一位女演员而四处奔波时，便将她的照片从玻璃板下

取出来，然后拿给谢晋去看，谢晋一眼就看中了这位风姿绰约的北方姑娘，大叫“我要找的就是这个人”。于是在1957年年初的某一天，即派上影厂的制片主任丁里亲赴天津大学，把正在准备大学二年级上学期期终考试的向梅找了出来，向梅开始不相信，经过厂里和学校领导的反复证实，又给她看了高教部同意借调她参加《女篮五号》的批件，才知是真的。

1957年大年三十前的这一天，北方早晨的天气显得特别的冷，只有从街道上不时传来的鞭炮声和从家家户户的门口传来的孩子们的嬉笑声中才使你感到春节到了。身材颀长的向梅穿着一身干净朴素的学生装，在家人的簇拥下，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这是北方送给南方的一位出色的女儿，具体地说，是北京和天津，送给上海的一位演员，一位媳妇，一位母亲。这一去，将再次燃起向梅心中业已熄灭的艺术之火，从而，也将彻底改变向梅一生的命运。

谢晋在上影厂的招待所等着她，没有客套，没有寒暄，一坐下，谢晋辟脸就问：“你喜欢打球吗？”向梅腼腆地说：“我什么都喜欢，就是不喜欢体育，我一见那么多人在球场上争夺一个球，心里就害怕。”谢晋笑了，站起来说：“那好，等你喜欢上球后我们再谈拍电影吧。”

春节很快就过去了，摄制组立即就进入了紧张的准备和拍摄阶段，绝大多数演员已在上影厂就位。下一步，是如何把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演员组织起来，按电影剧本所规定的要求，她们要组成一个女子篮球队，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这些女孩子们，长了这么大，真正在篮球场上奔跑过的，没有几个人，有一半以上的人，甚至连篮球也没摸过。

任务很自然地落到了刘琼的身上。谁叫他是《女篮五号》的教练呢，教练教练，先教后练，对这批女演员来说，第一步的任务是，先要教会她们如何打篮球，学会后，才能正式上场训练，练就后再帮助她们熟悉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然后才能正式上镜头。

对于刘琼来说，这一次教练，他实在当得不轻松，按谢晋的要求，演员们只有练到像真正的运动员一样了，才能正式开机，而这又谈何容易，因此，他只有自己以身作则，每天陪着这些姑娘们练得死去活来，一天两个小时的大运动量下来，一个个喊爹喊娘，倒在床上就不想起来。

1957年年终，《女篮五号》经过了半年多时间的紧张拍摄，终于胜利关机，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修改和补充，又顺利地通过了审查。影片随即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上映，立即引起了轰动。同年，该片在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影片展览中，获得“银质奖”。谢晋本人也被授予“中华体育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

《大师谢晋》《女篮5号》（3）

一、《女篮5号》（3）

也许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电影观众才记住了一个年轻导演的名字——谢晋。严格地说，《女篮五号》是谢晋从影生涯中的一块极其重要的奠基石，是《女篮五号》，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导演步入了成名者的行列，并逐步走上了他日后的辉煌之路。

上影厂对崭露头角的谢晋是寄予厚望的，他们也希望谢晋能趁着《女篮五号》成功的东风，一鼓作气，再拍出几部有影响的作品来。对领导的信任，组织的期望，谢晋是兴奋的、激动的，他仿佛觉得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认为，作为一个导演，只有拍出更好更多的片子，才能报答组织、领导和观众对他的厚望，才能用实际行动来响应党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因为这时候，“大跃进”运动已经开始了，全国人民都在摩拳擦掌，大干快上，他们也必须奋起直追，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或许正是因为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1958年，是谢晋接拍片子最多的一年，《大跃进小主人》《大风浪小故事》等等，一年拍三部，这是谢晋导演生涯中从未有过的，有意思的是，这三部片子的片名中，有“大”字的占了两个，如果说这不是偶然巧合的话，那就是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了。

片子是接了，总得把它拍出来，但真的要把它拍完、拍好，显然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恰巧这时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又托人传话过来，说：“《女篮五号》我看了，拍得不错，希望谢晋再拍一个足球的。”谢晋听了，浑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那个时候，盘踞在谢晋脑海中最重要的字只有两个，那就是“工作”，工作压倒一切，工作起来，可以舍弃一切。

家里的事，他是顾不过来了，徐大雯为他默默承担了一切，这个昔日四川江安城里大户人家的大小姐，自从嫁到谢家门里后，已学会

了一个勤劳女人所会做的全部活计。而对于谢晋来说，内疚的自然还不止是这些，还有徐大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所承受的那种长年累月的孤独、苦闷和痛苦，这种孤独和苦闷坦率说是由谢晋造成的，他是个事业心很强而家庭责任感又相对淡薄的人，虽然他承担了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但那仅仅是职责而已，对于妻子和孩子们来说，那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们所盼望的是一个能每天见得着摸得着的丈夫和父亲，是一个能每天听到他的大嗓门说话的丈夫和父亲，是一个能与他们挤在饭桌上吃饭并能津津有味地喝着大碗黄酒的丈夫和父亲，是一个当他们受了委屈和困难时能在他厚实的胸堂上依一依、靠一靠的丈夫和父亲。而这一切，对于连白天晚上加起来也感到时间不够用的上影厂导演兼炼钢小组组长的谢晋来说，显然是难以办到的。至于造成徐大雯苦闷和痛苦的另一半原因，那就是孩子们了。说起孩子们，徐大雯的眼圈就会红起来，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真实感情最朴素的流露，是对造成孩子们终生不幸和苦难的沉重的叹息，当然，也包含着她和丈夫那无法回避的自责。

徐大雯和谢晋共育有三男一女，老大谢庆庆、老二谢衍出生在解放前，两个孩子均发育正常，因为受到老父亲“多子多福”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尚未推行计划生育，老三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热火朝天的1953年来到人间，阿三是个大胖小子，他的出世，给全家带来的欢乐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孩子长得白白胖胖，虎头虎脑，谁见了谁都喜欢。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随着孩子的渐渐长大，谢晋和徐大雯忽然发现阿三出现了异常，因为别的孩子到了三四岁，早已牙牙学语甚至是口齿伶俐了，而阿三什么话也不会说，还反映出呆头呆脑的模样，夫妇俩这才着急了，赶紧把孩子抱到医院检查，诊断很快就出来了，小纸片上写着的结论是残酷的：“先天性智力低下”。这一晚，夫妻俩默默地流了一夜的泪，望着尚在襁褓中酣睡的儿子，他们想得很远很远。

1956年，在企盼祈祷（虽然他们并不是天主教徒）和四亲八邻的祝福声中，阿四又来到了人间，然而，短暂的欢乐和侥幸很快又过去了，阿四的发育情况与阿三一模一样……

有人说，任何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会站着一个坚强的女性，这话用在徐大雯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可以设想，在这么一个家庭中，如果没有徐大雯全力支撑着，为谢晋化解着家庭中的矛盾、烦恼和各种各样的琐碎事务，谢晋日后的事业又会是一种什么样子，而徐大雯本身也是一个有工作的知识女性，她的正式职业是上海市电影局资料室的剪辑，剪辑在整个片子中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因为重要，她也需要全神贯注，需要十倍的努力，百倍的投入，她也要争当先进，也要为上影厂多出影片、为国家多作贡献，这就是中国女性的伟大之处，她们虽然也有两只肩膀，但她们的肩膀一只挑着工作，一只则挑着家庭，这两副担子她们都不愿意放弃，也不会放弃，而男人们往往只强调工作的重要而将家庭的副担子搁到妻子柔弱的肩上。

谢晋在完成《女篮五号》和《大跃进小主人》等几部影片后，又于1958年的年底接受了拍摄《黄宝妹》一片的任务。《黄宝妹》虽只是一部艺术短片，但这是一部反映大跃进年代劳模事迹的电影，而更重要的是，这部片子是敬爱的周总理在接见人大代表时，特地把上影厂厂长叫到身边，当着黄宝妹的面交代的："一定要把黄宝妹的先进事迹搬上银幕。"于是，拍摄这部反映全国劳模、纺织女工黄宝妹优秀事迹影片的任务就落到了谢晋的肩上。

《黄宝妹》一片的前期准备大约花了3个月时间，而实际投拍也不过用了4个月时间，因为这部片子要向国庆10周年献礼，所以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把它拍出来。

然而，艺术总是有它自身的规律的，尽管谢晋在《黄宝妹》一片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本人也渴望把《黄宝妹》拍成一部艺术上和思想上的上乘之作，影片投放市场后，虽然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好评，但终究没有在中国电影的艺术长廊中留下一席之地，这是谢晋所

始料不及的，也是他那一代电影导演在当时无法理解的，只有在若干年以后，在经历了政治上的大起大落、艺术上的曲曲折折和人生中的风风雨雨之后，他才顿悟了这其中的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黄宝妹》作为一部电影，虽然它的艺术生命是有限的，但这部片子的导演谢晋与这部片子的主人公黄宝妹的友谊却是长存的。33年后的一天，即1992年1月的某一天，春节快要临近了，谢晋导演驱车悄悄地来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这就是他当年拍《黄宝妹》的地方，故地重游，面目全非。但变化最大的当然是人，当年才34岁风华正茂的谢晋如今已是69岁的老人了，并且已成为一位驰名世界影坛的大导演，而当年那个28岁的爱说爱笑又肯钻研业务的纺织女工黄宝妹，如今也快退休了。

在厂工会主席的安排下，谢晋与黄宝妹在厂职工俱乐部里相见了，一切都是那么随和、亲切，往事就像昨天一样在他们的脑海中闪现，“我现在也是全国劳模了。”谢晋风趣地笑着说，“文革中要把我彻底批烂批臭，《黄宝妹》也差点遭批。”脸上刻满了岁月沧桑的黄宝妹也动情地说：“是啊，谢导，当年我们看到你站在挨批的台上，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说到这里，黄宝妹低下了头。

这时，谢晋也动情地提高嗓门说：“无论我的电影遭到何种责难，工人师傅们总是理解我、支持我的，因此，我的艺术生涯也注定要永远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

《大师谢晋》 找火辣辣的大眼睛（1）

二、为“娘子军”寻找火辣辣的大眼睛（1）

1959年一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刚刚到厂部导演室上班的谢晋还未在自己的办公室前坐下，厂文学部的沈寂打来电话，叫谢晋到文学部去一下。到了文学部，沈寂把一个沉甸甸的大信封交给了他，说：“这里有一个本子，基础不错，值得你一看。”

谢晋下班后回到家里，把大信封袋拆开，将那厚厚的本子取了出来，剧本的题目叫《红色娘子军》，作者叫梁信，是广州军区的作家，这个名字他从未听说过，但他关心的是剧本，于是就很仔细地看起来。

坦率地说，谢晋是一口气读完这个剧本的，以往每个月他都要阅读大量的由别人转来、托朋友送来或从遥远的地方寄来的电影剧本，一般读完三分之一，他就再无兴趣读下去了，对于作者们主动参与和热心电影剧本的创作，其心情他是理解的，但电影剧本的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要求，它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和散文的写作。可以这么说，在从邮局用麻袋送来的雪片似的电影剧本中，真正能发表的几乎是微乎其微，而可以投入拍摄的，那更是凤毛麟角了。因此，有人把与电影打交道戏称是“触电”，要知道，“触电”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而《红色娘子军》则是一个例外，他当晚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读的时候，有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令他怦然心动的情景。他承认，这个本子的基础不错，虽然有些地方略显粗糙了些，生活开掘也显不够，但这只是白玉中的微瑕，只要精心修改，是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好本子的。次日一早，尚沉浸在昨晚激动之中的谢晋就急匆匆地敲开了厂长陈鲤庭家的大门。陈鲤庭刚刚起床，当他听完了谢晋主动要求导演《红色娘子军》这部片子时，他边洗脸边笑了。他当然投了谢晋的信任票。

从陈鲤庭家出来，谢晋就到邮局给编剧梁信拍了个电报：要他速来上海面谈，但梁信此时正好在北京开会，于是谢晋只好打电话到广州军区，再由军区把电话转到北京。两天后，当身着军装的年轻作家梁信提着简单的行李急匆匆步出上海火车站出口处时，谢晋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这是两位年轻的艺术家的首次合作，在火车站出口处，当两位艺术家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梁信的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十分激动，是啊，他怎么能不激动呢，《红色娘子军》是他在琼崖深入生活时创作的作品，也是他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剧本，但剧本完成后，曾投寄给两家大电影制片厂，均被“淘汰”。梁信当时已失去了信心，幸亏他所在的军区文化部的老部长独具慧眼，他认为这个剧本不错。于是，在他的鼓励下，梁信把剧本打印了出来，再由他亲自寄给上海的天马、海燕及长影、北影等制片厂。没有想到，这个本子最后竟被看中了，此时此刻，他的心里怎能按捺得住成功的喜悦呢。

剧本很快按厂部和导演的意图改定了，但改定的剧本并不一定能成为影片中优秀的镜头，要使剧本中的故事更丰满、更完善、人物更生动、更立体，还必须进行再创作，这当然是对导演而言。为此，谢晋与梁信专门来到了海南岛，这是一块神秘而又充满传奇的地方，千百年来，这块远离朝廷和政权中心的流放之地、蛮荒之域，曾演绎了多少充满腥风血雨悲欢离合的故事。在神秘的黎村苗寨和热带丛林间，在迷人的胶雨椰风碧浪白沙中，苏东坡、海瑞、冼夫人、胡诠、李广等忠义之士，都在这里扮演过忧国忧民的悲壮角色。而到了1931年，这里却涌现出了一支威震敌胆的红军女兵连，就是在梁信笔下的红色娘子军，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故事远比历史上的那些忠义之士要悲壮感人得多。

正如矗立在海南琼海县内园村中心那块高达5.8米的花岗岩纪念碑上的碑文所述：“红色娘子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1931年5月1日创建于乐会县（今琼海县）第一区革命根据地，她

们在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保卫领导机关宣传发动群众等项任务，并配合主力作战伏击纱帽岭火攻文市炮楼，拔除阳江据点及马鞍岭，阻击战斗中不怕牺牲英勇杀敌，为琼崖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53年，敬爱的周总理在北京马列学院听完琼崖纵队干部王雁秋向他汇报的红色娘子军的情况后，竟在激动之余喜形于色，高兴地一拍沙发扶手，倏地站了起来，用他有力的右手一挥说：“红色娘子军是世界革命的典范，要拍电影。”遗憾的是那时共和国经济困难，百废待兴，此事只好搁了起来。

到了1960年，红色娘子军连第二任连长冯增敏又来到了北京，而且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主席授予她一支苏式自动步枪，100发子弹，笔记簿3本，毛主席握住了她的手，这位在战争和苦难面前从不流泪的娘子军英雄，在人民的领袖面前，终于禁不住泪流满面，激动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毛主席则慈祥地微笑着，然后慢慢举起了一只大拇指，用他浓浓的湘音说：“你很不简单呀。”

《大师谢晋》 找火辣辣的大眼睛（2）

二、为“娘子军”寻找火辣辣的大眼睛（2）

《红色娘子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导演谢晋的脑海中悄悄地形成了一个明晰的构架。他觉得，他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把这支由妇女组成的红色武装的成长历程和传奇故事拍好，以实际行动，向这些革命老前辈们学习，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汇报。

大的框架定下后，接下来，就是要物色演员了，这部片子中有一个主人公，叫吴琼花，是个女一号，此人按谢晋的要求应有“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有了这双大眼睛，就会出刚毅、出倔强、出泼辣，用电影界的行话说：会出戏魂。因此，谢晋为了寻找这双大眼睛，几乎跑遍了中国的东西南北中。那时候，已回到广州军区上班的梁信几乎隔三差五就会收到谢晋寄来的信，信的地址是变化不定的，忽而上海，忽而天津，忽而辽宁，忽而北京……而每封信中，都会夹着几张姑娘的照片，但梁信挑来拣去，总觉得找不出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

几个月很快过去了，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仍然没有找到，谢晋似乎有点泄气了：“我万没有想到，要找这一双眼睛，竟是那么难。”谢晋有一次在信中对梁信叹苦说。机会终于来了，一次谢晋应邀去上海戏剧学院看由学生实习演出的话剧《在和平的日子里》，他到的时候，戏还没有开场，排演厅里人声嘈杂，唱歌、吊嗓子、排小品的各行其是。只有一个姑娘在排练厅的一角全神贯注地弹着钢琴，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南方人憨厚的气质使谢晋的心里咯噔一跳，仿佛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正在思索，忽见这个姑娘不知何故和一群男生吵了起来，而且吵得很凶，她一个人单枪匹马，毫不示弱，吵到激烈之处，连面孔和耳朵都涨得通红，谢晋正看得出神，忽见那姑娘转过来，无意识地看了他一眼，“啊，找到了，就是这双眼睛。”谢晋从心里喊了起来。

那个叫祝希娟的姑娘在当初也许并不知道，她日后走上漫长的从影道路并与谢晋结下长期合作的深厚友谊，与她的这双眼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虽然，一个演员要有所成就，要靠演技、素质、艺品，但机遇，对一个演员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如果那天谢晋没有去看这场演出，如果那天祝希娟不在现场，或者心情很好，没有与男生们发生争吵，如果那天她朝另外一个地方而不是朝谢晋看了一眼，如果……那么，祝希娟今天或许又会是另一个祝希娟了。

为了让好朋友梁信也分享一下他好不容易淘到的这个“宝贝”，谢晋连夜写信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信发出不久，他又觉得不太踏实，因为，一部片子中的主人公，光在信中的字行间里，是说不清楚的，他要把这个人带到广州，亲自让梁信目测验证，同时，也要考考梁信，他挑准的这个“宝贝”，与梁信是否“英雄所见略同”。为此，他又另选了11个与“火辣辣的大眼睛”有点近似的姑娘，专门带到了广州。在军区大院的一间会客室里，姑娘们并排坐着，这时梁信来了，他慢慢巡视了一遍，谢晋说，你看一看，我选中的是哪一位?

梁信指着一个皮肤略黑又不太漂亮的姑娘说：“就是她。”她就是祝希娟。

《大师谢晋》 找火辣辣的大眼睛（3）

二、为“娘子军”寻找火辣辣的大眼睛（3）

“火辣辣的大眼睛”找到了。接下来，另外几个主要角色的扮演者也陆续找到了，他们是：陈强——南霸天的扮演者，王心刚——洪常青的扮演者。陈强是谢晋一向敬重的老演员，他在这之前拍摄的《白毛女》中所扮演的黄世仁的角色，曾给谢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谢晋请他扮演南霸天，就是看了他在《白毛女》中的出色表演而决定的。相比之下，从影才三年多时间的王心刚那时还不是很出名，谢晋一开始并不认识王心刚，他是从一部名叫《寂静的山村》的反特故事片中认识这位英俊潇洒的演员的，在那部片子中，王心刚饰主演侦察员冯广发，此片上映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谢晋看中的则是王心刚的军人气质和凛然风骨，实践证明，王心刚在《红色娘子军》中所塑造的洪常青是成功的。

这里还要说一下女战士红莲的扮演者向梅。向梅在拍完《女篮五号》后，被上影厂的导演石挥看中，邀她在他执导的影片《雾海夜航》中饰演一个女大学生，因为向梅熟悉女大学生的生活，所以演得十分卖力，但遗憾的是，由于她总有露一手的想法，结果越想卖力地演，就演得越糟糕，人为的表演痕迹就越明显，她为此陷入了深深的苦恼。恰在这时候，向梅的家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她的父亲因为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批斗和凌辱含冤而死。而被打成了右派的母亲，在悲痛欲绝之中，因为放心不下大大小小的几个孩子，才没有跟随丈夫一起而去，面对生活和艺术上铺天盖地的打击和磨难，向梅的精神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就在她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谢晋再次找到了她，成为向梅真正步入影坛的引路人。谢晋这些年虽没有再邀向梅在他执导的影片中担任角色，但他是默默地注视着这位颇有前途的年轻女演员的成长道路的。他认为，作为一个演员，在漫长的演艺生涯中，偶尔的“偏向”甚至失败是完全正常的，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重

新振作起来，他叫向梅在《红色娘子军》中担任红莲一角，就是这个意思，他相信向梅能演好红莲，就像他相信向梅能演好《女篮五号》中的汪爱珠一样，这是个大有潜力的演员，是个极具天赋的演员，当然，谢晋还有更深一层意思，他希望向梅在参拍《红色娘子军》的过程中，尽快从笼罩在她心头的家庭悲剧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她是一个演员，她还那么年轻，在她的前面，还有许许多多的角色需要她去完成，她的艺术才华不应该因家庭悲剧的原因而夭折。

应该说，向梅是争气的，她知道谢导对她的期望和关心。她是个过惯了都市生活的姑娘，在这之前，农村生活对她来说仍是陌生的，但为了演好红莲这个角色，她去了海南岛。那时的海南岛是个人迹罕至生活相当贫困的地方，但她咬紧了牙关，与一个名叫冯增敏的原娘子军连连长住在同一间低矮潮湿的屋子里，生活的清苦自不待说，但是她挺过来了，并且在日后的银幕上，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小心谨慎、沉默寡语而内心又充满了对旧社会愤恨的悲苦女子的形象。而在完成了艺术塑造的同时，她也挣脱了生活笼罩在她心头的阴影，正像她自己所说的："《红色娘子军》的拍摄，使我尝到了进入角色的愉快……"

经过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艰苦拍摄，当《红色娘子军》全剧第718个镜头中最后一个镜头封镜的时候，已是1960年的年底了。初冬的海南岛，在北方早已是冰天雪地了，而在这里仍还是温暖如春，站在五指山下万泉河畔，红色娘子军们当年浴血战斗过的地方，谢晋真是感慨万千。可以这么说：这是他从影生涯中以导演身份直接接触革命题材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使他的心头产生最剧烈震撼的一部电影。现在，这部带有传奇色彩的电影就要完成了，明天，他们就要离开这里，离开这块曾浸透着娘子军鲜血的地方。

《大师谢晋》 找火辣辣的大眼睛（4）

二、为“娘子军”寻找火辣辣的大眼睛（4）

洗去了脸上的尘埃，挑破了脚上被草鞋磨起的血泡，揭去了姑娘们脸上被太阳晒起的黑皮，换下了一件件像当年娘子军穿的破衣烂衫，《红色娘子军》摄制组的大队人马于1960年的年底风尘仆仆回到了上海。接下来的便是紧张的剪辑、配音等后期制作。大家当时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巴不得电影能早一天上映，因为毛主席、周总理也在关注着这部片子呢。

但是，事情并没有像谢晋和摄制组人员想象的那么简单，麻烦一个接着一个出来了。其实，这种麻烦在《红色娘子军》开拍之初，就已露出了端倪。当时有人就提出《红色娘子军》有“战争残酷”和“爱情多余”的迹象，应当引起注意，但谢晋对此并未引起重视，因为他有自己的主张，只不过碍于当时正是“反右”期间，免得遭来麻烦，嘴里不说罢了。谁知片子拍出以后，人家并没有对此罢休，于是“折腾”开始了，好端端的一部片子，硬被加进去了许多概念化的东西，连爱情戏也剪掉了。在1989年9月出版的《谢晋谈艺录》一书中，谢晋对这次“折腾”作了这样的回忆：“《红色娘子军》样片送审时，夏衍、荒煤都吃惊地问‘洪常青与吴琼花这条爱情线怎么都没有了？’我说这是‘组织决定’。上海电影局党委审查影片时，我和作者梁信都有不同意见，我们坚持不删，除非是组织决定，当时正是反右运动不久，大家都小心谨慎，电影局领导很为难，说就算组织决定吧，这样就剪掉了。‘文革’时说这是上海市委的意见，影片横改竖改，现在后半部较概念化，这桩公案说明在中国要拍一部好影片是非常不容易的。”

“《红色娘子军》里的感情戏——吴琼花对洪常青的非常健康的爱情，夏衍、陈荒煤等同志曾极力保护，说不能再遭《渡江侦察记》的命运（该片的女游击队长与连长的感情线也被砍），还是没保住，被

砍掉了，搞样板戏时，这部影片便被当作大批判的‘靶子’，琼花那被战争风火撕破的衣服、脸上的灰尘，也都被说成是写战争的残酷。”

于是，这部在1960年年底就已拍成、原计划早应公映的影片，在经过了反复的“折腾”后，终于拖到了1961年的7月1日党的40周年生日这一天上映了，虽然，影片中许多精彩的镜头被剪去了，但《红色娘子军》仍不失为是一部优秀的影片，因此片子一上映，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尤其是由著名女作曲家黄准创作的《红色娘子军》连歌，那抒情雄壮的旋律，那明快而充满战斗性的歌词，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家喻户晓。

《大师谢晋》 慧眼识陈冲

三、慧眼识陈冲

不久，谢晋接到了一个本子，题目叫《青春》，在接到本子的一瞬间，谢晋咧开他的大嘴巴笑了。是啊，他正在为老之将至而叹息呢，现在，《青春》却找上门来了，这究竟是对他未来人生和事业的暗喻，还是偶然的巧合，他说不准。

《青春》写的是某部一个军医，立志为聋哑人解除病痛，勇于探索，终于用小小的银针捅开医学禁区的故事。可能剧本的作者是第一次“触电”的缘故，本子的基础并不好，但谢晋却喜欢这个题材，因为从这个尚较粗糙的本子里，他闻到了一股从生活中来的浓烈的青春气息。再加上这是他在粉碎“四人帮”后执导的第一部片子，因此，他格外看中这部片子，经过反复修改，又经厂里的专业编剧帮忙，本子终于通过，接下来便是拍摄，演员不少都是新的，原本也想在厂里挑选，但上影厂经过“文革”之后，原先的演员，死的死了，残的残了，老的老了，剩下的，在精神上和心理上，似乎尚未从“文革”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要拍这种以年轻人为主，青春气息又很浓的片子，似不适宜。谢晋把挑演员的任务交给了厂里的武珍年，武珍年当时正在创办上影厂演员剧团培训班，班里有许多小演员，她请谢导自己去挑选，谢晋叫小演员们每人表演一段戏，最后他看中了班里一个年龄最小的但充满灵气的小演员，才16岁。这是个天真的、稚气未脱而又很顽皮的“假小子”，她叫陈冲，那时候她还是上海青春中学的二年级学生。谢晋叫她在戏里扮女主角哑妹，哑妹的戏很重，因为不能用嘴说，只能靠表情，特别是片中有一场重头戏，当哑妹在军医的悉心治疗下，恢复了听觉，哑妹睁大了眼睛，满脸的疑惑，她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时候脸上要流露出惊奇，后来她终于明白，于是她便要表现出狂喜状，这种情感和表情上的瞬息变化和激荡起伏对一个老演员来说，尚且难以把握，何况对一个第一次演戏的小孩子，其难度可想

而知。但陈冲把握住了，当然她不是第一次就把握住的，而是在演了10次、20次，在经过了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无数次的流泪甚至痛哭，最后，差不多要被失望甚至绝望击垮的最后一刻把握住的。

《青春》在全国上映并获得了成功，这对陈冲是意想不到的，她才16岁，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孩子，这成功对她来说太突然了，她可以说连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当然，她更不会想到在若干年以后，这个成功对她今后的人生道路会带来多么巨大的影响。倒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父母亲比较冷静，当自己的女儿因演了《青春》一片而成为无数影迷心中的偶像时，他们却把女儿悄悄地送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这之前，他们曾征求过谢晋的意见，谢晋赞同他们这样做，仅凭这一点，他们就一直把谢晋视为自己的知音。

电影是不拍了，但《青春》放映后的余波还在陈冲的心中激荡着，除了不断的采访、上报、上电视和不绝于耳的赞扬外，更多的则是全国各地的来信，其中有一封信给陈冲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信是一位重庆的聋哑姑娘写来的，她说："本来我已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聋哑给我的生活带来无尽的痛苦和在青春的岁月里涂上了灰暗色，我难以自拔，当我看了你演的《青春》一剧后，万万没有想到，哑妹能有如此大的毅力克服痛苦的折磨，克服生理缺陷带来的困难，像健康人一样生活，想来，我多么惭愧。现在我也要振作精神和哑妹一样……"

就在收到这封信的半年之后，已是上海外国语学院一年级学生的陈冲被另一个导演"盯"上了，他叫黄建中。黄健中也是从《青春》中认识陈冲的，他邀陈冲演他执导的一部名叫《小花》的影片中的女主角，名字叫小花，陈冲又获得了成功。1979年，在中国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台上，陈冲因扮演小花一角而获得最佳女演员奖，这一年她才18岁。在此之前的历届百花奖评选中，她成为获奖演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对此，中国资深的影坛评论权威钟惦斐曾对此作过很高的评价，他说："继1963年的第二届电影'百花奖'之后，越16年而对赋予我们生活以美好电影的陈冲和刘晓庆同志，分别授予最佳女演员奖和

配角奖，它们记载的不只是中国电影生活的里程，也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里程，而最终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生活进入正常化的标志，陈冲从演出《青春》中的哑妹之后，便欲罢不能，观众之所以喜欢她，就是陈冲善于把握角色。”

而陈冲自己则说：“我真运气，第一个戏就遇上了好导演，从他的身上我懂得了勤奋是通向成功的阶梯。”“《青春》是我的处女作，许多感受是在今后的一生中都不能再重复的，每想起它，我充满了渴望和遗憾。它将永远在我的心中占有最珍贵的一角——跟初恋一样。”

因《青春》的成功而获得了赞誉同样令导演谢晋激动不已，不过这种激动并没有在谢晋的心头停留太久，便匆匆地消失了，因为谢晋心里很明白，《青春》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是因为它“生得逢时”，它出生在一个刚刚告别了噩梦般的岁月、?们的文化艺术领域正处在从严冬般萧瑟的荒原中清醒过来的时刻。人们渴求大自然的翠色，而《青春》正是无边的文化荒原中的一点绿色，于是人们便用加倍的宽容的态度接纳了它，并给以它激励性的赞誉。这正是中国电影观众的可敬之处，正是因为这种可敬，才使得中国的电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了广阔的市场和长久的繁荣。

《大师谢晋》 朱时茂当“牧马人”

四、朱时茂当“牧马人”

谢晋瞄准的下一部作品的名字叫《灵与肉》，确切地说，这是小说的名字，后来改编成电影剧本，叫做《牧马人传奇》，也叫《牧马人》，原作者叫张贤亮。这篇《灵与肉》，谢晋是从一本杂志上读到的，读完后，心里竟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于是就决定把它推荐给领导，而同时推荐给领导的，还有他近期从杂志中读到的其他几部好作品，如《心香》《杨花似雪》等作品，最后领导圈定了《灵与肉》。

谢晋的新片《牧马人》，按计划春节后马上就要去宁夏甘肃拍外景，但现在本子还未定下来，本子是他约他的老友李准改编的，李准是发过“三年不写电影”誓言的人，许多人请他都被他拒绝了，但老朋友谢晋去请他，他只好拍拍脑袋“食言”了。本子改得很成功，但有些细节还需要改。

对于《牧马人》，虽然还没有正式拍，但在电影界，特别是在上海的电影界，已经有些议论了，因为《牧马人》与《天云山传奇》几乎是同一题材的电影。《天云山传奇》写的是男主人公罗群被错划右派后对党对人民的信念，写了冯晴岚崇高的爱情以及对生活的美好情操、人情、人性的赞颂。而《牧马人》则写了男主人公许灵均被错划右派后，到草原做了牧马人，虽然受到了22年的不公正待遇，但在同朴实的劳动人民相处中，在同他勤劳的妻子李秀芝相濡以沫的爱情生活中，治好了心灵上的创伤，增添了对生活、对祖国、对党的热爱。应该说，这是两部有点大同小异的电影。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由同一个导演，去拍题材这么接近的影片，这不是在给自己出难题吗？而更具有风险的是，《天云山传奇》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几乎成了中国“反右”题材电影中的佼佼者，是一部带有典型性的作品，如果再拍《牧马人》，暂且不论它能否超过《天云山传奇》，就是面对日

益挑剔的电影市场，谢晋也必须三思而行，当人们从并不饱满的腰包里掏钱看了《天云山传奇》之后，还会再掏钱去看《牧马人》吗?

当然，所有这些问题，作为导演的谢晋，他比所有的人都要考虑得多，他不是一个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激情型导演，他是一个成熟的深思熟虑的对事物有独到见解的艺术家，他懂得哪些电影能拍，而且肯定能拍好，哪些电影不能拍，而且一定拍不好。他不会去冒无谓的风险，但他又是一个极具风险意识的艺术家。因而当他一口气读完张贤亮的获奖小说《灵与肉》之后，他认定这部片子可以拍，而且一定能拍好。

《牧马人》如期开机。年已57岁的谢晋与摄制组全体人员经过数百公里的长途跋涉，来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这就是创建于汉代的甘肃山丹军马场，是谢晋跑遍了新疆、青海后，最后才选定的地方。《牧马人》的主要外景都要在这里拍摄。与谢晋同来的还有原作者张贤亮和编剧李准。主要演员大多是些新面孔，这是谢晋一贯用人的风格。饰男主人公许灵均的朱时茂，是福建军区文工团的一名话剧演员，此前虽演过几部片子，但大都无影响。饰女主人公李秀芝的叫丛珊，还只有19岁，是中央戏剧学院一年级学生。只有饰许灵均父亲许景由的刘琼和饰郭喻子的牛犇是谢晋的老搭档。使用这些新演员谢晋也是冒着风险的，他说："朱时茂虽拍过几部戏，但是这次与角色（许灵均）的距离比较大，而第一次上银幕的丛珊，才19岁，进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学习才一年，要创造李秀芝这样一个从少女到少妇的农村妇女形象更有一定的难度。角色的生活他们都没有，既没有什么演出经验，生活阅历又浅，也没有什么表演基本功的训练。"因此，对待他们，他认为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小品做起，使他们首先掌握基调，向角色靠拢。于是，演员们在到宁夏农场体验生活时，谢晋就给他们出了一个《十年中难忘的十天》的小品，要求演员们通过对生活的观察、体验、与（对象）交朋友谈心。寻找自己角色的基调。寻找对角色来说是独特性的东西以及观察牧民的夫妻关系、注意生活中的细节

等等，来完成以下这十个小品的任务：（1）秀芝到农场的第一天；（2）相识第一夜长谈；（3）婚后的早晨；（4）两个月以后；（5）家庭变了样；（6）孩子出世了，给他取个名；（7）不愉快的一天；（8）改正平反回家；（9）北京来了通知；（10）离家前夜。这些小品的内容虽不是《牧马人》剧本中的戏，但却是这个剧本中的幕前幕后戏，如果做好这十个小品，可以使演员整天生活在角色之中，天天都在考虑角色，使他们从互不相识到成为有了五岁孩子的恩爱夫妻，从而不断揣摩出人物关系的变化。对此，谢晋曾专门把朱时茂和丛珊叫到自己的身边，叮嘱道："我给你们布置的十几个小品，能展示人物的各个方面。先找角色的基调，要从角色语言中、动作中去找，做小品。李秀芝要挖深度，许灵均要挖广度，因为这个戏中其他演员（如刘琼、牛犇）等都是有经验的，所以你们要五倍、十倍地努力，才能在排戏中融洽"。

《牧马人》在山丹军马场拍摄得很顺利，一切都在按原定的拍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因为对于谢晋来说，1981年的这一年，似乎显得特别的紧张。各方面的活动也特别的多，虽然能够推辞的，他都竭力的推辞了，实在推辞不了的，也只好去参加。3月24日，上海电影制片厂举行全厂职工大会，宣读文化部最近为热烈祝贺上影厂去年以来在影片创作生产中取得好成绩而写来的贺信及中国影协的贺电；贺信贺电中除了对上影厂80年超额完成了全年的创作生产任务进行表扬外，还对《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燕归来》等一批深受观众欢迎和好评的影片进行了表彰，这样的会议，谢晋只好参加了，不仅参加，他还在会上发了言，他说："天云山传奇"上映后，他收到的读者来信之多，是他三十年的拍戏生涯中所没有的。4月28日，文化部又在北京举办了1980年优秀影片创作奖发奖大会，谢晋的《天云山传奇》又得了奖，而评委委员又是谢晋所敬重的老前辈和老朋友，如周巍峙、夏衍、林默涵、陈荒煤、司徒慧敏、刘白羽、李英敏、陈播、张骏祥、袁文殊、钱筱璋、丁峤、谢铁骊、洪藏、林杉、王苹、钟惦棐

等人，谢晋又只好去参加。但对于5月中旬在香港电影文化中心举办的“谢晋作品展”，谢晋则只好忍痛割爱了，在这个“作品展”中，将要放映谢晋从50年代至80年代所拍摄的四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它们是《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放映期间，香港电影文化中心还将专门组织香港的观众座谈，讨论谢晋电影的风格及电影语言，并进一步探讨中国电影的创作方法和所涉及到的社会问题。应当说，这是一次具有相当层次又组织得相当严密的活动，这种活动，对于在素有“文化沙漠”之称的香港举行是十分难得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但谢晋实在再无法抽身了，作为《牧马人》的导演，他现在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应该放到拍摄现场去，而事实上，他离开拍摄现场的时间太多了，为此，他只好写了封信给香港的朋友，表示自己的谢意并告知自己目前拍摄的行踪。

《大师谢晋》不满从珊“激情戏”

五、不满从珊“激情戏”谢晋大为光火

《牧马人》在谢晋参加“双奖会”时仍按原定部署在紧张地拍摄着，谢晋回到摄制组的那些天，副导演鲍芝芳正准备拍许灵均与李秀芝新婚后重逢的一场戏，这是一场难度很大的戏，难就难在两个人这时候都没有结过婚，一对没有结过婚的年轻人演一对别后重逢的新婚夫妻，这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这场戏必须要拍好，因为这是一场重头戏。但在现场排练时，谢晋就发现丛珊根本没有进入到角色里面去，按剧情要求，扮李秀芝的丛珊应紧紧地靠在演许灵均的朱时茂胸膛上，而且靠上还不算，还要不断地在丈夫胸膛上蹭，从而表现出一对新婚夫妻在久别重逢后的亲热和爱恋。但试了几次，丛珊就是进不了角色，虽然两人也搂在一起，但一看就觉得别别扭扭，像在演戏，特别是“蹭”，谢晋要求丛珊反复在朱时茂的胸膛上蹭，眼神里流露出一种兴奋、激动和羞涩的表情，但丛珊不仅“蹭”不好，眼神也显得呆板和游移，谢晋火了，他第一次大声地训斥了丛珊，连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吃惊，因为大家虽知道他很严厉，有时严厉得不讲人情，但发这么大的火大家还是没见过。丛珊受到谢导的训斥，或许她长到这么大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受到训斥，委屈得哭了，“新婚重逢”变成了号啕大哭，眼睛红肿了，戏拍不下去了，谢晋的火气似乎更大了，他用几乎有点歇斯底里的声音向摄制组宣布“今天不拍了”，他说话时脸色苍白而冰冷，眼神里闪烁着骇人的光，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敢正面正视他，生怕被他捎带着训一顿。

当然，这一场戏，最终还是拍得很精彩，很动人，谢晋看了也很满意。那一天，当拍完了这个镜头后，大家坐在草地上，心情都非常好，谢晋的心情也非常好，他于是说起了那天批评丛珊的事，眼神中流露出些许的歉意。丛珊羞红着脸孔说，那天不是她不想“蹭”，因为朱时茂脸膛上的毛太多了，而且硬得很刺人，把她的脸都刺痛了，当

时连反感都还反感不过来，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想夫妻久别重逢的事，谢晋和摄制组的同志们一听都笑了，丛珊也笑了，在笑声中，大家终于取得了谅解，取得了信任，心也更齐了，劲也更足了。

作为1981年中国电影界的一部热点电影，《牧马人》的拍摄是自始至终受到中国亿万观众热切关心的，经过了紧张的后期制作，《牧马人》的样片终于出来了。这时已是1981年的年底。这一年，对于谢晋来说，可以说是个大丰收年，也可以说是三喜临门年，一喜是在电影百花奖和金鸡奖中获得了双奖，二喜是《牧马人》终于拍摄完成，三喜是他被评上了上海市的劳动模范。这三喜当中，唯最后的一“喜”令谢晋最为激动，拍电影是他的本行，一部电影拍摄成功，并获了奖，当然高兴，但这是他的职业，他应该这么做，而劳动模范，这可不是容易获得的，他活了50几岁，又在电影界奋斗了几十年，获得这样崇高的荣誉，还是第一次，这说明了党、政府和人民对他艺术成就的鼓励和认定，也说明了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被排除在劳动者之外的历史，永远结束了。

《牧马人》放映后所引起的轰动效应是电影界和谢晋本人所预料中的事。1982年，中国10亿人口中究竟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片子，这是没有办法再作精确统计的，但对于刚刚从“文革”的阴暗中走向光明的中国人来说，即使他没有去电影院看过《牧马人》，也必定听说过这部影片的名字。

《大师谢晋》 争夺“花环”（1）

大师谢晋四

任何一场正义的战争，都会在这场战争的进行当中或结束之后，催生出与这场战争同样辉煌和伟大的文学作品。16天的战争，铸就了16天的辉煌，而16天的辉煌，则成了文艺家们创作中取之不尽的源泉和宝藏。

一、争夺“花环”

1979年春节前夕，在中国云南边境一个叫都龙公社的地方，一个名叫卫国的小伙子在即将与他相恋多年的情人完婚之前，不幸踩上了一颗由越南军人埋在中国境内的地雷，再也没有醒来。

在这之前，与这个国家仅隔一条边界线的我广西、云南地区的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有数百余人被打死打伤，而半年之内这个国家对我国的武装挑衅竟达470次之多。在一段时间内，我国这个原来和平安泰的土地，顿时腥风血雨，生灵涂炭。面对如此明目张胆地侵我领土、毁我村庄、杀我军民，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罪恶行径，1979年2月7日，我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在被迫之下，对侵略者进行了奋勇还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中越自卫反击战。

任何一场正义的战争，都会在这场战争的进行当中或结束之后，催生出与这场战争同样辉煌和伟大的文学作品。尽管这场中越自卫反击战才进行了短短16天时间，但这可以说是浓缩了的16天，这16天，对于整天醉生梦死的人来说，的确是太短了，短得几乎来不及品味人生太多的享乐和快乐。而对于处在战争状态下的前方将士们来说，又的确是太长了，长得几乎望不到尽头，许多人，就在这16天中的第一天，就走完了生命的旅程，而有的人，在这16天中的最后一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16天的战争，铸就了16天的辉煌，而16天的辉煌，则成了文艺家们创作中取之不尽的源泉和宝藏。

由济南军区政治部歌舞团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创作员李存葆创作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可以说是所有描绘和再现这16天辉煌的文艺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高山下的花环》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反击战前后，我国基层步兵连队普通平淡生活的真实画卷，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我军官兵战士的鲜明形象，娓娓动听地讲述了这些普通小人物们感人肺腑的命运，展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情操、胸怀、理想、爱情、生活和死亡。

《高山下的花环》发表以后所引起的轰动和震动是令人始料不及的，它的问世，就仿佛是在人们的头顶上爆炸了一颗氢弹，而当这颗氢弹的硝烟散去之后，被兴奋和激动所鼓荡的人们才静静地思考起来，为何以前那么多描写这场战争的作品都没有像这篇《高山下的花环》那样具有辐射力和穿透力呢，为何当人们看了以前的那些作品之后，虽然也激愤过，虽然也流过泪，但都没有像读过这篇作品之后，陷入了沉思。而在这千千万万个沉思者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沉思者，一年半以后，当他把自己的沉思变为行动之后，他献给中国观众的是一部比小说更具冲击力和震撼力的作品，这就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这个人就是谢晋。

谢晋是在中国作协创办的大型文学期刊《十月》杂志上读到《高山下的花环》这部小说的。在上影厂，大家都知道谢晋有两大嗜好，一是喝酒，二是收集刊物，他自费订的报刊杂志有数十种之多，有一些拍摄题材，如《牧马人》《国殇》《人约黄昏后》等等，都是他从这些刊物上读到后，才引起他的兴趣的，当然，这些题材中有些拍摄成功了，有些因种种原因没有拍成。但不管怎么说，谢晋对这些报刊杂志，是情有独钟的。诚如他自己所说：“五十年代《新观察》创刊，我订阅时还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那时学习劲头很大，除了如饥似渴地学习有关电影、戏剧、文学本行的专业知识外，还挤时间，抽空隙阅读各种期刊。其中，《新观察》使我得益很多。它使我从各个侧

面认识社会，认识时代，认识世界，也使我扩大了眼界，从各种角度认识各种各样的人物，各行各业的新鲜事物。”又说：“我爱读小说和报告文学，有相当数量的这一类作品，不但可以让人感受到时代脉搏，且它们忠实地反映了生活中亿万人民心中的声音，引导和推动历史前进。我从这些优秀作家身上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献身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火光。这是十分值得我们电影工作者学习的。”

《大师谢晋》 争夺“花环”（2）

在《十月》杂志中读毕刚出版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后，谢晋的心被小说中的人物和命运震撼了，他说：“我是在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下阅读《高山下的花环》的，不少段落使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当第二次，第三次阅读时，它还使我一再流下泪水。经验告诉我，如果将这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我能将它拍好。”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我第一遍看小说，为这一家的命运和精神哭了，第二遍看时还哭，第三遍看时还有泪，小说能够这样强烈震动我，我相信电影也能震动大家。”

这就是谢晋决定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最初的冲动，也可以说，是他职业的本能，他的职业就是要把好的题材搬到银幕上，按他的好友罗艺军所说，谢晋是不会漠视社会生活热点的。现在，这“热点”就在他的手心里，他怎么会把它轻易放弃呢？但话又说回来，这部颇具“热点”的小说现在虽捏在他的手心里，但能否搬上银幕去，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中国有见地的艺术家多的是，自从《高山下的花环》一问世，艺术家们的眼睛便睁大了。大家感觉到一部好作品问世了，中国描写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并不少，但唯有这部作品很特别，因为涉及中越乃至中苏关系上的恩恩怨怨。它不同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其他对外战争之处，使这场战争的性质由以前通常所说的阶级斗争而变为爱国主义。而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第一次突破了几十年来军旅文学的一条不成文的戒律，相当尖锐地触及到现实部队生活当中的内部矛盾乃至腐败。这在当时的中国军事文学创作中，堪称是一块里程碑，因此，作品一经问世，顿成洛阳纸贵，全国各地根据小说改编的各类艺术作品：话剧、歌剧、舞剧、广播剧、吕剧、评剧……纷纷跃上了各地的文艺舞台。

在全国各地上演的二十几台话剧《花环》中，第一个将《花环》的艺术形象动人逼真地献给观众的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同志们，而

离作者李存葆生活工作地点不远的山东电视台，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在1983年的“八一”建军节，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六周年之际，用最快的速度将《花环》的电视连续剧推出，从而夺得了当年的“飞天”最佳电视连续剧奖。至于全国各地的大小报刊杂志连载《花环》小说的原本，或者选载《花环》小说的精彩章节，那更是不计其数，不胜枚举。

这还不算，阵容强大而又嗅觉灵敏的全国各大电影厂的领导和编导们，这时也为了夺得《花环》的改编权，从一开始的暗中争斗发展成了后来的公开“厮杀”。而在这场硝烟弥漫各不相让的拉锯战中，八一电影制片厂一开始可以说是稳操胜券，因为早在1982年4月，《花环》尚在李存葆的“母胎”中，他只不过是在全军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谈了谈作品的基本情节和构思，八一厂的一个编辑就盯上了，因为同是军人，大家容易沟通，他就与李存葆商量，要他把《花环》修改权，让给八一厂。但李存葆是个很实在的人，他不想开空头支票给自己军队的电影厂，因此也没有明确表态，待到《花环》一出来，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八一厂的那位编辑又赶紧来找他，但这时李存葆周围的电影厂编辑或编剧，已围成了一大圈。这场电影厂之间为了争夺一部作品的“拉锯战”，最后终于走上了“公堂”，这个公堂就是济南军区政治部。

谢晋就是在这个时候乘虚而入的，说是乘虚而入，其实也不是，因为早在半年前，也就在《花环》最山花烂漫时，上影厂文学部就派出了一位颇有能量的女编辑武珍年赴泉城与李存葆谈判，武珍年当时有两张牌，第一张是，如果《花环》由上影厂拍摄，执导的将是大名鼎鼎的谢晋大导演；第二张牌是，如果济南军区政治部同意把修改权让给上影厂，改编将由鼎鼎大名的李准大编剧出马。这两张牌一出，《花环》的作者李存葆亦不得不持更为审慎的态度。没想这时候，第三张牌又来了，不过这张牌不是从武珍年袋里摸出的，而是从首都北京打来的，打牌的人是中国赫赫有名的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协的负责

人冯牧，他写了封信给李存葆，说：他是以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不断流着眼泪读完了《高山下的花环》的，他希望这部小说能及早搬上银幕，最好交给上影厂去拍，而导演非谢晋莫属……就是这一张牌，使一直举棋不定的济南军区政治部和李存葆本人下了决心，把修改权交给了上影厂，交给谢晋。

至此，历时半年之久的电影界为角逐《高山下的花环》电影修改权的“拉锯战”，终于硝烟散尽，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谢晋后来在谈起这件事情时，曾激动地说：影片《花环》的成功，冯牧当立头功。

1983年7月的一天，谢晋与上影厂副厂长王林谷、副导演武珍年一起赶赴济南，与专程从河南赶来的李准汇合，去青岛找正在修改《花环》剧本的李存葆讨论有关剧本修改方面的事。因为在这之前，李存葆曾经拉出过一个初稿，在动手之前谢晋和李准、李存葆，还有解放军文艺社编辑李培森曾共同议过一个修改方案，谢晋对这个修?方案，作了简洁、明了的概括，他说：“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有很大的生活容量，很大的思想容量，它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可以在改编它的时候给我们留下很大的创作余地。不少话剧是按小说以赵蒙生的转变线索为主，而我们影片的脉络是以梁三喜一家（梁大娘、韩玉秀）的命运为主线，结合展开了靳开来一家（杨改花、小虎）、雷军长一家(雷凯华)、赵蒙生一家（吴爽、柳岚），还有金小柱和他的父亲等五个军烈属家庭在这场自卫反击战中的悲欢离合。”

《大师谢晋》改“花环”苦熬十天

二、李准改“花环”苦熬十天

应该说，剧本修改的思路和脉络是十分清晰的，按理这个剧本由原作者李存葆执笔，是最理想的人选了，但李存葆的一稿出来后，谢晋不满意，于是只好请李存葆再改第二稿，谁知二稿出来后，谢晋仍然不满意。这时谢晋的心里，真的有点焦急起来了。俗话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文学剧本是影片的基础，一个能打七十分的剧本经过导演和全体人员的刻苦努力，可以达到八十分，一个仅仅是六十分的剧本再努力也难达到八十分。”

看来，只有叫李准改编这一条路可走了，但要叫李准改，又必须动员他把手中正在创作的《双雄会》放一放。这一稿，必须是一心一意地改，而不是三心二意地改，而且必须要改好，因为时间不能再拖了，舆论已经造出了，老是不见有动静，说不准又会生出什么枝节来。

李准答应暂时把手中的《双雄会》放一会，再改《花环》的第三稿，当然，这是他在听到李存葆真心实意的恳请后才答应的，因为李存葆是原作者，原先又讲好先由他主笔，他不能做反客为主的事。不过，修改之前，他也不是没有要求的，他的要求很简单，既然叫他单独修改，就由他一个人改，而且在十天之内，任何人不要打扰他。谢晋和李存葆答应了他的要求，大家说好，除非有天大的事，这十天内决不“理睬”他。果然，到了第八天，面色憔悴的李准把一个改好的本子送到了谢晋的手上，谢晋面无表情，抓起本子就看，随着剧本的不断翻动，谢晋原本绷着的脸慢慢地荡开来，随后他的脸肌松动了，随后嘴巴咧开了，随后剧本看完了，随后他满意地笑了。

谢晋是个平素不太轻易表扬人的导演，但面对一个心坎里满意的剧本，他还是禁不住想表扬他的老朋友李准几句：“剧本最触动我的地方，也是我生活中最想发言，最要抒发的那种感情。《高山下的花

环》引起我最大共鸣的是梁三喜这一家。这是因为这一家的命运最拨动我的心弦。我在日记中写到：‘梁三喜这一家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灵魂，民族的伦理。’这个家庭所以能引起那么大的震动，还因为这一家人的命运真实而又自然地抒发了人世间最难能可贵的革命之情、天伦之情。人情、感情的抒发，没有矫揉造作，没有空洞的口号，没有贴标签，一切顺乎情理。人的感情在这一家人身上得到了最美的体现。这种美的体现，在国内国外都能得到共鸣。”

对于李准来说，这难熬的十天时间总算没有白过，因为，没有什么比谢老头子的笑脸更让他宽心的了，但话又说回来，假如他不度过这十天的煎熬，谢晋也决不会放过他的，即便他“逃”到天涯海角，谢晋也会想尽办法找到他，将他欠他的文“债”逼出来。

剧本通过，谢晋就急着赶回上影厂，厂里的领导也正焦急地等着他，剧本出不来，他们的压力也很大，现在导演一关迈过了，最后还要经过厂党委和厂艺委会讨论，如果通过了，剧本就可以正式拍摄了。就如谢晋所料，厂党委和厂艺委会对这个本子是满意的，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厂党委和厂艺委会全票通过。消息传到北京，立即也传来了热烈的反映，陈荒煤同志建议在拍《花环》时最好要加强梁三喜这个人物，而刘白羽同志说：梁大娘这个人物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一定要加强。冯牧同志则十分喜爱小北京，几次嘱咐谢晋要加强他的分量。面对这三位文艺界前辈对《花环》的热情关心，谢晋内心里真是感慨万千，他说：“《高山下的花环》小说能够出来，完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成果。试想一下，在以前，这篇小说，这个剧本能出来吗？那不成了给部队抹黑？《高山下的花环》这么尖锐地写了死、血、穷、苦、债、悲伤、甚至还写牢骚、写官僚主义，不正之风，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大家都成熟起来了。”

这之前一直对外界的舆论作低调处理的谢晋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一个好本子到手了，也就是说电影《花环》已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只

要演员选得好，各部门共同努力，这一炮一定能打响。在一次会议上，因喜悦之情油然而生的谢晋甚至向大家发出了这样的宣言："作为写军队生活尖锐矛盾划时代作品的《高山下的花环》，是中国影坛的第一个，影片《高山下的花环》要超过自己所有的作品，电视剧、十几台话剧都有了，退路没有就没有好了，拍不好《高山下的花环》，我永远和电影界告别。"

这哪里仅仅是宣言，这几乎是把自己逼到悬崖绝壁上去了，这就是谢晋的风格，他这人说话向来都是算数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然，也有热心的观众为谢晋的这句话捏了一把汗，他们说：万一谢晋真的把《花环》拍砸了，那么，中国的影坛上，不就要陨下一颗耀眼的星星了？我们不就看不到他拍的电影了？当然，能解答他们的担忧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谢晋。

《大师谢晋》唐国强毛遂自荐

三、唐国强毛遂自荐

虽然完成了剧本，还来不及好好喘上一口气，谢晋又被挑选演员的事弄得焦头烂额。电影界里的人都知道，谢晋挑选演员很特别，甚至很古怪，有一些演员大家都说好，而谢晋却连想也没想到他，而一些演员，长期受人冷落，偏偏谢晋相中了他，这并不是谢晋别出心裁，或者故弄玄虚，更不是他歪打正着，而是有着深刻道理的，因为谢晋有谢晋的审美眼光，谢晋有谢晋的用人标准，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凡被他相中的演员，许多人都出了“山”，甚至平步青云，成为中国影坛耀眼的星星。那么，这一次，谢晋又会挑选谁呢？《花环》要拍电影的消息传出之后，在电影界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当然，震动最大的，还是演员们。因为机会毕竟太难得了，中国几十个电影制片厂，最多一年才拍摄几十部上百部电影，而中国有名气的演员又那么多，很多人几年当中才临得着扮演一个角色，当然还不大可能是主要角色。因此，只要一有新片投拍的消息传来，影坛便会出现一阵骚动，演员们可以说是各显神通，有写信毛遂自荐的，有打电话请谢晋高抬贵手的，有托关系找门子的，有请权威人士写条子要求照顾的，甚至有人千里迢迢风尘仆仆来招待所直接面陈谢晋的，等等，不一而足。这期间，谢晋光收到的信足足有上千封之多，这还不包括好事者上海《青年报》转给谢晋的数千封信。这家在读者中颇具影响力的报纸，或许是出于一种对电影《花环》的企盼和厚爱，专门在该报辟出栏目，搞了一个“请您为《花环》摄制组推荐演员人选”的栏目。一时间来信来函如雪花一样飞到编辑部。最后统计出来，竟有四千封之多。这些宝贵的信函，也都转到了谢晋的手中。

坦率地说，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哪种途径，谢晋对每一封信，每一张便条，甚至每一个电话，每一次求见，他都是十分重视和谨慎的。因为他要找的正是他需要的演员，现在大家这么热切地关心着

《花环》，这么热心地想来参与它，这应该是好事，说明《花环》在演员们的心目中，有着多么重要的位置。虽然有些人的做法并不是他所赞同的，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或许一些好演员，正在他们其中。比如扮演韩玉秀的盖小玲（后改名为盖克），就是她找到谢晋住的北京西直门某招待所，有人介绍她过来找谢晋的，那时候她还在中央实验话剧院读书，既没有名，也没演过有影响的戏。但谢晋看她这人气质很哀婉，是个悲剧型，与韩玉秀的生活很贴近，于是就将她留下来，事后证明谢晋眼光是准确的。但遗憾的是，就在盖克主演了《花环》而功成名就后不久，她就远去了美国，谢晋对此感到非常惋惜，在他看来，盖克是可以成为一名优秀演员的。

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八一厂演员唐国强，也是毛遂自荐中的一个，当时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自荐信给谢晋，他在信中说：他非常希望有一位富有经验的园丁将自己这棵长了过多枝杈的小树修剪修剪。唐国强当时已经演过几部戏，一开始反映还不错，但不知为什么，他后来演的几部戏，都反映平平，这使他的心情很不好，特别是有人把“奶油小生”这顶帽子套在他头上，更使他恼火。因此，他在信中慨然向谢晋提出了要求，希望谢晋能让他扮演赵蒙生一角，他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谢晋当然不是被唐国强美丽而激昂的言词打动的，他从内心里觉得唐国强这个演员的气质的确与赵蒙生相近，而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哀兵必胜”的理论，因为此时的唐国强正处在急欲奋发的状态中，他不甘心，他要重整旗鼓，所以，他在塑造人物时必定会竭尽全力。因此在文艺界同仁和摄制组大多数人的坚决反对下，他斗胆启用了唐国强，事实证明谢晋的眼光是正确的，在整个《花环》的拍摄过程中，唐国强扮演的赵蒙生从开始时志得意满，接着被人冷落，最后振作起来完成了自我价值的重建。特别令观众难忘的是，在九连向敌人的无名高地冲击时，连长梁三喜牺牲了，这时候，目睹了刚才一切的赵蒙生在阵地上发出了一声近乎狼嚎般的大吼，由于拍摄时全身心投

入到角色的体验之中，唐国强的脸扭歪了，手被枪栓划出了一个大口子，以至于鲜血如注，他也不知。后来有评论家说，唐国强付出的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因为正是这一声大吼，把赵蒙生的形象树立起来了，也把唐国强的形象树立起来了。因此，无论是启用盖小玲也好，还是启用唐国强也好，谢晋不愧是独具慧眼的艺术家。这一点，连许多当初极力反对他的人，最后也不得不佩服。

但话又说回来，虽然已经物色了韩玉秀和赵蒙生的扮演者，但他们毕竟还不是最主要的角色，最主要的角色是梁三喜和靳开来的扮演者，但这两个人目前又在哪里呢？茫茫天涯，朗朗乾坤，要寻找谢晋心目中的这两个人，谈何容易。

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副导演武珍年这些天没有少挨谢晋的‘克’，主要演员无着落，老头子近来情绪不好，连他最钟情的酒，也几乎不碰嘴唇了。但干着急又有什么用，难道她武珍年不急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谢晋还要急，因为她是副导演，物色演员是她的事，演员没物色好，她能吃得好，睡得稳吗？

9月底的北京，正是一年中最美最好的季节。这是一家人容光焕发欢欢喜喜地外出旅游的季节，也是辛勤劳作了大半年的农人终于盼到了收获果实的季节，总之，它是个令人陶醉的季节，但这个季节，对于客居在北京西直门一家招待所里的谢晋来说，却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再过几天，就要跨入10月了，《花环》自从向外界发布消息以来，至今已过去了半年多时间，但时至今日竟连主要演员也未物色好，这部从中央领导到地方老百姓都在热切关注的片子什么时候才能与观众见面呢。不错，这些天他天天都在脑海里盘划着物色演员的事，凡是能够看到的《花环》剧目，无论是话剧也好，歌剧也好，电视剧也好，无论是地方剧团演的，还是军队剧团演的，他都看过了，中国一些有名气的男演员，在他的脑海里也像是梳头一样，几乎被梳了个遍，但是，梁三喜在哪里呢？靳开来又在哪里呢？

凭心而论，中国的演艺界可以说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各式人等应有尽有。如果按一般标准，挑一个梁三喜和靳开来的扮演者，应该不成问题。但谢晋心中却另有标准，他要找的必须是有“男子汉气质”的演员，不漂亮，有特点，要硬派，最好有军人气质，能掌握一些军事动作，丑点也不要紧，因为丑也是一种特殊的美，这就是谢晋要找的梁三喜和靳开来。也就是说，是他心中的梁三喜和靳开来。

因为主要演员没物色好，国庆节也过得不愉快。虽然外面的景色是那么的美，气候又是那么的宜人，可看到谢晋板着的那张脸，看到那张紧抿着的有棱有角的仿佛随时都会朝你喷出一腔怒火的嘴，大家谁还敢去玩呢。

《大师谢晋》 武珍年东北逮“老虎”

四、武珍年东北逮“老虎”

国庆第二天，谢晋还是开口了，他觉得再待在北京这个圈子里面找，恐怕不会再有收获了，他要武珍年立即赶到长春去，但长春能否找到梁三喜和靳开来，他也没把握，反正去碰碰运气吧。作为《花环》的副导演，武珍年当然是知道谢晋挑人的标准的。但谢晋总觉得还是不放心，于是，在送她上车时，还再三叮嘱她：漂亮不应该是选择演员的唯一标准，唯一的标准是符合角色的形象，在物色演员时绝不能开后门，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找不到理想的就不开拍。

武珍年走了，带着谢晋的重托，带着全国观众的期望，也带着她自己的企盼，心中是忐忑不安的。成败在此一举了，如果长春还找不到理想的“梁三喜”和“靳开来”，那么他们只好从北京打道回府了，而《花环》也就面临着以下的选择：要么挑选谢晋并不满意的演员担任梁三喜和靳开来，要么《花环》拍摄的时间无限期地拖延，直至找到理想的人为止，而这两条，对于正处在创作激情中的谢晋来说，无疑是太残酷了。

在长春，武珍年住进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招待所。深秋的长春，比北京要冷得多了，漫步在长长的斯大林大街上，冷凛的西北风把地上的梧桐树叶吹起来，在半空中漫无目的地飞卷着。武珍年触景生情，不禁感慨万端，她想此时此刻，她难道不也如这梧桐树叶一样吗，在长春，她人地两生，举目无亲，而身上又肩负着这样的重任。万一完不成任务，她将怎样去向谢晋、向她的恩师交代呢？这么一想，她的心里不禁油然涌起一股苍凉而无助的感觉。但是，上苍最终还是把成功的绣球抛给了武珍年。在招待所，武珍年竟意外地遇到了一位曾在上影厂拍过戏的女演员，真是巧她娘打巧，巧急（极）了，喜出望外的武珍年就像找到了一位多年不见的亲人一样，紧紧地拉住了她的手。

在这个女演员的引荐下，第二天，沈阳市话剧团一位名叫吕晓禾的演员进入了武珍年的视线。武珍年不看也罢，一看，竟禁不住脱口而出："嗬，老天，我总算找到你了。"站在相对瘦弱的武珍年面前，年已三十九岁的吕晓禾是那样的挺拔，他的黑而粗糙的阔脸，他的发达的一用力就会凸起一块一块疙瘩的肌肉，他的又黑又亮被包裹在一圈浓密睫毛中的大眼，他的那个布满着坎坷的有点不太规则的鼻子，尤其是那张嘴唇有点外翻的阔阔的大嘴，这张大嘴曾使吕晓禾失去了一次扮演敌后武工队队长李向阳的机会，也使他失去作为一个男子汉在女人心中的风采，尤其是笑时，特别是在大笑的时候，这张大嘴所牵动的肌肉能把他的整张脸笑得变形。应该说，在一般人的眼里，他算不上一个英俊的男人，但在武珍年眼里，他却是一条硬汉，一条的的确确的硬汉，这样的硬汉，你能在一米远的距离外，感觉到他的辐射。武珍年开心地笑了。吕晓禾也笑了，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馅饼，幸福怎么会落到他的头上呢。

物色好了梁三喜，但还缺少一个靳开来，如果有了梁三喜，而没有靳开来，《花环》主角仍然缺着一条腿，不能拍。看来，只有拜托吕晓禾了，既然长春能出梁三喜，想必也能出一个靳开来。

吕晓禾听武珍年说还要找个靳开来，就咧开他的大嘴巴笑了，他甚至连想也没想，就推荐了一个人：长春市话剧院的何伟。何伟何许人？武珍年没见过，直至拉着吕晓禾闯进何伟的家，武珍年又乐了，这个长着络腮胡子，虽比吕晓禾矮了一截，但粗壮厚实的东北汉子活脱脱一个靳开来，尤其是那双滚圆的有点玩世不恭的大眼睛，与靳开来的形象简直太像了。

来长春才几天，就逮住了两只"东北虎"，简直把武珍年给乐坏了，她是个急性子的人，真恨不得把这两个大汉装进口袋里，带到北京去，但毕竟两人也是有单位的人，不是说想走就走的，再加上何伟这几天骨折，腿上的石膏还未拆，再紧打紧算的，也需要有一段时间，吕晓禾与何伟邀武珍年在长春再玩几天，也好谢谢这个伯乐的知

遇之恩，但武珍年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她知道她的心里虽然急，可住在北京西直门招待所里的那个人比她还要急。她要再不回去的话，万一把那个人急出毛病来，她可是承担不起的。

但武珍年这次可是急懵了头，待她兴冲冲地从长春赶到北京西直门招待所，把吕晓禾何伟两人的情况前前后后、详详细细向谢晋一汇报，谢晋问她要照片，她才想起把这件要紧的事忘了。要是在往常，武珍年这一次难免又要挨谢晋一顿“骂”，但念她这次长春之行的功劳，谢晋也就“饶”了她。

一星期很快就过去了，这一天，两个黑乎乎的东北汉子，互相搀扶着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北京，他们找到了武珍年，武珍年把他们介绍给谢晋，谢晋打量了两个人一眼，脸绷着，嘴抿着，眉毛紧皱着，过了好一阵，便冷冰冰地叫两个人做小品，在场的人心里都像揣了个小鼓，咚咚地直敲着，武珍年也被谢晋今天的表情吓得直犯怵，要是老头子对这两个人还不满意的话?她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漫长的一天终于过去了，这一天，对于吕晓禾和何伟来说，也许是永远值得纪念的，这一天，可以说是他们从艺当中最难熬的一天，这一天，也可以说是他们一生当中获得了最大转机的一天，从这一天起，他们的名字，将会在中国影坛的人物画廊里，占有了一席十分重要的位置。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影坛灿烂的天幕上，又有两颗耀眼的星星在冉冉升起。

谢晋对这两位年青人加入《花环》摄制组的欢迎方式是传统而又特别的，那就是用他家乡的绍兴酒热情款待了吕晓禾和何伟。每当他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或者在他心情舒畅的时候，他就会把那坛香气四溢的绍兴酒打开来，分给大家喝，即使你是个滴酒不沾的人，他也要叫你喝，谁又会拒绝喝一杯高兴的喜酒呢。但话又说回来，若是他的工作不顺利，或者心情不好的话，他是没有兴致喝酒的，相反，如果你喝了酒，把酒气带进摄制组，那么，你可就有好瞧的。

吕晓禾和何伟喝了谢晋的“御酒”，尽管两位东北汉子是喝惯高浓度白干的，对南方糯糯的黄酒不习惯，可也只好硬着头皮喝，因为谁敢当着谢晋的面说他家乡的酒不好喝呢。更有甚者，当三个人喝足了酒，步出到餐厅的时候，身材高大红光满面而又和蔼可亲的谢晋竟一手搂着一个人的肩，像顽皮的孩童似的畅笑着。忽然，吕晓禾对谢晋说：“谢导，有的人说我的嘴巴太大了。”谢晋看了吕晓禾一眼，咧开他自己的那张大嘴巴笑了，说：“嘴巴大好啊，说明你是吃地瓜长大的，能体贴老百姓的苦。”这句话一出，把在场所有的人都逗笑了。

《大师谢晋》“花环”练兵（1）

五、“花环”练兵（1）

1983年10月3日，经过了漫长的半年多时间筹备的《花环》摄制组终于正式成立，这一天，各路人马从全国各地集结到北京钢铁学院留学生楼。这一天，李存葆从山东赶来了，李准也从河南赶来了，摄制组几乎所有的人全来了。面对这支即将出征的充满生机而又阵容庞大的队伍，谢晋的心情十分激动。作为电影拍摄当中的‘三军’统帅，他在会上作了一番极具煽动性而又十分鼓动人心的讲话，他说：“《花环》剧组既是个生产单位，也是个科研单位，又是个学术单位。全组要明确提出一句口号：坚决围剿模式化，向陈旧感，一般化，平庸化发动进攻。在艺术上要提倡创新，提倡争论，要有对艺术魅力的刻意追求，做到离生活越近越好，越真实越好。达到看不出导演、摄影、化妆、录音、表演等方面的痕迹，要在严肃严峻的历史背景下，表现一个崇高、悲壮的诗性颂歌，展开一个崇高、悲壮的诗性画卷，不但要使中国人民喜欢，也要得到国外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承认和喜爱，要争取把《花环》打到世界影坛上去，占领一席中国人该有的地位。”

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次激动人心的会议上，谢晋还提出了一个令摄制组全体人员颇觉新鲜的名词——研究观众。要知道，这还是在198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还没有被人正式提出，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当然也包括电影界，都还在温暖舒适的计划经济的温床上梦境未醒。谢晋这时候提出要研究观众，其实质就是要研究市场，因为你再不研究市场，市场就要开始冷落你了，他说：“我们过去只研究作品，再深入一步就研究作家，而从不研究对象——读者。拿电影来说就是不研究观众。好像我们的电影功能跟社会学、美学、跟娱乐、跟目前观众的主观经历没有关系。后果已很明显，近年来掏钱买票来看电影的观众日益减少。”“为什么群众喜欢这一些作品，不喜

欢那一些作品，这与他们目前的主观经历，处境和感情有很大关系。《高山下的花环》写大事，抒大情，讲出了许多老百姓想讲的话，许多生活里明明是非常好的人，却没有受到重视，这些情节都和他们的主观经历结合起来了，电影要争取多一些人看，一定要研究观众心理。”

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最初的形成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些萌芽的话，那么，谢晋在拍摄《高山下的花环》时提出的这个论点，无疑就是这些萌芽中的一片嫩叶，若干年后，当他投亿元巨资拍摄他的得意之作《鸦片战争》的时候，他采取的是股份制形式，尽管这在电影界当中又开了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先河，但此时此刻，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奔涌向前，再也无法阻挡了。事实证明：《鸦片战争》在中国电影业江河日下的形势下能够顺利发行，取得良好的业绩，无不与在操作过程中按市场法则行事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山下的花环》则是谢晋萌生市场意识的一块试验田，也是他的电影在影视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和残酷的形势下能够凝聚观众和占领市场的一块坚实的基石。

难怪在谢晋那天的演说结束后，有人问李准：电影《花环》拍成后，能否超过电视剧《花环》？李准是个很谦逊的人，他笑笑说：“争取要比电视剧好些。”正巧谢晋走过来，听到后，便大声说：“超过电视剧？那你把标准定低了。”谢晋说的这个标准除了影片的艺术质量外，是否还包括影片的市场定位和市场操作呢，这当然只是藏在谢晋心中秘而不宣的“秘密武器”了。

《大师谢晋》“花环”练兵（2）

五、“花环”练兵（2）

《花环》摄制组在剧组正式成立后的第八天启程，即1983年10月30号，去剧中人梁三喜的故乡——革命老区沂蒙山区体验生活，沂蒙山也是《花环》作者李存葆的故乡，因此谢晋选在这个地方作为演员体验生活的地方，是别具匠心的。

11月15号，摄制组全体人员在沂蒙山区体验生活结束，时间虽然只有半个月，可对演员们来说，这半个月的感触却是很深的，他们在这里得到的体验是住在城里永远无法得到的，特别是当地的人民对党的感情竟是那样的深，对自己的军队竟是那样的爱，是出乎演员们的意料的，虽然他们的生活还很穷，环境还很差，他们的一切与城里人相比，特别是与面前的这些演员们相比可以说是无法比拟的，但他们对党的情，对党的爱还是那样的坚决和执着，他们相信生活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他们更相信，共产党，解放军，才是他们的大救星，大恩人。这是一种真正的情，一种真正的爱。正因为有这样的情，这样的爱，才孕育出了红嫂和梁三喜，孕育出了梁大娘和韩玉秀，孕育出了一大批革命的先驱者和后来人。

因要去法国参加“南特电影节”，已先期回到上海的谢晋在南京军区上海的招待所——延安饭店为摄制组全体人员安排好了住宿。当带队的副导演武珍年风尘仆仆地跨进延安饭店617房间的时候，谢晋自己则去法国西部的南特市参加第五届三大洲电影节——南特电影节了。在这届电影节上，谢晋作为唯一一个参加电影节的中国导演而备受艺术家们和当地市民的特别关注，在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布列塔尼大饭店里，他的巨幅工作照和《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的剧照被挂在大厅的正中，这种显眼的布置和编排，在所有与会的各国艺术家眼里，是一种相当高的殊荣了。当然，更令各国同行钦慕的是，就在南特电影节开幕的当天起，在法国颇有名气的“阿波罗”电影院里，谢晋

执导的《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等九部影片，将依次在这个电影院里展映。因此，有一位外国记者称谢晋是这届南特电影节上的“皇帝”，也许是不无道理的。

在法国待了十多天，谢晋就急匆匆地回国了，虽然法国同行竭力挽留他多待一些时日，但谢晋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因为他心里牵挂着《花环》。《花环》一天不拍成，他的心里一天不安宁。

离家十多天，谢晋要求武珍年天天叫演员们做小品，武珍年虽是个女的，可对演员却像谢晋一样狠，有些演员第一次到上海，难免想去看看南京路，逛逛大世界，可武珍年就是不答应，其实她心里也十分同情这些演员的，人之常情嘛，可她敢开这个口子吗，万一被老头子知道了，不骂得你眼前金星乱迸才怪呢。因此有人说了句玩笑话，叫武珍年跟着谢晋转，大家了也只好跟着武珍年转。

总算老天爷帮忙，谢晋回到了上海，他就叫演员们做小品。小品做完后，他开始像以前一样板着脸不表态，眉头紧皱着，直吓得武珍年和演员们心里打小鼓，直到晚饭时他从那只编织精巧的小草篮里拿出两瓶葡萄酒，大家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但这并不是说他对所有演员的小品都通过了，对有些演员的表演痕迹太重、动作逻辑安排不合理、许多戏太过，他还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这种批评他是有根有据的，批在点上，所以大家面子上虽有些过不去，心里还是服帖的。

《花环》的内景戏排演得基本可以了，接下来就是外景拍摄了，谢晋把出发的时间大致定在12月16日，没想到在起程的前三天，即12月12日，发生了一件在谢晋的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事。那天，上海电影制片厂第三创作室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慎重讨论并通过了谢晋的入党申请书，并接受他为中共预备党员。这一天，谢晋静静地坐在电影厂那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里，面对他所熟悉的党员同志们，脸上闪现出与他这个年龄有点不太相称的红光和兴奋。他是一个历经磨难毕生坎坷的人，他经历过的曲折和打击太多了，从“反右”开始到“文

革”当中，不幸和灾难几乎一个接着一个袭击着他，但他却是个意志坚强的人，而支撑着他意志的是信念，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他心里仍然闪耀着一盏灯，那就是他相信共产党，他要紧跟共产党。

谢晋入党的消息在次日的《文汇报》上见了报，这件事在文艺界的震动是很大的，这震动并非来自谢晋入了党，而是大家真正意识到党确实将自己的胸膛敞开了。

12月16日，备受世人注目的《花环》摄制组大队人马，在谢晋的率领下，乘着一只大型飞机，向昆明进发，当天抵达后不久，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铿秀、政治委员谢振华分别在繁忙的公务中，接见了剧组有关人员。两位首长对《花环》剧组到前线拍电影，表示非常欢迎，希望谢晋能尽快把《花环》拍出来，送给在前线守卫边疆的指战员们看。谢晋也向两位首长谈了一些在《花环》拍摄中需要部队大力支持的事，张司令员当即表示说：只?部队能做到，一定全力配合好。

第二天，摄制组大队人马就直奔边陲重镇屏边县。这天，谢晋要带领大家去瞻仰一个烈士墓，这个烈士墓坐落在屏边县南边，有几百位烈士长眠在这里，他们大多是在1979年那次自卫反击战中为国捐躯的，年龄最大的不过三十五、六岁，最小的才十七岁。

谢晋带着大家，迈着沉重的脚步，沿着墓冢间铺垫的花岗石台阶，一步一步往前走。四下寂静无声，大家唯恐惊醒了正在灿然的鲜花丛中酣睡的烈士英魂。只有几声抑制不住的抽泣打破了这墓地的宁静。

站在这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一具具新坟面前，谢晋禁不住泪水涟涟，他是个自控能力很强的人，一般的情况下，大家很少见到他会流泪，但是今天他却再也控制不住了，因为躺在他面前的是几百具那么年轻的烈士遗骨，曾几何时，他们还是那么的生龙活虎，那么的朝气蓬勃。生命就像这南国旺盛的红棉树花一样，是多么的灿烂夺目，而现在，他们却长眠在这里，他们的妻子，也许刚刚向他寄出了儿子满月时拍的照片，他们的情人，也许正在台灯下给他写着含情脉脉的

情书，他们的母亲，也许正倚在门框上，向远方的大路上眺望，因为儿子来信说，他快要探家了。多么平和安详的生活图景啊，然而，这幅美丽的生活图景却被无情的炮火摧毁了。

哭得最伤心的，是老演员童超了，这位年近60的老艺术家，大病还未痊愈，就跟着大部队上来了，他的腿脚还不听使唤，只好拄着拐杖。此刻，他似乎已不是以一个军长扮演者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来到这里，他的心在剧烈地颤抖着，在流着血。他不敢大声恸哭，只好任凭泪水沿着他布满皱纹的脸庞，流下来，落在他的衣襟上，落在他脚下的这块红色土壤中。

瞻仰完烈士陵园，谢晋就带着摄制组马不停蹄，朝驻扎在南溪的边防部队——一个团队队部进发。这是个英雄的团队，在自卫反击战中，一级战斗英雄李成文烈士，就是这个团队的一名战士。谢晋带的摄制组，就要在这个拍电影体验生活，然后才进行实拍。

春节在不知不觉中临近了，《花环》开机之前的大部分工作这时已基本就绪，被称为“工作狂”和“谢旋风”的谢晋应该松一口气了，经过他的恩准，演员们在大年29日放假回家，正在欢呼雀跃之际，他又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所有演员，都必须在正月初五，也就是2月6日准时回来，不得有误。大家虽觉得谢导定的这个时间，似乎太苛刻了一点，但转而一想，比起演梁三喜的吕晓禾来说，他们已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因为谢晋决定，其他人在春节可以回家，唯有吕晓禾不能回家，因《花环》的成败得失，最关键的在吕晓禾演的梁三喜身上，他要吕晓禾在春节期间好好静下心来，把梁三喜这个人物的“精髓”吃透。对此，吕晓禾在14年后的庆贺谢晋从影五十周年的座谈会上，回忆起这一情景，他说：“那年春节其他人都走了，谢导要我留下来，招待所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真是孤独啊，特别是听到了马路上传来的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听到孩子们欢快的嬉笑声，我在想这时候，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在干什么呢，也许，他们也在马路上开心地玩着鞭炮，也许，他们正坐在家里，企盼着我回去，也许，那一桌丰盛的

年夜饭他们已热了一遍又一遍……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当然，吕晓禾是坚强的，毕竟，他是条硬汉。

《大师谢晋》“花环”实战（1）

六、“花环”实战（1）

1984年2月18日，马不停蹄地从上海赶到山东蒙阴县外景地的《花环》剧组拍下了第一个外景，三个月前，这里曾是《花环》剧组的演员们体验生活的地方，现在，《花环》由幕后正式地转了前台，“实战”开始了。

山东初战，拍下许多精彩镜头，总共花了七天时间。2月29日，大队人马云集昆明，云南“激战”的序幕也渐渐开启。

而真正临战的空气这时也真的凝重起来了，对方的挑衅在加剧，有时虽也处于相对的平静之中，但这是大战前的平静，是潜伏着杀机和血腥的平静。

南溪还是两个月前的南溪，可以说是山水依旧，不同的是，在它的上空，笼罩着一种沉重不安和紧张。还有些许愤怒和无奈。因为谁也不知道，对方射来的子弹和炮弹，会不会落到自己头上，而更可气的是这些子弹和炮弹，正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手制造的，又用自己的肩，给对方运送过去的，这是农夫与蛇的现代版，是中国的“伊索”寓言中的经典。

因为《花环》中有许多战斗场面的戏，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铿秀将军派他的部下、军区作战部原副部长高峰来担任《花环》的军事顾问。这样《花环》中战斗场面的真实性有了可靠的保证。

3月11日，《花环》的大部队开到了距边境不过三公里的地方，准备实拍《花环》中有许多重场戏，将要在这里拍摄。虽然地方和部队对《花环》的大力支持是无可挑剔的，但这里的气候，却为《花环》的顺利拍摄，出了许多难题。除了闷热不说，这里的气候一是多雨，二是多雾，原本已计划好某天某时要拍摄的某组镜头，因为天公的突然变故而只好临时取消，或者无限期地推迟，从而使整个拍摄进程，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好在大家团结一致，有时气候稍稍转了，

大家就见缝插针，抢拍镜头。有一次，摄制组要拍一场部队吃饺子的戏，地点在橡胶林的营地，包饺子，对于北方人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对于南方人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包出数千个饺子，部队必须在白天野外的营地上吃，而且要有太阳，这就难煞了导演和道具组的同志们。有时早晨起床，天上明明挂着太阳，于是赶快把几个北方人召集扰来，和面的和面，擀皮的擀皮，调馅的调馅，没想等到大家忙得气喘吁吁地把一大堆饺子包好，天又下起了雨。直至雨停了，原本好好的一个个很挺括的饺子早砣了。有时早晨倒没有太阳，摄制组看看没有希望只好去拍其它的镜头谁知刚刚拉开场面，太阳又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等大家气喘吁吁地赶回去，七手八脚的把饺子包好，太阳又在转眼之间不见了。总之，这一场戏着实把谢晋折腾得够呛。从3月19日开始拍摄到3月27日拍毕，整整用了八天时间，真可谓靠天吃饭，难上加难。

拍摄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整个拍摄过程，对所有的演员们来说，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陶冶的过程，在这里，大家没有怨言，没有牢骚，没有三心二意，更没有敷衍搪塞，这里充满着团结、友爱、纪律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而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大家对烈士的崇敬和追思。有这么一个插曲：有一天，按计划要拍第二章的一场戏，这是场重头戏，按剧情要求，一个乌云密布的晚上梁三喜和靳开来来到了一起，明天就要出征了，一对亲密的战友就要同上战场，是死是活，可以说凶吉难卜，于是，两人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以示壮别。这场戏在李存葆的小说原作中是没有的，后来在改编成电影剧本时李准把它加上去的，可以说是他的得意之作。对这个情节，谢晋也是十分满意的，因为它不仅描写了大战之前一个军人的真实思想状态，还在颂扬英雄主义的同时，大胆展现了一个军人，同时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儿子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是作者和导演把一个英雄的军人作为一个有着同样七情六欲的人来描写的可贵尝试。这种尝试，起码在《花环》之前的所有的军事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但如何才能将这个可贵的尝试形象生动地展出来呢，可以说是从剧组成立到现在，一直都在不断的修改和反复的争议，有时连谢晋也不知如何处理好，因为这一段戏演员把握分寸很重要，过一点则悲，平一点就温，但要做到恰到好处，谁又演过这样的戏呢？由于把握不准，吕晓禾和何伟曾设计了多种方案都没有得到谢晋的认可，以至于两位演员后来拒绝再公开排戏，连谢晋请他们也没用。为此，这段时间大家心情都不大好，有一次，为何伟究竟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的事，谢晋还狠狠地把何伟训了一顿，谢晋说何伟原来是单眼皮，怎么一下了竟变成了双眼皮，肯定去整过容，还挖苦说，将来唐国强奶油小生的位置要让给你了，何伟说他根本没有去整过容，是睡觉起来后变成这样的，但谢晋根本听不进，照样大声吼，何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与谢晋争吵了起来，后经吕晓禾等人劝解，才将争吵平息。到了晚上，何伟的眼睛又恢复了单眼皮，谢晋知道批评错了，当晚?向何伟道了歉。何伟后来回忆说：“那次与谢导吵了后，我心里真是后悔呀，我这是干吗呢，谢导这么大年纪了，比我父亲还大，他批评了我几句，就是打我几下，又有什么了不起，没想到到了晚上他竟提着一瓶酒向我道歉来了，那天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说实话，如果我父亲狠狠地把我揍一顿，我还不一定会哭，但谢导演这一道歉，我却哭了。所以我说，我这个人是三生有幸，如果没有谢导演，就不会有我何伟今天，《花环》是我拍的第一部影片，我何伟今天有点小名，还不是从这部片子开始的吗？”

经过几天的酝酿，这一天，吕晓禾、何伟找到了谢晋和武珍年，说可以拍“壮别”这场戏。于是各个部门都做好准备，道具组拿来了白酒，录音组打开了机器，播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在苍凉悲壮的音乐声中，两位演员脸色凝重，一边喝酒，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在酝酿感情。二十分钟后，已完全进入了角色的两位演员醉红着脸开始向自己的战友“壮别”，灯光不知不觉地打开了，三台机器不知不觉地转动起来了，工作人员的眼泪也在不知不觉地流下来，因为现场需要

绝对保持安静，大家才强忍住呜咽和啜泣，直至这出长达三分钟的“壮别”戏拍完，大家才一拥而上，嘴里喊着：“成功了，太成功了。”谢晋站在一旁，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而眼眶里却分明蓄满着泪水。

转眼之间，4月初到了，除了“战后连部招待所，无名高地、主峰、坟地”等几场重头戏未拍，其他的戏已基本拍完。因此，按原定计划摄制组将在这个月的下旬，要离开南溪。

《大师谢晋》“花环”实战（2）

六、“花环”实战（2）

但这时候，边境的形势又开始吃紧起来，越军又不时地向我国的一些边境村镇炮击，造成很大伤亡。我人民解放军边境部队都已奉命进入一级战备，在潮湿狭小的猫耳洞里待命，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4月2日上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广西边防部队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被迫向越军的几个重要军事设施和阵地开炮。从而重创了越军的有生力量，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使尖锐对峙中的边境形势恶化到了极点。仿佛只要谁轻轻地拨弄一下那根战争之弦，一场大战就会在即刻之间爆发。

昆明军区的首长这几天也特别关注《花环》的拍摄情况，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拍摄的进程，因为据可靠情报，河内的“越南之声”广播电台已在广播里报道了谢晋在边境拍摄《花环》的新闻，措辞严厉，字里行间充满了威胁、恫吓的火药味。而几乎在同时，不时又传来越军特工人员潜入我境内进行干扰破坏的消息。所有这些情况都引起了军区首长的高度重视和警觉，要知道，这支引人注目的百十几号人的摄制队伍，正在离边境仅千米之遥的高地上拍戏，越军的任何一种，哪怕是射程最短的火炮，都可以使炮弹打到这里，万一有什么闪失，这个担子，昆明军区是无论如何担当不起的。因此，军区首长在将战情和敌情通报给谢晋的同时，也含蓄地暗示了另外一层意思，希望尽快结束在边境前沿的拍摄，尽快撤下去。

其实这何止是昆明军区首长的意思呢，就是在摄制组内部，也早已有人提出了撤出南溪的建议。这倒不是说这些同志怕死，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因为《花环》摄制组的驻地以及所有的拍摄点，都处在战争炮火的直接控制区。在这种情形下，别说对没有当过兵的

绝大多数摄制组人员来说心情很紧张，就是对当过兵，甚至打过仗的人来说，心里也不会很坦然，毕竟，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他们面前的敌人，不是电影中扮演的敌人，而是真正的敌人，那些黑洞洞的炮口对准大家的大炮，也不是电影中的道具，而是真正能把人炸得血肉横飞的大炮。

谢晋表面上依然故我，照样有说有笑，一副轻轻松松的样子，但他的心里却是沉甸甸的。是啊，大家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万一他们住的房子顶上落下一颗炸弹，或者越军派几个武装敌特在夜里来袭击一下，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但形势就这么摆着，该怎么办呢，《花环》已经拍到这个分上，总不至于停下来打道回府吧，这样，他们又该如何向全国人民交待呢。不错，为了安全起见，把队伍从南溪撤下来那是很容易，不用半天功夫，保证撤得无影无踪，然后，再到内地找一个地方补拍。但这样一来，谢晋所毕生追求的艺术真实以及演员在前线的典型环境中刚刚找到的那种自我感觉，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在《花环》拍摄前立下的把质量最好的影片献给全国人民的诺言，都要化为泡影了。

《花环》摄制组仍然坚守南溪，继续拍摄，这是《花环》摄制组临时党支部、导演组和制片主任作出的铮铮决定。决定一出，一度有些动摇的军心也就很快稳定了下来，当然，必要的防范和安全措施还是要做好的，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嘛。在越军炮击后的第七天，谢晋在昆明军区首长的全力支持下，把队伍拉到了一个距越南仅千米之遥的高地上，这时要演出的一场戏叫“无名高地，主峰攻坚战”，是场重头戏中的重头戏，因为在这个高地上，不仅要展示梁三喜、靳开来所在的九连敢打敢拼英雄勇顽强攻克主峰的整个过程，而更重要的是，梁三喜、靳开来和“小北京”都要在这里牺牲而赵蒙生和段雨国的思想转变和精神升华也要在这个高地上完成。因此，拍摄场面之激烈，参加人员之多，气氛之悲壮，是以前的拍摄中所没有的。

4月9日，“无名高地，主峰攻坚战”正式开拍，一时间，这座长满茅草和芦苇的小山包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穿插到位的九连，要在这里与越军决一死战。

按原计划这场戏必须要在五天内完成，因为昆明军区首长针对近日日益恶劣的边境形势又连续多次指示，希望尽快拍完，及早撤下来。但在这关键时刻，老天又来作难，比如拍靳开来牺牲一场戏，按剧情要求，靳开来牺牲时必须是毒日当头，战士们口渴难耐，这样才能为靳开来违反纪律去砍越南老百姓的甘蔗而不幸触雷牺牲的场景作铺垫。但平日摄制组拍戏不要太阳时，太阳却一个劲地出来讨好，现在要太阳出来了，太阳又不见了。直至到了13日早上，天空才现出放晴的迹象来，高兴得何伟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一边大声嚷：“太阳你快点出来吧，让我早点牺牲吧。”一边去催化妆师化妆。何伟长得胖，天生爱出汗，前几天太阳也躲躲闪闪的出来过几次，每次化妆师给他手忙脚乱地化好妆，太阳就不见了，这时候可把何伟折腾得够惨了，自己究竟是卸妆呢，还是不卸妆，卸妆的话，说不定太阳待会儿又出来，自己大汗淋漓的又要上一次妆，如果不卸妆，让那些五颜六色的东西粘在人脸上，可不是好受的，特别是大热天，那些东西与人的汗水一混合，都发出怪味了。

总算是老天爷帮忙，13号这天，太阳还真的要让靳开来牺牲了。这一天，太阳自从出来后，就一直火辣辣地照在当空上。于是，摄制组全体人员立即做好了准备，全神贯注地为靳开来“送葬”，不一会，戏开拍了，并且很快就进入了高潮，在一声沉闷的地雷声过去之后，只见扮演炊事班长的李丹军背着血肉模糊的靳开来进入掩体，所有的演员都进戏了，在那种特定的氛围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在演戏，而都认为靳开来真的离开他们了，于是悲痛欲绝的哭声顿时而起。

机器一停，掩体里面鸦雀无声，只有那轻轻的抽泣声，打破了这“战场”的宁静。显然，大家还没有从刚才失去战友的悲痛中缓过神来。

谢晋站在摄影机旁，两眼噙着泪花，仰天凝神，不言不语。

《大师谢晋》“花环”实战（3）

六、“花环”实战（3）

接下来是梁三喜牺牲，因天气的原因，而使靳开来挨了四天才算“死”成之后，老天似乎对梁三喜的牺牲也必怀不甘，总是变着法子与导演作对，好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似的。最后，当愈来愈紧的战争形势不允许再这样无限期地拖下去的时候，谢晋只好采取第二套方案用照明组撑起的一面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巨幅尼龙华盖，把多余的阳光遮住，营造一个天阴地昏的战场氛围，好歹把梁三喜中弹以后脸朝地下的牺牲场面拍完。

在经历了几乎与靳开来牺牲时相同的悲痛欲绝的感情伤痛之后，摄制组人员一边擦眼泪，一边收拾起行装。这是《花环》摄制组在南溪拍的是后一场战场戏，也是整部《花环》中最震撼人心的戏。现在斯人已去，英雄不归。接下来，他们就要拍童超、王玉梅、盖克、唐国强等人在草地的几场重戏，拍摄的地点就在南溪附近的烈士陵园内。十天前，谢晋曾带着演员们来这里扫过墓，斯琴高娃和盖克抬着演员们自扎的花圈，走在队伍的前面，谢晋率演员们跟在她们的后面。陵园内有一柱直刺云端的纪念碑，碑上镌刻着两行金色的墓志铭：你们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活在你们的事业里。这短而精彩的墓志铭，使演员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或许正因为这震动，墓地这几场戏拍得很成功，也拍得很轻松。特别是高娃，真不愧是个德艺双馨的好演员，她来到南溪前，还在青岛拍片子，听说《花环》中她演的杨改花的戏要提前拍，于是就把自己手中的活放下，一路奔来了，到了拍摄现场后，她就一个人找个地方坐下来，什么话也不说，悄悄地酝酿自己的情绪，等正式开拍了，她立刻就进入了角色。以至于连一向不太表扬人的谢晋，也禁不住赞扬起来：“我拍了这么多部电影，接触了那么多演员，从未见过像高娃这样，能轻松自信地掌握自己的情绪、分寸感极强、既快又准确地进入角色的演员。”

4月24日，《花环》摄制组在拍完了部分战前、战后及全部战中的戏之后，悄悄地撤离了南溪。两次南溪之行，《花环》摄制组在南溪总共度过了一个月零十九天时间。这个时间，对于长年辗转在全国各地拍片的演员们来说，应该说并不是太长，有的电影，在一个拍摄点待上几个月甚至半年的，也不属稀罕，但对于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拍片的演员们来说，这个时间显然是太长了点。毕竟，子弹和炮弹是不认人的。好在正直的战神保佑了这些为弘扬正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来这里拍片的演员们，最终使所有的人皮毛未损。当然，虚惊还是有的，就在《花环》摄制组撤离南溪的第二天，越军的几发炮弹，落在了演员们曾拍过戏的山头上，当然，这不过是马后炮罢了。

4月26日，《花环》摄制组又在江川、马龙一带扎下营寨，这里离云南边境已经很远了，不过这里要拍的戏，却是整部《花环》中场面最大的，谢晋要在这里展现的，是197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自卫反击战中大兵团挺进的壮阔场景。4月26日下午4时整，随着三发红色信号弹蹿上天空，谢晋导演的这场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大兵团作战的战争戏拉开了序幕，一时间，战场上坦克轰鸣，势不可挡，公路上军车滚滚，尘土飞扬，一眼望不到头的大部队在急速行军、大步向前，装备新颖的机械化部队在舟桥上飞驰前进。天空中闪烁着无数夜光弹，水面上腾云起几十米高的水柱。一时间，大炮声、呐喊声、引擎声和厮杀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水雾、硝烟、尘埃遮天敞日，勾勒出一幅真实而壮阔的战争图景。

谢晋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手里拿着望远镜，不时地举起来，就像一个将军一样，在密切注视着战斗的进程和战场的变化，只不过，他是一个没有对手的“将军”，他们要达到的，并不是战争的胜负，而是真实。

自从2月底离开上海以后，《花环》摄制组已在广西、云南等地转战了三个多月了，由于时间紧迫，摄制组又在四川的广元、剑阁等地拍摄了一些战前戏，如“抒情的田野”、“河边洗澡”、“山头拉练”、“靳

开来议论赵蒙生”、“勒开来穿花裤衩”、“梁三喜陪韩玉秀来队探亲”等镜头之后，于6月6日回到上海，这样，谢晋原先提出的《花环》拍摄中山东为初战、云南为激战、四川为大战、上海为决战的四大部分戏，已完成了四分之三，剩下的只有上海决战这部分戏了。但说是上海决战，听起来火药味挺浓，其实真正的战场戏，一个也没有，全都是内景戏。但就是这些内景戏，往往决定着《花环》成败的命运。因此，谢晋一到上海，几乎顾不上休息，就赶到已先期回沪的剪接师周鼎文那里，直至看了一遍已接在一起的外景样片后，心中才有些底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当谢晋满有把握地准备在上海“决战”时，从北京传来一个坏消息：童超又一次跌倒中风了，这是他的第二次中风，来势好像比第一次还凶，连口鼻都歪了。谢晋听到后，人一下子懵了，半晌没有说话，这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童超在《花环》中饰雷军长，他的大部分重场?都要上海拍，如果他瘫在床上的话，不仅他在云南前线出场的部分外景戏要泡汤，更重要的是，谢晋向全国人民许诺的在明年“五一”节拿出《花环》诺言就成为一纸空文。这可如何是好呢，童超啊童超啊，你早不生病，晚不生病，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生病，你这病也生得太不是时候了。摄制组的人每天见面后，都要说这样的话。而远在北京西苑中医研究院的童超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他人虽然躺在床上，可心里想的却是谢导演，是《花环》摄制组，他恨自己这毛病，恨自己这毛病生得不是时候，他觉得自己太对不起谢晋，对不起摄制组。因此，他强烈要求马上出院回上海，当然，他的这个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院方的否决，也遭到了身旁女儿的反对。于是，他在肚子中的怨气无处发泄的情况下，只好把矛盾对准了女儿，与女儿闹别扭，与女儿呕气。

6月9日这一天，童超住的病房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正在生闷气的童超下意识地转过头，眼睛一下子亮了，原来，远在上海的谢晋，派他手下的助理导演李丹军，专程来北京看他了。

躺在床上的童超竟一下子坐起来，兴奋地拉住李丹军的手，问这问那的，其实，童超离开摄制组才几天，可这几天，对他来说好像已经过了几年了。

李丹军发现，童超除了说话不太利索外，其他方面的病情好像并未像原来想象中的那么严重，这使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同样，当他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一喜讯电告谢晋的时候，谢晋这些天来一直紧锁着的眉头也即刻展开了，“我知道童超不会倒。”他事后对摄制组的同仁说。的确，作为谢晋特邀的这名话剧界老演员，谢晋是了解童超的，这是位堪称德艺双馨的名演员，无论是人品，还是艺品，都是值得受人尊敬的。凭他丰富演艺经历，凭他对生活和艺术的把握，他是能够演好雷军长这个角色的。童超身体一直不好，曾经得过一次中风，这次来《花环》拍戏，谢晋曾想给他开“小灶”，但童超反对给他开“小灶”。去沂蒙山部队体验生活时，气温降到零下二度，他去了，像一个新兵一样，在操场上学走路，学敬礼；去河口南溪体验生活时，气温又升到摄氏四十度，他也去了，和剧组的演员们一起，爬山、涉水、忍受毒日曝晒，蚊叮虫咬，因此，摄制组里只要提起童超，大家都会对他流露出深深的敬意。

但童超毕竟已是花甲老人了，特别是这第二次中风，对他的身体造成的损害，是很严重的。为此，即便李丹军在电话中对童超的病情作了比较轻松的描述和良好的预期，谢晋还是在数天之后，派上影厂的厂医马大夫，专程飞到北京，对童超的病情作一次客观的评价，如果童超的身体确如李丹军所言，并无大碍的话，那么，马大夫就直接带童超回上海，因为时间不等人，《花环》完成的时间离明年“五一”节，可以说是迫在眉睫了。如果童超的身体并非像李丹军所言的那么乐观，甚至更严重，那么，所有对于童超的期望全将破灭，他谢晋总不可能将一个中风瘫痪的老人抬着去拍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花环》的命运就惨了。

老天爷保佑，马大夫对童超身体检查的结果与李丹军的话是吻合的。有了这一个基础，他们又说服了童超所在单位北京人艺的领导和北京西苑中医研究院的医生，提前将童超接出来，并在6月18日，一起飞到了上海。

《大师谢晋》 轰动观众（1）

七、“花环”亮相轰动观众（1）

1984年8月13日，这对谢晋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个日子他已经盼望很久了，为这个日子的到来，他和《花环》摄制组的同事们，曾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汗水啊。而现在这个日子就要到了，但不知为什么，他的心里反倒生出一些不安和惶恐来。这是为什么？因为《高山下的花环》就要接受审查了。他和摄制组全体同仁为之奋斗了一年多心血的结晶就要亮相了，这次亮相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好是坏，是优是劣，是美是丑，他不得而知。因为《花环》的对白双片刚刚出来，上影厂的领导就急着要看了，他们也和全国广大观众一样，对《花环》这部片子的问世有点迫不及待了。

审查《花环》的白双片是在上影厂的放映室里进行的，参加审查的有厂长徐桑楚、副厂长韩尚义等领导。谢晋及主创人员和全体演员作陪。几位领导神情严肃，端坐正席，不言不语，看得出，他们的心也和谢晋一样紧张和不安。

但这一片笼罩在领导们心头的忧云愁雾，在两小时二十五分钟之后，就渐渐散去了。随着《花环》最后一个镜头的结束，银幕上的画面消失了，灯光开启了，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有的人在抽泣，有的人在不断地擦着眼睛，有的人仍在默默地流泪。老资格的电影家和上影厂厂长徐桑楚用手绢擦着红肿的眼睛，他不想掩饰自己对于这部影片的由衷喜爱之情，握着谢晋的手连连说：“我非常满意，非常满意。”谢晋舒心地笑了，老厂长是中国电影界的权威，他的话一言九鼎，他能对《花环》作如此的评价，谢晋心中一直悬着的一块巨石落地了。

接下来是8月16日接受市电影局张骏祥、吴贻弓等领导的审片。与前次审片一样，当影片结束，放映室的灯光重新开启时，谢晋发现他的老师、上海电影局局长张骏祥正用手绢反复地擦着自己的眼睛，看

得出，他的眼睛已经很红肿了，而坐地他旁边的吴贻弓正低着头，在使劲地卡自己的脑门，从他高耸的鼻腔中，发出抑制着的抽泣声。

影片在上影厂领导和市电影局领导的严格审查后顺利通过，虽然审查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但传递出去的信息在观众中所引起的震动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谢晋在影片正式公映前，每天都接到大量的来信和来电，他们问的问题几乎是相同的：《花环》何时才能与观众见面呢?

谢晋的心里当然也很着急，作为导演，他当然巴不得马上将自己的作品与大家见面，但这又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影片正式公映前，要做的前期工作还很多，而最主要的当然是审片。

因此，在上海有关方面的领导对《花环》审查结束后，他又在9月4日带着已经混录合成完毕的《花环》进京送审，也就在他到达北京的当天下午，中央电影局的石方禹局长和顾问陈播就有点迫不及待地对《花环》进行了审查。这种工作速度，在新中国的电影史上，也是少有的，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电影界的领导对这部片子的关注和期盼。两位领导对《花环》审查后的评价是简洁而明了的：满意，相当满意。

第二天下午，文化部丁峤副部长也审看了《花环》。这位资深的老部长竟禁不住连连称好，说："《花环》是一部非常难得的优秀影片，极为感人，震人心弦。"9月8日下午，中国电影家协会又特请电影界的权威人士陈荒煤、冯牧、钟惦斐，总政文化部的刘白羽顾问，副部长李瑛等领导观看《花环》。正在参加整党的总政文化部与会人员也暂停当天下午的活动，全部参加观摩。放映结束，观摩的人员十有八九都红着眼睛，连连说："太感人了，太感人了。"那天刘白羽对《花环》可以说是作了最理性的概括："巨大心灵震动的艺术是最崇高的艺术。"

10月下旬，对《花环》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谢晋，再次来到北京，不过这次不是来接受领导审查的，而是来接受观众审查的。一

年前，也就在《花环》正式拍摄前，谢晋曾提出过，《花环》的拍摄一定要有观众意识，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你拍的片子观众一定要喜欢看，这是谢晋针对日益不景气的中国电影市场提出来的，这一个论点，是谢晋在漫长的从影生涯中得出的真实而切肤的感悟，因为在这方面他吃亏也已经不少了，比如《秋瑾》等等。

北京的观众在观看《花环》后的现场描述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轰动。真的轰动了。在座无虚席的电影院里、走廊里和进出口都站满了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有的是从很远的郊区赶来的，有的是偷偷地从办公室里溜出来的，而有的则是专门与人调了班才来的，虽然他们都知道不久以后《花环》就要公映，但他们图的是先睹为快。现在，他们都静静地坐在位子上，或者默默地站在走廊里、进出口。大家人挤着人，但谁也不在乎这些，只顾把眼睛牢牢盯在银幕上。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这拥挤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开始掏出了手帕，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开始有人只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有人发出一种抑制着的抽泣声，最后来就有人控制不住地哭出声来了，而这哭声又像会传染似的，你传染我，我传染你，可大家谁也不觉得难为情，随着剧情的递进，大家的灵魂得到了净化，精神得到了升华。一位看过这场试映的观众后来对人说："我这一辈子看过不少电影，一般我从不流泪，但看了《花环》我流泪了，我忍不住，战士们太伟大了，他们都是中国真正的脊梁，我从心底里敬佩他们。"

《大师谢晋》 轰动观众（2）

七、“花环”亮相轰动观众（2）

《花环》的拍摄成功和试映后引起的轰动，不仅引起了全国广大观众的关心，也引起了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关注，就当谢晋携《花环》在北京试映期间，即1984年10月24日，北京正在开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即十二届三中全会，就在会议结束之前，与会代表观看了《花环》，在座席中，有一位身着军装的老将军也在观看，他就是对这部《花环》给予了极大支持的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铿秀。两个多小时后，影片放完了，许多代表都向张铿秀表示祝贺，说：这是建国以来军事题材影片中最优秀感人的作品。代表们希望通过张铿秀，向《花环》摄制组的全体同志表示祝贺，特别是向导演谢晋表示祝贺。据说后来赵紫阳、万里、胡启立、胡乔木等领导在调看了《花环》后，也流下了眼泪。而总参谋长杨得志在看了《花环》后，则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下了“希望文艺工作者创作和拍摄更多像《高山下的花环》这样的好作品，好影片，对军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题词。

除了赞扬，好评和肯定以外，《花环》试映后给人所带来的震动也是空前的，特别是对烈士的抚恤金及部队干部的“欠账单”和如何看待靳开来式人物等问题上，上上下下的反响之强烈，甚至连谢晋也是没有想到的。就在《花环》试映后不久，老将军秦基伟有一次到胡耀邦同志家中汇报工作，顺便问起胡耀邦有没有看过《高山下的花环》，胡说还没有，老将军心情沉重地说：现在我们战士牺牲后的抚恤金太低了，才515元，这个数字是抗美援朝时才定下的，而我们的烈士家属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向组织上提出过要求，就拿着这点抚恤金去还债了。耀邦动情了，他立即就调看了《花环》，也就在这以后开始，战士牺牲的抚恤金慢慢增加了。对部队干部的负债问题，时任国

务院副总理的余秋里同志看了《花环》后，心里非常难过，他特地关照有关人员说："这个细节非常真实，要好好搞。"

在《花环》一片中，靳开来这个人物可以说是谢晋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一个。就如电影评论家罗艺军所说："在影片中，谢晋在靳开来（何伟）身上倾注了最多心血。作为一个战士，（其实是副连长），靳开来在战斗中表现很出色，可是没有被提升，牺牲之后，连个三等功也未评上。原因仅仅由于爱提意见敢说真话。讲真话，本来是人之为人起码的行为准则，却成为代价高昂的奢侈品，这其中的悲剧意味实在太深长了。人的尊严人性的复归，第一步就应该从这里跨出。谢晋精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他塑造的靳开来这个典型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共鸣。"而正因为如此，影片在社会上放映后所引起的心灵震荡和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在北京大学，《花环》放完了，大礼堂里鸦雀无声，有的人抹着眼泪走出去，有的人在严肃地思考，有的人竟坐在座位上久久不愿离去，是什么东西震动了人们的心灵？是什么东西激起了大学生们心灵的共鸣。这时候，大家看到了扮演靳开来的何伟也在观众中，大学生们激动了，大家纷纷拥上去，紧紧地围着他，并且亲热地抚摸他的脸。因为就在刚才，当影片中雷军长大声吼道："不给靳开来记功，天理难容"时，大礼堂里曾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面对如此场面，同在现场的谢晋也禁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就在不久之前，他曾收到一位守卫在老山前线的解放军战士的来信，信中夹着一枚三等功勋章，勋章已经有些陈旧，上面还沾着一些老山前线的红土尘，他在信中说，他代表守卫在老山前线的全体战士，非常感谢谢导为他们拍了这么好的一部片子，战士们看了后，都禁不住哭了，特别是像靳开来副连长这样的人，在部队多得很，他们其实是一些对祖国非常忠诚对同志非常热爱的人……他的信写得很长，字也写得仓仓促促，看得出那里的恶劣环境不允许他从从容容地写信，遗憾的是，不知是无意间的疏忽，还是有意的回避，这位小战士却没有在他的信中留下姓名，后来也一直未与谢晋联系过。

诚如人们所料，备受世人关注的《花环》在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它应得的殊荣。在第八届“百花奖”评选中，它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奖；饰梁三喜的吕晓禾获得最佳男演员奖；饰靳开来的何伟获最佳男配角奖；饰梁大娘的王玉梅获最佳女配角奖。这样，第八届“百花奖”中四个获奖演员除在电影《人生》中饰刘巧珍的吴玉以外，其他三个都被《花环》的演员们囊括。此外，《花环》还在这一年中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新加坡的观众则把《花环》评为1985年的最佳华语影片。谢晋本人，则被评为1985年的最佳导演。纵观谢晋所有电影的观众人数，《花环》达到了一亿七千万之多，可以说是最高的。因此观众在“百花奖”评选中投《花环》的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同年，在第五届“金鸡奖”中，李准、李存葆获得最佳编剧奖，吕晓禾获得最佳男主角奖，何伟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王玉梅获得最佳女配角奖，周鼎文获得最佳剪辑奖等等。

《大师谢晋》 确定《芙蓉镇》演员（1）

大师谢晋五

正在这时候，他收到了一份电报，电报打出的地点是长春，他拆开一看，是刘晓庆打来的，电报的第一句是：“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想演胡玉音……”短短的电报中，一连用四个“非常”，谢晋禁不住笑了。

一、确定《芙蓉镇》演员（1）

拍完了《高山下的花环》，谢晋又看上了《芙蓉镇》这个本子。

《芙蓉镇》是由湖南青年作家古华在1981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82年，在全国长篇小说评选中，这部小说获得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大奖。由于小说反映了一个名叫芙蓉镇的小镇上一群普通人沉浮升降的命运和我国历史进程中所曾经历过的曲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从而揭示了我国社会生活中野蛮、愚昧、荒诞的一面。小说一经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立即决定拍摄，并开始着手准备，而闻风先动的广西电影制片厂连摄制组也已成立了。后来因为政治形势的突变，再加上一股从上面吹下来的颇有来头的极“左”阴风，才使这股刚刚燃烧起来的热情火焰，被暂时扑灭。直至过了四年之后，谢晋才又捧起了这只烫手的山芋。

但谢晋马上就感到1985年的天，并不都是艳阳天，他要拍《芙蓉镇》的消息一传出，那可怕的阴风，又不知从哪里刮来了。有人说谢晋又在讽刺社会主义了，有人说谢晋又在揭共产党的疮疤了，还有人说谢晋拍来拍去又在拍悲剧等等。这些流言蜚语和政治帽子，谢晋以往都是领教过的，因此对他来说，已起不到多大的震慑作用。干扰归干扰，拍电影是拍电影，谢晋还是那个老脾气，谁也奈何不了他。决心一经定下来，他就急着想与作者见面了。作者古华在湖南，以前他们也不认识，再说他又不是写小说的，隔行如隔山，这事被谢晋的老朋友陈荒煤知道了，他自告奋勇地作了牵线人，约两人在湖南见了面，谢晋一高兴，就对老朋友许诺说，什么时候《芙蓉镇》拍成后，

他一定请他这个大“媒人”吃两只大蹄膀。后来《芙蓉镇》真的拍成了，可谢晋却把蹄膀的事忘了，以至于陈荒煤在后来一篇写谢晋的文章中这样戏说道：谢晋原来要请我吃的两只蹄膀，我连影子也没见到。大概是他奔波劳累了一阵，或者已经毫无兴趣，或者完全忘记了。我却在年老健忘的记忆里还留下这两只蹄膀的影子，当然，还不知道是红烧的，还是清炖的。这当然是趣闻，但说明谢晋对《芙蓉镇》的偏爱和钟情，也说明他对老朋友的尊敬和友情，更说明他在与原作者古华见面后，获得了《芙蓉镇》拍摄权后内心的喜悦和兴奋。

《芙蓉镇》的剧本改编，谢晋决定由青年作家阿城来出任，阿城是中国电影评论界的权威钟惦棐的儿子，不过这事与钟惦棐并无关系。谢晋挑选阿城任编剧主要考虑是阿城的一些作品很有个性，他写的《棋王》既幽默而又富哲理，被称为文坛奇才。当然，谢晋也考虑过请李准改编，但他与李准之间太熟悉了，李准知道谢晋需要什么故事，需要哪些情节，而谢晋也知道李准拿出来的本子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样的合作，好像有点“近亲结婚”的味道。而谢晋希望这个本子，要有一点出人意料和别出心裁的东西，虽然这势必会和他以前的创作风格有所不同，而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落实了编剧，谢晋稍稍放宽了心。在剧本改编的这段时间里，他可以静下心来考虑本子拍摄方面的事，好在摄制组基本上还是拍《花环》时的老班底，对这个班底他是非常满意和信任的，因此用不着他多操心。难的倒是挑演员，这部书他又看了六七遍，笔记也作了一大沓，他认为有两个人最难演，一个是女一号胡玉音，一个是男一号秦书田，这两个演员如果挑不好，《芙蓉镇》就失败了。

除了全身心地考虑《芙蓉镇》拍摄方面的事，在这时间里，谢晋的社会活动也很多，上半年，除了去美国举办他的个人电影回顾展，下半年接着去法国参加一个颁奖会，回来后，又去香港举办《花环》电影的首映式。这种走马灯式的活动时间虽不长，可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每次活动总免不了要开记者招待会，开学术讨论会，要举办

与观众恳谈见面会，还有各种各样的酒会宴会什么的，有时为了省时间，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心里老惦着《芙蓉镇》，急着想回去，只好把几个活动压缩在一块。人是够累的，可时间却是节省了。

9月的一天，尚没有从频繁的活动中绶过神来的谢晋，带着一脸的疲色来到湖南长沙，与他差不多同时抵达的还有其他省市的一些文化名人，当然大多数是从北京来的，这些人是来这里参加《芙蓉镇》改编学术讨论会的，这个会是由上影总公司、湖南省文联、潇湘电影制片厂联合举办的，邀请的都是活跃在中国影坛上的一些名流，如陈荒煤、康濯、李陀、黄健中、阿城、古华等。著名美籍华人董鼎山先生、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经理许敦乐、导演许鞍华等也都专程前来参加这个争议颇为激烈的会议。

那天的会谢晋选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招待所里举行。会议的主持人是上影厂的老厂长徐桑楚，谢晋对这个会定的基调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不带框框，不讲套话。大家可以针锋相对，唇枪舌剑。这个基调一定，会议一片活跃，作家李陀说："我们老远被请了来，是想出点力，并不是说几句客套话，是想让谢晋的《芙蓉镇》比他所有的影片高出一截，达到国际上经典电影的水平。"而古华一见到谢晋，首先向人作了个揖，说："我这部小说的结构这么怪，要改编成电影连我自己也一筹莫展，真给你添麻烦了。"说得在场的人一阵大笑。这次会议总共开了七天，确切地说是被关了七天，因为整整七天，大家都窝在招待所里，足不出户，大家你争我论，什么改编《芙蓉镇》究竟取什么角度好，主题又怎样开掘，制片方针又怎样确立，如何把握小说提供的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确立这部影片的式样和风格，等等。大家你一句我一言，你一"枪"，我一"棒"，思路敏捷、新颖，语言锋利尖锐，时而三五成群，"争吵"也好，辩论也好，言和也好，谢晋在这个会议上却很少发言，他总是坐在一边，在静静地听，在默默地记，有时"斗"了半天，硝烟渐散，于是他又冷不防抛出一个观点，顿时"战火"又起，"战场"之中，又闻声声鼓点。七天之后，会议

圆满结束，小结的时候，陈荒煤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个会在电影界来说，恐怕是首创，老的小的在一起吵吵闹闹，这的确很好。”而谢晋则沉着脸，严肃地说：“对于我来说，从现在开始，就要接受煎熬了。”

《大师谢晋》 确定《芙蓉镇》演员（2）

一、确定《芙蓉镇》演员（2）

带着这样一种心情，谢晋在长沙会议结束之后，即匆匆飞回上海，也许就从这一刻开始，谢晋的生命之钟，又要随着电影《芙蓉镇》进展的节律而摆动，他一切的一切，包括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思维，乃至他的情感，都会紧紧地围绕着《芙蓉镇》这部电影展开，他的浓浓的像岩浆般滚烫的灼热的血液又将在他的血管里奔涌起来，燃烧起来，这是他用生命对艺术的投入，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每一次艺术实践，都是对自己生命的一次燃烧。一个艺术家，只有用自己的生命作燃料，把自己变成一团火，才能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才能把别人也变成一团火。"

《芙蓉镇》的主要演员有8个：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李国香、王秋赦、黎满庚、五爪辣、黎桂桂。但最主要的是胡玉音和秦书田，而这两个人当中，胡玉音又是最重要的，谢晋曾说："胡玉音在片中是最重要的，应该将她善良、灵魂深处很复杂的东西，非常自然地、看不出刀斧痕迹地揭示出来。"但这个角色由谁来演，谢晋心中并没有底，有人向他推荐了几个，也都不太理想。正在这时候，他收到了一份电报，电报打出的地点是长春，他拆开一看，是刘晓庆打来的，电报的第一句是："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想演胡玉音……"短短的电报中，一连用四个"非常"，谢晋禁不住笑了。他了解刘晓庆这个人，虽然她并没有在他拍的片子中演过戏，但他们接触过多次，也看过她演的片子，应当说，她在谢晋的心目中，是一个不错的颇有前途的演员。只是以前一直没机会，才使他们在许多片子中，失之交臂。这次，刘晓庆来主动请缨，而且态度如此坚决诚恳，这竟使谢晋产生了一丝由衷的感动。因为他知道，胡玉音这个人物是非常难演的，如果演不好，不仅影片要演砸，演员的名声也要受损害。因此，要演好胡玉音，除了演员有生活，有演技，还要有信心，而在这方面，刘晓

庆可以说是最佳人选了。当然，谢晋这样想，刘晓庆在当时并不知道，作为一位名演员，名女人，她当时正处在各种难言的纠葛和绯闻的包围中，社会和生活正举起无情的利斧向她砍下去，虽然她已演过16个角色，观众对她也已经认可了，但有许多人，对她仍是排斥的，她太锋芒毕露了，太与众不同了。因为写了《我的路》，因为与丈夫离了婚，因为拍了电影《原野》和《无情的情人》……她一下子从事业的顶峰跌入了险恶的低谷，而如蝗的谣言也像毒蛇一样缠绕着她，这个时候，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需要理解、需要同情、需要友谊、需要支持，于是，她想到了谢晋，她有一次对采访她的记者说，她爱上《芙蓉镇》，除了有堪称上乘的一个好剧本，有一个为演员创造角色提供了挖掘的基础及想象的余地，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蜚声海内外的大导演——谢晋。她深情地说："我喜欢谢导演的艺术风格，很早以前，就希望在他的指导下，进行艺术表演创作，给自己提高艺术素养，探索表演技巧，必大有裨益。"应当说，刘晓庆说的是真诚的，在以往的拍片生涯中，她共有九次到上影厂拍片的机会，其中也不乏在谢晋拍的片子中担任角色的机会，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未能如愿。而这一次，她是志在必得了。其实，为了争取这个角色，她早在长春拍《心灵的火花》时就认认真真通读了一遍《芙蓉镇》，可以这么说，在她打电报给谢晋前，她对胡玉音这个人物是有把握的，正如她所说："我的特点是在艺术上喜新厌旧，虽然对已演过的十六个角色都偏爱，可最爱的却是下一个。目前对我来说，当然是胡玉音。"她又说："胡玉音是个情种，而演感情戏则是我的特长。我一定要全身心地饰演好胡玉音这个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

与刘晓庆"毛遂自荐"相反，《芙蓉镇》中另一位主角秦书田"秦癫子"的扮演者姜文，则是谢晋登门邀请的，这倒不是说姜文架子比刘晓庆要大，其实姜文当时才23岁，刚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才不久，论起知名度，他比当时刘晓庆还要差一截，谢晋找上他，是因为看了他演的《末代皇帝》等几部电影，看过之后，

这个小眼睛、直鼻子、翘嘴角的其貌不扬的青年演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姜文的评价是，这“是个颇有艺术天赋的青年演员”。事实证明谢晋是有眼力的，《芙蓉镇》中因为有了刘晓庆、姜文两人担纲，使整部片子拍得分外精彩，撇开政治上的因素不说，单从艺术上来说，他们两人的表演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诚如“狂妄”的刘晓庆预言：“我热情希望《芙蓉镇》不仅成为我的代表作，也成为谢晋的代表作。”

物色好了几个主要演员，谢晋的心里稍稍得到了一些宽慰。他有种预感，拍《芙蓉镇》可能要比拍《花环》顺利些，因为物色《芙蓉镇》的演员比物色《花环》的演员要顺利。

《大师谢晋》 锁定“芙蓉”外景

二、锁定“芙蓉”外景

《芙蓉镇》故事的发生地在湖南，外景地也就选在湖南。接下来是忙碌《花环》去香港举办首映式的事，这一摊子的事情多得很：要办手续，要准备答记者问，要安排演员与香港观众见面，要出席有关方面的酒会，要与香港演艺界进行交流等等。幸好香港方面配合默契，香港影视界同仁的鼎力支持，使《花环》的这次首映式非常成功，可以说是震动了整个港岛，许多香港同胞和内地人一样，也是流着眼泪走出影院。

从香港回来，1986年的年末已经临近了。《芙蓉镇》从决定投拍至今，已过去半年时间，连外景地也未定下，这不免使谢晋感到十分焦急，先前派出去的人，由副导演带队，再跟上美工师等，配给一辆越野车，他们按照谢晋：“要地毯式地推进的要求”，找遍湘南，再找湘西，不要受地区限制，影片中的典型环境要高于小说，只要有湖南特色就算成功”的指示，历时一个多月，搜遍了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五省的一百多个村镇，行程一万余里，连小说作者古华的老家湖南嘉禾县也去了，但仍不免令人失望，以至于副导演在长途电话中带着哭腔向谢晋报告说：“嘉禾没有景，只有一口井。”最后，在谢晋“没有选好外景地，你们就别回来”的严令下，他们经过反复筛选只好选了三个景地供谢晋选择：一个是怀化的黔城镇，一个是湘西自治州的吉首镇，另一个是永顺县的王村镇。但从内心里来讲，对于这三个景，他们也是不太满意的，但谢晋盯得紧，他们没办法只好请谢晋来“钦”定。到了12月底，谢晋带着摄制组的几个主创人员风尘仆仆赶到了湖南，复审外景地，一连看了几个外景地，统统被摄影师为首的复审人员否定了，最后只剩下湘西四大古镇之一的王村了，选景组的人员心情很紧张，万一这个景点再被他“枪毙”的话，那他们真正是山穷水尽没有路了。没想谢晋一到王村后，便眯起了眼睛，站在这个湘

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的古镇旁，他举目四望，看到了那蜿蜒曲折的猛河洞、那古朴幽静的石板街、那傍水而筑的吊脚楼。谢晋的脸便渐渐露出了笑容，随后，在摄制组人员的陪同下，他又沿着石板铺就的小路缓缓而行，时而拾级而上，时而走家串巷，在五里多的长街上，谢晋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在街后面的一个广场上，谢晋双手叉腰站着不动了，因为他看到了这里建着一幢气魄宏大、建造华美的大吊脚楼，吊脚楼近处溪水环绕，远处峰峦叠嶂，松林碧翠，谢晋看着看着，便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你们看，多漂亮的吊脚楼啊，全国少见，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芙蓉镇'了。"

"芙蓉镇"的外景地就这样在谢晋亲临王村后一锤定音，尽管选景组带队的副导演一再向谢晋作检讨："谢导，你选景确实高我们一筹，我们来王村两、三次了，只看到临街的大木楼，却没看见这小巷里藏着的一对大吊脚楼，我该作检讨……"但王村毕竟是他们发现的，从这一点上说，选景组应该说是功不可没，因此，谢晋还是表扬了他们，并在镇上的小饭馆里请他们喝了一顿酒。

在王村过了元旦，因为还有大量前期工作要准备，在基本确定《芙蓉镇》的镇址定在王村后，谢晋便带着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匆匆赶回了上海，在离开王村的那一刻，谢晋站在车门旁，再一次向身后的王村望去，王村，这个秦汉时期土王的古都和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刻正在淡淡的晨雾和袅袅的炊烟笼罩下，若隐若现，朦朦胧胧。那潇潇洒洒地撒落在山的斜坡上的村子，那村子中高低起伏弯曲有致的石板路，那街两侧被长年的烟蒸火燎熏得墨黑油亮的吊脚楼，那在清澈的山溪边饮水的老黄牛、牛背上的牧童、和那粉墙斑驳布满苔痕的中华基督教会福音堂等等，都向人展示了这个湘西古镇的生活是多么的安宁、纯朴、恬静和悠闲，可以这么说，这里几乎就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但谁也不会想到，不久之后，这里将要上演一幕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发生的震撼人心的悲喜剧，善良与邪恶、美好与丑陋、真诚与虚伪、磊落坦荡与委琐阴暗，生旦净末丑，就要在

这条约五华里的长街上，展开一场灵魂的厮杀和生命的搏击。诚如谢晋在《芙蓉镇》的《导演阐述》中所说，这“又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严峻深沉的悲剧，一部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结合的令人思考的悲剧，一部歌颂人性、歌颂人道主义、歌颂美好心灵、歌颂心灵搏斗的抒情悲剧……”影片通过芙蓉镇上一群普通人的升降沉浮的命运的描写，反映了我国历史进程中所曾经历过的曲折和多灾多难，从而揭示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生活中野蛮、愚昧、荒诞的一页，可以这么说，《芙蓉镇》是中国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曲折道路盛衰起伏的缩影。

回到上海谢晋就一头扎到《芙蓉镇》的前期准备工作中去了，当然主要的是剧本，剧本由阿城改了几稿后，都不是很理想，于是他就想找原作者古华来帮忙，可古华又去瑞士访问了。等到一月份，古华从瑞典出访回来的那一天，谢晋就专门派人去飞机场“劫”他，但古华说自己有要事?再加上他也无意与原先的改编者争高下，不愿参与剧本修改的事。这更使谢晋的心里火烧火燎了。

而此时风是早已放出去了，准备的时间也是够长了，而媒体又几乎三天两头在炒《芙蓉镇》。兴许是炒得太火的缘故吧，使得一些原本对《芙蓉镇》抱有成见甚至有敌意的人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便纷纷的亮出自己的观点来，有人表示公开地反对，有人则施以讥谑和嘲讽，更有人在背后大放暗箭和毒器。

但谢晋对于这种现象早已习以为常了。尽管对《芙蓉镇》的干扰远比他以往拍任何一部片子都要来得阴险和凶猛，并且来头要大得多，但谢晋并未因此而动摇，当然他更不会因此而屈服，他有一次对大家说：

“我的每一部片子几乎都经过折腾，拍《红色娘子军》时折腾过，拍《舞台姐妹》时折腾过，拍《高山下的花环》时也折腾过，现在拍《芙蓉镇》又开始折腾了，但有一点我却感到特别的欣慰，我的所有这些经过折腾的片子，几乎都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欢迎和好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拍的片子都是跟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息

息相关的，我的片子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揭露了中国社会中尖锐的现实矛盾，所以它是有生命力的，是打不倒的。”

1986年除夕的晚上，谢晋在家与徐大雯和孩子们吃完团圆饭后，来到了上影厂的办公室。他这晚考虑的是与《芙蓉镇》有成败攸关的事，就是剧本，剧本改不好，他过不好这个年，即使待在家里也不舒服。

他在上影厂办公楼自己的一间办公室里住下来，他关紧了敞开着的门窗。外面，迎新辞旧的鞭炮声在夜空下响成了一片；窗下，喜气洋洋的人们手挽着手，三五成群地朝那灯火辉煌的闹市区涌去，他们的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这是中国一个普通年份除夕之夜的街头小景。但谁又能想到，在这个理应是合家团聚的夜晚，中国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导演，却把自己关在一间斗室里，整整三天，直到大年初三上午，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一进家门，孩子们便把他团团围住了。

但谢晋分配给孩子们的时间仍是有限的，一共只有半天时间，尽管他给予孩子们的父爱是无限的，但他是一个导演，是一个身负艺术重任的人，他只有把对孩子们的爱，融入自己的工作中去，才是一种更宽泛的、更高层次的爱。于是，到了大年初四一早，他又吻别几个还在睡梦中的孩子，匆匆地到法国大使馆去了，因为再过一些时日，他就要飞抵法国，去参加在巴黎举行的恺撒国际电影奖的发奖仪式了。

《大师谢晋》 刘晓庆姜文成“搭档”

三、刘晓庆姜文成“搭档”

新年在人们喜气洋洋的心情中和红光满面的笑容中悄悄地过去了，一切又恢复了往常的节奏。在节后的三四天之后，《芙蓉镇》的绝大部分演职人员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上海。演秦书田的姜文、演谷燕山的郑在石、演李国香的徐松子、演土秋赦的祝士彬、演黎满庚的张光北、演黎桂桂的刘利年、演五爪辣的徐宁等主要演员全到了，刘晓庆因为在3月份要去美国举办她的“刘晓庆电影回顾展”，迟了几天才到。演员们到齐后，《芙蓉镇》真正拍摄的序幕就要拉开了。演员们一开始的任务是排戏、做小品，其他各个部门也都纷纷行动起来，为3月份正式去湖南王村拍外景作准备。由于谢晋说过“胡玉音与秦书田的塑造，是影片成败的关键，而秦书田的悲中幽默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影片的风格。”因此在试戏时，有人曾对年龄比刘晓庆要小得多的姜文能否把握得好这场戏提出了疑问，姜文自己也曾说：“开始我很害怕，生怕演砸了。因为这个角色的分寸不好掌握……但谢导演相信我，说不管年龄，等试了戏再说。”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姜文来到了谢晋家，与另一位演员祝士彬演起了“申请登记结婚”的小品，在演的过程中，姜文把原先定的台词和演法改动了好几处，按他自己编好的台词和演法演，没想这一改动竟把“右派”秦书田的癫狂急切、强忍屈辱恰到好处地表演了出来，谢晋感到十分满意。事后谢晋曾预言：这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其表演才能将会大大超过人们的估计。刘晓庆后来也说：“姜文眼睛小，样子不好，可是演技好，我喜欢跟他演对手戏，就像下棋的人爱棋逢对手一样，爱跟自己差不多水平的搭档。”继《芙蓉镇》在全国轰动上映之后，她又与姜文合演了《春桃》《大太监李莲英》等电影，他们被人称为“黄金搭档”。因为在刘晓庆眼里，姜文是中国最好的男演员，而她自己则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

在上海做好了《芙蓉镇》拍摄前的大部分准备，3月初的一天，谢晋就带着《芙蓉镇》摄制组的全体演职员直赴王村。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谢晋在演员们住的上影厂的招待所，把摄制组全体演职人员召拢来，谈了自己对《芙蓉镇》一片的“导演阐述”，这篇名为《悲剧，对一个时代的反思》的“导演阐述”，谢晋已准备了好几个月，可以说是几次推翻，反复修改，现在终于完成了。但对于谢晋来说，一篇“导演阐述”的完成，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字的构成，而对一部影片思想的构成、灵魂的构成，说得再高一点，是一部影片生命的构成。否则，一部影片拍成了，也只是一种胶片的堆砌，是一个没有灵魂和生命的躯壳。

3月初，已经被媒体炒了半年多的《芙蓉镇》终于要拉开它神秘的大幕了。这一天早上，《芙蓉镇》摄制组全体百余号演职人员，在导演谢晋的率领下，乘火车直奔湖南长沙，因为火车不通王村，因此在抵达长沙之后，还要再转乘汽车。在这支庞大的队伍里，饰女一号胡玉音的刘晓庆仍不在其列，因为从3月2日开始，她要去美国参加由中华联谊会等十余个华人团体发起的“刘晓庆电影展览”，地点主要是两大城市——旧金山和洛杉矶，为期一个月。这次展览放的影片只有三部：《潜网》《北国红豆》《神秘大佛》。这几部片子都不是刘晓庆的代表作，她较为满意的《原野》和《无情的情人》等影片没能带去。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活动在这个时候如期举行，对刘晓庆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写了《我的路》所带来的打击，因为《原野》的谣言，因为婚姻的离散……使她在这个时候陷入了她人生中最最痛苦的泥潭，这个时候，她是多么需要同情、需要友谊、需要支持。谢晋是同情她、关心她、支持她的朋友中的一个，因为他不仅接纳了她的请缨饰演《芙蓉镇》女一号的要求，又准许了她的美国之行。当然不是以一个导演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兄长的身份，这使一向性格孤傲的刘晓庆尤为感动。

《芙蓉镇》摄制组如期进入王村，使这个地处穷乡僻壤的深山小镇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在摄制组下榻的驻地，每天都有包着头帕穿着民族服装的苗家人、土家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像看西洋镜一样，看这些从大上海来的人，看他们说话，看他们吃饭，看他们拍片，看他们的一切，他们的到来，仿佛给这个差不多与世隔绝的山乡小镇吹进了一股令人怦然心动的新风。

《大师谢晋》 谢晋片场戒酒

四、谢晋片场戒酒

拍摄的进展是顺利的，虽然各方面的条件与城里没法相比，生活也相当的清苦，但大家都知道这部片子的分量，都知道谢晋导演的拍摄作风，因此没有一个人为此发出怨言，即使一些大牌明星和后起之秀，如后来赶到的刘晓庆和早她一步到王村的姜文，都对此毫无怨言。当然，在生活方面，最难受“煎熬”的，还是谢晋自己，谢晋嗜酒，且酒量极佳，若在平日，几乎餐餐要喝，但自到了王村，做到了滴酒不沾，这种克制能力是非喜酒者所无法体验得到的。有一次，北京、上海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来王村采访、参观，在离开之前，谢晋设小宴以示欢迎，席间，谢晋向记者们频频劝酒，连几个不会喝酒的女记者也被劝了半杯，但是陪餐的摄制组同志却无一人喝酒，因为谢晋有令在先，工作期间，谁都不准喝酒。

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刘晓庆也从美国回来了，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尽管每天处在观众热情的包围中，处在鲜花和荣誉的海洋中，刘晓庆的心里却总惦着已开拍的《芙蓉镇》，惦着这部片子中的女一号胡玉音，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思念，才使她不愿再在美国多呆一分钟，并且婉谢了美国其他城市和加拿大有关方面的挽留和邀请，她甚至连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及最大的城市纽约都未去，就急匆匆往回赶。

从刘晓庆的神色看，她的这次美国之行很成功。据说在“刘晓庆电影展览”的开幕式那天，侨居美国的华人团体成员，美国文化界人士有不少都到场了，连她的好朋友陈冲、陈烨、杨海莲也专程前来祝贺。特别是中国联谊会在洛杉矶帕沙迪娜学院大礼堂举办的“刘晓庆之夜”演出活动中，刘晓庆一人在舞台上载歌载舞，极尽表演才能，征服了在场的一千多名华侨、影迷和美国朋友，大家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来感谢她的精彩表演。这次美国之行对刘晓庆的心灵触动是很大的，她是一个成功者，但她是一个在人生的道路上充满着无限辛酸和痛苦

历程的成功者，在她成功的光圈背后，是一大片阴影——嘲讽、污水、挫折，她甚至牺牲了她本该得到的爱情和青春，但谁又能理解她呢？就在她这次出国之前，一位领导前来送她，与她半开玩笑地说：你可别跑了。刘晓庆听到这句话，怔怔地看着那位领导人，一股委屈与怨恨之情从心底深处油然而生。但从美国回来后，刘晓庆的心情顿时好了许多，她有一次对谢晋说："到了国外，才能感受到祖国的可爱可亲。我平时爱发牢骚，有时，也对国家的某些弊病看不惯，到了美国，才觉得国家在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刘晓庆到了王村，便一头扎入到《芙蓉镇》的拍摄现场中去了，虽然她很疲倦，很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但她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向谢晋开口了，因为她的出访，谢晋已经把好几场戏都推迟了。于是，在抵达王村的第二天，刘晓庆就把她身上的新潮服装脱下来，换起了当地的大红土布衫，梳上了湘西妇女的发式。但谢晋还是说：你刚从美国回来，一下子很难入戏，你必须忘掉自己才能进入角色。于是，她便像一个普通的当地妇女一样，接连几天悄悄地混在人群中。有次，她在一家小摊上一下子要了五大碗米豆腐，一边品尝，一边观察，只见主妇招呼顾客，应酬自如，尤其是那一连串的连贯动作：舀豆腐撒葱姜、蒜泥、浇汤水，简直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看得刘晓庆心中暗暗叫绝，赞叹不已。这段生活，后来被刘晓庆吸纳到自己扮演的胡玉音的身上，把个米豆腐西施，演得活灵活现，令人赞叹。

天渐渐地热起来了，进入六月以后，这个湘西山区的小镇，简直就如火烧火燎一样。所有摄制组的人员，一天戏拍下来后，个个都是一身臭汗，晚上回到驻地，第一件事不是吃饭，而是赶快跑去冲凉。谢晋年逾古稀，又是摄制组的"三军"统帅，但在生活上，他却从来不搞特殊化，即使那点喜欢喝几盅的小小嗜好，也被自己戒了，这使摄制组的同志们都十分感动，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在谢导的领导下，即使再苦再累，也要把《芙蓉镇》拍好。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出色的，当

数男女两位主要演员。饰秦书田的姜文虽然年轻，却多才多艺，缺点是有点放浪不羁。他到《芙蓉镇》剧组后，有人告诉谢晋，这小子很狂，接到剧本后也不见他怎么用功，谢晋听了，一笑了之。这事传到姜文耳朵里面，说："那时候用功来得及么？其实我的功夫是下在心里的，从一看到小说和剧本起，我就逐渐进入了角色，不是演戏和想这事儿时才进入，而是每天的日常生活都尽量处在角色的心境中，从我日常接触到的各种人与事中体会角色的心态，也即生活在角色中，你看我好像一天到晚忙别的事儿，一开机就上演，似乎很轻松，其实我每天对这个作品和角色想得很多。就像《芙蓉镇》写的反右，我不熟悉，所以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一直看小说，边读边在每一页上写满了感想。"

有一次，化妆师希望他的皮肤能再黑一些，姜文便把自己脱得光光的，除了一条三角裤，就坐在阳台上，让毒辣辣的太阳晒，谢晋?到后，见他的皮肤又黑又亮，便戏称他为"黑泥鳅"。姜文这人还爱动脑筋，他为"右派"秦癫子设计的独特的眼神，他在秦癫子穿的旧毛衣上缝的那个布袋袋，他为秦癫子在扫青石板街时设计的"华尔兹舞"以及他为秦癫子发明的翻筋斗的动作，活脱脱地把一个扭曲了灵魂、屈辱地生活、用"癫"的特殊形式来生活和抗争的悲剧性的知识分子形象地刻画了出来。以至于谢晋预言："姜文有望争夺电影'金鸡奖'的桂冠，到时评选时，我将投他一票。"

同样，刘晓庆在拍戏时的表现也十分出色，她是大明星，大明星总难免要摆一摆架子，但刘晓庆一到王村后，看到摄制组住的条件是这么的差，吃的又是那么的苦，她还有什么理由挑肥拣瘦呢，于是，她也和其他人一样，该住哪里就住哪里，该吃什么就吃什么，该怎么拍戏就怎么拍戏。有一次，按进程要拍一场胡玉音卖米豆腐的戏，那天正是毒日当头，热辣辣的太阳把王村镇上的石板路烤得滚烫，气温高达四十度左右，大家站在太阳下，现场所有的人，包括谢晋、刘晓庆，身上的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但大家没一个人退却，直至这个镜

头拍完了，大家才获准回去冲个凉。对于这件事，有人曾经问谢晋，如果换一个时间拍这场戏，是否会影响效果呢，谢晋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主要是不真实，现在观众不大喜欢我们的电影，毛病就出在这地方，比如按剧情规定这场戏要有毒太阳，可你却拍了个阴天，或者太阳快下山了，这样整个气氛就大打折扣了，甚至会影响到剧情。进而他又说，一部影片要真正打动观众，最主要的是在于它的真实性和思想深度。

因为天气热再加上电力不稳等诸方面因素，摄制组夜晚一般不拍戏，于是晚上就成了纳凉的好时光，可谢晋是个“工作狂”，即使天再热，他也不会找个凉快的地方舒舒服服地休息。于是他就想出个“诡计”，何不趁大家纳凉时，探讨电影艺术的中心，发言的主角可以说是摄制组的每个人，只不过是有的人说得多一些，有的人说得少一些，发言的内容也是不受限制的，海阔天空，漫无边际，总之只要与艺术有关的都可以谈。当然，谈得最多的是谢晋，有一次，在谈到电影演员的表演时，他这样说：“演员要有创造角色的毅力。一般舞台戏排完了，演员角色创造基本上完成了，当然演的过程还有提高。电影呢，重要的戏我放在最后拍，还有三个月，五个月时间，即使到拍完最后一个镜头也没完，没有配音，这也是一种再创造，剪辑完了，演员表演节奏又会有大的变化。所以，电影演员的创作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毅力。”

大概在片子拍了三分之一左右的时候，又有一些记者辗转来到了王村。在拍摄的外景地，谢晋请他们看了刚刚拍好的样片。看完样片后，谢晋似有预感地说：这部片子拍完后，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有争议是正常的，我们国家在宝钢选址、深圳搞特区、长江三峡造电站等问题上一开始也引起过争议，但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学术探讨，而不是批判、讨伐和一言堂。

《大师谢晋》 转移“芙蓉”阵地

五、转移“芙蓉”阵地

在关于谢晋模式的纷扬而热烈的争论中，七月份很快又过去了。在王村拍完了差不多全部的外景之后，《芙蓉镇》摄制组全体人员就要告别王村了。带着精神疲惫的谢晋在最后几天显得特别忙碌，这倒不是说他还有什么重要的外景没有补拍。而是他舍不得一个人，一个小姑娘，今年才5岁，名叫小春花。那是他在第一天进王村时发现的，当时小春花正站在一处巷子边，矮小的身材、光着脚丫，黑红的脸蛋上嵌着一对圆溜溜的大眼睛，鼻腔里拖着两条过了“河”的大鼻涕。经了解，小春花的父母都是“宝”，“宝”在湘西这地方，就是痴人、蠢人的意思，谢晋在那天去小春花的家，那是一个比乡下的厕所大不了多少的小茅屋，四、五平方米左右的地铺上，要睡6个人。谢晋的心被震撼了，他呆呆地站在这一家人面前，一时说不出话来。事后他才对摄制组的同事说：“很难想象，小镇上还有过这样日子的人，一对傻瓜没有生活能力，却生了一堆女儿。这是老少边穷地区的现状啊！”这以后，小春花姐妹三个人就成了摄制组的人，她们专门交给饰满庆嫂的徐宁带领，徐宁没有生过孩子，这三个孩子就成了她身旁的活道具，谢晋要孩子们叫徐宁妈妈。还给她们做了合体的衣裳，给她们买许多好吃的东西，久而久之，大家都建立了感情，好像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了。这期间，谢晋还专门关照摄制组，拿出一部分资金，在当地镇政府和街邻们的帮助下，拆掉了小茅棚，盖起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砖瓦房。睡觉的地方，也从打地铺搬到了床上了。现在，摄制组就要撤离王村了，谢晋想：我们走了后，小春花她们又要吃苦了，倒不如把她们带到上海去，好好玩一玩，让她们长一长见识，开一开眼界，也算是尽了自己的一点心意了。于是他就安排出专人，专门照顾小春花姐妹俩，一同来到了上海。七月末，《芙蓉镇》摄制组全体人员在经过了数次长途奔波后，终于全部抵达了上海，七月的上海，正是酷热难

耐的季节，但摄制组人员几乎来不及休息，就投入到紧张的内景拍摄中去了，因为影片的重场戏，几乎全部要在摄影绷拍摄，而在内景与外景的衔接上，一定要做到天衣无缝，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行家，也很难找得出破绽。胡记客栈，五爪辣、秦书田的家都是用内景搭起的，但都极具逼真感，保持了与外景一致的乡土气息，因为所有这些搭景的木料都是从王村当地的旧房子拆下来，专程运到上海的。从房梁、屋柱到门槛的质料到颜色都让人感到它们是过去那个年代的。美术设计师金绮花负责着内景和外景的总体设计，从构思、画气氛草图到景的搭建，全部过程都一丝不苟。老胡记客栈的天井里有一块石板，二十多年风雨侵蚀形成一种自然光滑的质感，这样的石板，雨水打在上面有一种很特殊的声韵。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一位置景工人硬是在一块石桥上，磨了十几天。再比如，胡玉音在庆祝新房典礼的第二天，身穿一件粉红底子，有蓝点小花的灯芯绒上衣，以示她心情的喜悦，服装师就按照这个要求去做，那满身不下一万个蓝色的小点子，原来是用手工将蓝色一点一点点上去的。这些道具服装单独地看也没什么了不起，在银幕上也许并不起眼，但是当它们作为艺术整体的一部分时，它们却是缺少不了，马虎不得。谢晋对于电影艺术质量有一句很恰当的比喻：质量好比捧在手中的水，如果不在意，东漏一点，西洒一滴，最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从7月份回上海拍内景，到11月份基本结束，谢晋大概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拍摄是很艰苦的，当时的上影厂，条件并没有现在好，摄影棚里连空调也没有，有些戏是拍冬天的，规定要穿很厚的衣服，大家也只有汗流浃背地干。

像作家在稿纸上点完最后一个标点，像农民收获完了庄稼地里的最后一垅作物，1986年11月的某一天，谢晋在上影厂的摄影棚内，凝神屏息看完了《芙蓉镇》的最后一个镜头，如释重负地深吁了一口气。近一年来为之激动、为之紧张、为之焦虑、为之不安和疲惫的各种感受，似乎都随着这口气而悄悄地消散了。

就在《芙蓉镇》进入最紧张的后期制作时，谢晋接到了印度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发来的邀请他去担任电影节评委的函，去还是不去呢？这使谢晋当时颇踌躇了一番，去的话，手头这么多工作怎么办？不去的话，又失去了一次好机会，中印电影界原本交往很密切，印度著名的电影《流浪者》《两亩地》等都是那个时候引进的，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国电影界就中断交往了，这次对方主动抛出了“绣球”，我们怎么能不接呢。经过再三考虑后，他决定还是去。但在去新德里之前，谢晋又见缝插针参加了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好在他在这个电视节中没有具体职务，只是一般的嘉宾，因此也就相对超脱些，数天后，谢晋就率团如期来到新德里。

印度电影节创办于1965年，每两年举行一届，今年是第十一届，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这个电影节。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到来，印度方是很重视的，他们不仅请谢晋主持了隆重的开幕式，还请他在亚洲电影发展讨论会上发了言，一些印度电影界的朋友，也纷纷到谢晋下榻的新德里最高级的泰姬宫饭店与他切磋电影艺术及电影交流方面的事。他们诚恳地说：印度和中国是东方两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文化上又相互影响，理应加强在电影艺术上的交流，对此，谢晋也颇有同感。为此，他也挤出时间，专程拜会印度一批电影界老朋友、新朋友。经过接触，他认为中国和印度虽是两个地域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度，但在艺术上却有很多相似相通的地方，印度电影界的不少地方，正是值得中国电影界学习的。

《大师谢晋》“芙蓉”一波三折（1）

六、“芙蓉”一波三折（1）

从新德里回来，已是1986年的春节前夕了，完成了所有后期制作的《芙蓉镇》在1986年的春节前在上海、北京一些地方进行试映，作为一部自始至终被媒体跟踪的影片，全国广大观众对它的期望是很高的。当然，这种期望中更多的则是包含着对谢晋的信任和信赖。经过了漫长而黑暗的艰苦岁月，他们期望着从《芙蓉镇》中，寻找真实的答案，并作出深刻的反思，这就是，当他们回首这段历史悲剧时，希望见到的不仅仅只是野蛮、残忍、愚昧和荒诞，他们希望从影片里这群人物被扭曲的性格、畸形的心态、坎坷的命运中，发现产生悲剧的社会土壤和气候条件，并从李国香、王秋赦、谷燕山、黎满庚、胡玉音、秦书田、桂桂、五爪辣等这些可怜又可悲的人物身上看到别人和自己的灵魂和影子，从而引起深刻的反思，防止这种悲剧的重演。

《芙蓉镇》的片子在完成后基本上没有大剪，这多少有点出乎谢晋的意料，但对有一些语言，还是作了必要的调整，比如原片中有秦癫子高唱“大海航运靠舵手……”的镜头，有人认为让一个疯子唱这样的歌太刺激，于是只好把它剪掉了，再比如，里面有一个人，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搞多次，过七八年来一次……”而念这段语录的人，恰恰又是一个疯子，于是又有人提出来，毛主席的语录从一个疯子口里念出来，太不严肃了，于是只好换成别人念这一段语录。

总之，在初步试映的阶段里，无论电影界也好，观众中也好，都对这部片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即使作了些删改，也属于小修小补的范围，对此谢晋也充满了信心，他甚至想：在中国，“左”的一套毕竟没有市场了。

但谢晋的这种天真幻想法再次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了，就当《芙蓉镇》在上海逐步扩大试映范围时，有一些人便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们

认为《芙蓉镇》的调子是灰色的，整部片子，全是给党的形象抹黑，因此主张立即停放这一部片子。正在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芙蓉镇》，立即被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同样，一种不祥的预兆也蒙上了谢晋的心头。但他想不通，同样一部《芙蓉镇》，观众的意见与某些领导的意见怎么会如此相悖呢，这究竟是为什么？幸运的是，就在《芙蓉镇》几乎要被打入冷宫的时候，上海市委始终庇护着谢晋，他们认为《芙蓉镇》是一部好片子，不是坏片子。事后谢晋才知道，让一个堂堂的上海市委站出来，为一部在政治上有大是大非之争的影片表明态度，这需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啊，这还不算，就在北京举办中国电影回顾展的时候，上海送了十部片子，而《芙蓉镇》亦在其列。

政治上的较量是很尖锐的，而这种尖锐有时候往往表现得很坦诚，这里既没有温情脉脉的面纱，也没有虚情假意的客套，一切都表现得很直率、很直接。就在上海参展的十部片子送到北京接受审查时，《芙蓉镇》没通过，而这是所有参展影片中唯一一部被“枪毙”的影片。

消息传到了上海，上海电影局领导的心情一片沉重，上影厂的领导更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如此结局，他们虽有预感，但最坏的打算，无非是把《芙蓉镇》改得面目全非，然后公映，但对于一棍子打死的结局，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如果真是这样，堂堂上影厂不仅要在政治上承受巨大压力，在经济上也会蒙受巨大损失。

当然，最受煎熬的，还是谢晋本人。作为一个导演，影片就是他的“孩子”，十月怀胎，艰辛共知，而《芙蓉镇》又是他最喜欢的“孩子”，现在，这个“孩子”刚出世，有人就要把他扼杀在摇篮里，这种结局，对于谢晋来说，简直是太残酷了，他是永远无法接受的。

《大师谢晋》“芙蓉”一波三折（2）

六、“芙蓉”一波三折（2）

然而，浓密的乌云中，有时也会透露出些许阳光。《芙蓉镇》最终还是在风雨如磐的政治氛围下艰难地与全国的观众见面了。但一开始，也仅仅限制在大城市放映，农村和小城镇的观众一时还看不到。但不管怎么说，《芙蓉镇》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新生儿，无论是1986年尚在“母腹”中孕育的时候，还是在1987年降临人世的时候，它都苦难重重，险象环生。

1987年五一节前夕，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到中国访问，一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会见了她。在交谈中，韩素音谈起了海外对《芙蓉镇》在国内的遭遇感到不理解，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位中央领导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数天后，“五一”节要到了，国家为了表彰在各条战线上的优秀工作者，特评出了一批“五一”劳动勋章获得者，上海当时共评出两名，谢晋是其中之一，各新闻媒体均发表了醒目的消息，当时上海正在开人代会，代表们一看报纸，马上就议论开了：一方面有人在批判《芙蓉镇》，一方面又把谢晋评上了劳模，要我们向他学习，到底以哪个为准？真是乱了套了。

即使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芙蓉镇》的命运也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但谢晋对此并未失去信心和耐心，他说：“《芙蓉镇》原著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人民欢迎的东西，你要批，怎么可能？”有一次，他直接向党内一位领导同志谈起《芙蓉镇》的波折和遭遇，那位领导同志说：“不要管它，只要老百姓喜欢就行了。”

1987年9月15日晚8时30分，这一天对谢晋来说也许是永远难忘的，他导演的《芙蓉镇》在历经磨难之后，终于在中影公司的会场，向来自40多个国家的200多位参加首届中国电影展的文化影视界要人放映。在放映之前，《芙蓉镇》就已经成了这届影展中最令人关注的热点，因此在放映过程中，大家看得格外的认真和专注。果然，电影结

束了，观众席上立即爆发出了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就在这天晚上，《上影画报》的记者采访了谢晋，或许是有点兴奋，平素不太抽烟的谢晋点燃了一支烟，他慢慢地说："《芙蓉镇》放映之后，我收到了大量观众来信，我非常感谢人民对我的关心和支持，而艺术的人民性正是我不懈追求的。这部影片引起一些争议，对此，我也在冷静地思考。我的信条是，文艺作品最后的裁定者只能是时间和人民，包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芙蓉镇》在各大城市放映引起极大的反响，今天又受到国外同行的热烈欢迎，他们认为这是我'文革'以来最好的作品，但是，现在农村的观众还没有看到，也尚未拿到国际上去放映，因此最后恰如其分的结论我们还得等待时间来作出。现在全世界关注着中国、研究中国'文革'极'左'路线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对《芙蓉镇》他们不仅欢迎，而且能够理解。它在中国影展上成为热点预示着会赢得很多的国外观众。由此，我更相信，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具有难以泯灭的生命力。"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芙蓉镇》终于在全国各地的影院上映了，并且它们受到的好评和反响在中国的国产影片中是少见的。但谁又能想到，就是这么一部片子，它在1987年的电影评奖中竟被排斥在外，在反复折腾了半年之后，它终于以绝对优势荣获了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女主角奖，最佳男、女配角奖。但遗憾的是，这个由人民直接评选的权威大奖，竟推迟到年底才公布，而那一年的金鸡奖评选也延迟至1987年12月31日才开始，成为金鸡奖历史上唯一一次跨年度的评选，原因很简单，因为《芙蓉镇》。《芙蓉镇》最终获得了那一届金鸡奖最佳影片奖及多次单项奖而被授予特别奖的殊荣，在稍后又获得了广电部新时期十届导演奖。谢晋不会忘记1988年1月23日那个令人激动的夜晚，在铺满红色地毯的颁奖台上，他从他的电影启蒙老师曹禺手中接过了那座金灿灿的"花神"和奖状，一时竟禁不住热泪盈眶，在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中，他环顾四周，25年前，也是在这座政协大礼堂里，曾举行过第一届百花奖的颁奖仪式，那一天晚上，敬

爱的周总理来了、陈毅元帅来了、郭沫若和茅盾等老一辈艺术家来了……当周总理向他伸出那双宽厚的大手时，他是多么激动啊。现在，沧桑巨变，伟人已去，但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则永远地留在他心中。于是他想，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究竟为谁而创作，为谁而歌唱，当然是人民，人民是艺术家永恒和真正的母亲，因此，凡是人民欢迎的作品，凡是优秀的作品，它最终会获得应有的地位和评价，因为这是人民的选择，也是人民的权利。

《大师谢晋》 酝酿“贵族”（1）

大师谢晋六

可见，对自己在晚年走变法之路，谢晋是充满着何等的信心和决心。正是这信心和决心，才支撑着谢晋在古稀之年向广大的观众奉献出一部又一部不同凡响的力作，并用自己的心血、汗水乃至生命，浇铸着中国光辉灿烂的电影丰碑。

一、酝酿“贵族”（1）

1987年9月中旬的某一天凌晨，在北京中影公司的一间办公室里，年已64岁的谢晋接受了一位年轻记者的采访。他的脸上略显疲倦，但清瘦的脸上又呈现着淡淡的红晕，在与记者的交谈中，谢晋兴致极浓，他谈到了对中国电影的忧虑，谈到了自己对电影的一些想法和思考，谈到了中国电影包括自己电影创作的走向，当然，他谈得最多的还是他的下一步打算。他向记者透露，他接下来要拍的将有两部片子，一部暂名叫《纽约客》(后改为《最后的贵族》)，是根据美籍华人作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说《谪仙记》改编的，还有一部是《桃花扇》，拍《桃花扇》是他二十多年前就定下的心愿，但苦于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最近他又通读了一遍明史，细致地琢磨孔尚任笔下的李香君和候公子几个主人公。他说，他要么不拍《桃花扇》，要拍的话就要拍出与众不同的风格来。特别要拍出元明朝代更替、民族兴衰的宏大气势，要刻画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动荡年代的软弱悲剧性格。

按照谢晋的时间表，他准备在先拍毕《桃花扇》后再拍《最后的贵族》。如果两部片子定要同时拍的话，《桃花扇》也应该放在《最后的贵族》之先。为此，在1987年下半年，他有不少时间都花在踏看外景上。他去过浙江的东阳、嵊县，也去过绍兴、富阳以及他自己的家乡上虞，这也是他的恋乡情结所致，每次拍片看外景，他都要到自己的家乡去看看。他一生拍过数十部片子，真正在自己家乡取景的，

可以说很少，这使他想起来感到很遗憾。他很怕人家说，谢晋拍了这么多影片，怎么不到自己的家乡来拍一部，他知道父老乡亲的心是诚恳的，但电影有自己的特性，选外景和爱家乡是不能等同的。但不管怎么说，谢晋总像欠了自己家乡的一笔“债”，这笔“债”，有一天他是一定要还的。

为此，为了多看一些景点，并且不让一个理想的景点在自己的眼皮下漏掉，他给自己规定了一个近乎“残酷”的时间表。6天马不停蹄地观看了众多的景点。

然而遗憾的是，这次紧张的旋风式的看景，虽看遍了浙江境内的明代建筑，但适合《桃花扇》一片的理想外景却并不多见。不像他拍《舞台姐妹》时，很多明清建筑还保存得很好。有些建筑整个就是一处好外景，现在这些建筑都已荡然无存了。保存下来的，也都是残缺不全的。这使他对拍摄《桃花扇》竟产生了忧虑。如果没有一处好外景，完全靠布景，是绝对拍不好《桃花扇》的，而要搭实景，这又是不可能的事。为此他决定先把《桃花扇》放一放，把原来准备迟一点拍的《最后的贵族》排上来。

对于《最后的贵族》，这段时间谢晋也思考得很多，主要有两点：一是关于主旋律，二是关于他自己今后的路。对于拍《最后的贵族》，电影界甚至观众有很多人是不解的，甚至是反对的。什么原因呢，道理很简单，谢晋一向是以自己的电影与祖国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高度同步性的艺术家，他的影片几乎都是与中国的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确立了无可动摇的地位，而现在，他要去拍一部由台湾作家写的《最后的贵族》，这样的影片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与我们这个国家沸腾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这样的观点，谢晋显然不能同意的，他在后来的一篇导演阐述中这样说：“我认为根据《谪仙记》改编的《最后的贵族》，它具有史的作用，诗的境界。有个著名美籍华人评论家曾经说过，白先勇的

《台北人》这部短篇小说集是一部“中华民国”史，因为它写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在台湾在美国的遭遇，具有史的价值。”

白先勇很多篇作品都写了这么一个哲学思想，可归纳为三条：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最后的贵族》也是这样，它写了对今昔盛衰的感叹，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冀望，对芸芸众生的嘲弄和同情，白先勇常常通过有限的艺术空间，把每个人物当作一口井，深深地开掘下去，用诗的境界表现了完整的人生，把世态、人情、哲理烧成一块五光十色多种元素的合金……

《最后的贵族》中李彤这个人物将改变我们文学欣赏及审美的观念，作者再三强调她不是经济财产失落，也不是爱情的失落，而是灵魂的失落，她是个离开中国母体断了乳汁的孩子，是杜甫诗中的“失群的孤雁”。她的命运和结局使我们联想到“黛玉焚稿”时的疼痛，晴雯临终前的悔恨，女诗人李清照不肯过江东的悲愤，南宋末年宰相杜秀夫背幼子投海的惨烈。很多人生的悲剧不容易用文字说清楚，从李彤的失落感“延伸”到八十年代的中国现实，让人惊愕地发现历史在重演。今天有很多很多八十年代的李彤、黄慧芬、吉芷苓、张嘉行们，他们面对严酷的现状，面对着走过曲折道路贫穷落后的祖国，也像断了奶的孩子，在异国土地上追求着幻觉般的金色的梦……

《大师谢晋》 酝酿“贵族”（2）

一、酝酿“贵族”（2）

谢晋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最后的贵族》的拍摄中去。对这部晚年的力作，谢晋曾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它具有巨大的审美幅度，拍好了，它的震度是宇宙性的，世界性的。”但更重要的是，这毕竟是谢晋的一部变法之作，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变法之作。对这部变法之作，谢晋将会倾注自己全部的心血，他又会将自己的整个生命，燃烧进这部作品之中去，这是时代和观众对他的要求，也是他作出的抉择。尽管是痛苦的抉择，但他必须这么做，除此之外，他别无退路，诚如他自己所说：“过去国内不大强调商业性，近几年武打片、惊险片在国内大行其道，比文艺片更卖座，引起了争论。但我的电影的特点是，从五十年代的《女篮五号》开始，电影观众的覆盖面就比较大。八届百花奖，我得了四届。得了百花奖的电影一般卖座都比较好，金鸡奖则不一定，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些朋友认为不应当过于迁就观众，但另外一些朋友却认为‘阳春白雪’只会使电影更差。我究竟走哪一条路，尚在反复考虑。许多搞电影的人，一生勤勤恳恳、忙忙碌碌拍了不少，但真正成功的，自己真正感到满意的却一部也找不出。晚年难免产生失落感。我最怕的就是这样。这些都是我的心态。”正因为如此，他才呼吁“我们要不断地追求，要有不断地进行探索的精神，要有那种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电影艺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激情！要全身心地拥抱它。”

可见，对自己在晚年走变法之路，谢晋是充满着何等的信心和决心。正是这信心和决心，才支撑着谢晋在古稀之年向广大的观众奉献出一部又一部不同凡响的力作，并用自己的心血、汗水乃至生命，浇铸着中国光辉灿烂的电影丰碑。

转眼之间，1988年的春节到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春节，谢晋决定回故乡过。自1985年参加文代会以后，又过去三年了，他的

心里是多么思念故乡啊，可是他太忙了，忙得连家也顾不上，自然也就谈不上回故乡探亲了。

家乡的领导在春节之前曾多次来电，希望谢晋再回家乡看看。这更促使了谢晋回家过年的决心。于是，一家人都忙乎开了。阿三、阿四当然是最兴奋的，他们虽然不会说话，但他们听得懂父母说话的意思，于是，在那几天当中，他们的脸上，总是挂着天真的童稚的傻笑。

徐大雯当然是最忙的，虽说是回故乡过年，可所有的生活用具又必须带着，少一件不行。谢晋带的东西也不少，但他带的都是拍《最后的贵族》的有关书籍、资料和剧本，这也够他准备的。因为春节这几天，是他休息和静下心修改剧本的好时光。

2月16日，即江浙一带俗称的廿八夜，上虞故乡的领导派面包车专程来接谢晋。晚上就住在上虞最好的上虞宾馆内，在山边寂静的房间里，远离了都市的喧嚣，避开了送往迎来的烦恼，在松涛的呢喃和修竹的低吟下，谢晋这一晚睡得特别的香。次日一大早，他尚在睡梦中，忽然感到有人在轻轻地摇他，他睁眼一看，见阿四正站在自己的床前，正用嘴朝窗外不停地呶着，脸上呈现出兴奋的神色。他爬起来一看，呵，下雪了，多大的雪啊，这样的雪，只有在乡下才能见得到。推开阳台的窗望去，只见茂密的山林间，已成一片银色的世界了，窗下一条笔直的小道上，厚厚的积雪将路面全覆盖了，只有一个早起的人，在这条洁白的银练上，留下了一串深深的脚印。

或许是难得见到这样的大雪，或许是想到民间“瑞雪兆丰年”和“丰年好大雪”的好兆头，谢晋今天的心情特别的好，长长一整天，他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推敲《贵族》的本子，这个剧本是由诗人白桦和台湾美籍作家孙正国共同改编的。自从决定拍摄《最后的贵族》之后，谢晋就多次找白桦来改编《谪仙记》，但白桦一开始并不想“揽”这个活，他说：“因为我历来不改编别人的作品，我认为这是既不尊重别人又不尊重自己的事情。后来由于谢晋的顽强和我的软弱，做了一次违

心的动笔，却真诚激动地完成了创作活动。”事后证明，白桦改编的这个本子是成功的。

从初二下午开始，谢晋就关起门来修改《最后的贵族》。晚饭后，谢晋抓紧时间睡了一觉，睡得很香，这是他长期形成的习惯。他一般不睡午觉，只在晚饭后美美地睡上一小时，但这一小时，足可以使他精精神神地工作到次日凌晨两点钟，然后再睡到上午九点钟，他把这种习惯称为分段工作法，即白天一个时段，晚上一个时段，两个时段之间又有睡眠作保证，这样既可以保证身体的健康，又可以使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他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竟能保持常人难以理解的旺盛精力，而且工作效率又是那么的高，其中的秘密，可能就在这里。

傍晚前，又下起了雪。整整一下午，徐大雯和孩子们都待在房间里，因为外面结了冰，她不让孩子们出去，就只好待在温暖的房间里看电视，她也不让孩子去父亲房间里，父亲在工作，孩子去了会打扰他。?在烦闷了，她就打开阳台的门，让孩子们来到大大的阳台上，然后做起雪人来。雪人虽做得并不怎样，但孩子们是开心的。晚饭前，谢晋也来了，和孩子们逗了会，一家人就去餐厅里就餐，偌大的餐厅，只有他们一家六口人，大家围坐在一起，喝着温热的老酒，品尝着家乡的菜肴，体味着家庭的温馨，大家轻轻地说笑着，谢晋不时地把菜肴挟到阿三阿四的盘子里，并为他们塞好脖下的餐巾，阿三、阿四嘿嘿地傻笑着，谢晋也附和着笑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红晕。是啊，这是多么难得的团聚啊，这样的团聚，对于孩子们来说，能和父亲在一起这样住上好几天，这真是最大的幸福和满足了，而对于谢晋来说，这就是真正的天伦之乐了。

在家乡过完了春节，谢晋和家人在正月初五，即1988年的2月21日傍晚回到了上海。在家里休息了一两天，谢晋就到日本参加由日本一个机构组织的电影《芙蓉镇》学术讨论会去了，不过这次去日本的时间并不长，总共才呆了几天，他就匆匆赶回来，然后就一头扎到《最

后的的贵族》这部片子的筹备中去了。所幸剧本的基础比较好，基本上没问题。但这部片子怎么拍，片子拍好后，究竟给谁看，即使到了这时候，谢晋仍是犹豫的，他说过："有人曾经劝我应该拍让500人欣赏的高层次电影，我还是选择了一亿观众。我总感到真正搞艺术的不能像墙角里的花，只是孤芳自赏。创作还是要贴近时代，心中要有大多数的人民，我今后的宗旨仍是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要接近群众，贴近努力超越'自我'。"

而《最后的的贵族》在风格上、题材上乃至在创作的手法上都是与谢晋以往所有的电影有别的，而且是有很大区别的。这部片子能否拍得好，是有风险的，别人心中没有底，其实谢晋的心中也没有底，虽然他曾与人打过赌："看了这部片子你如果不落泪，我请客。"但究竟怎么样，他自己心中是清楚的，毕竟，这是一次艺术的变法，也是一次艰难的超越，而"变法"和超越的成功率是很低的，甚至是要作出牺牲的。

《大师谢晋》 酝酿“贵族”（3）

一、酝酿“贵族”（3）

在筹拍《最后的贵族》的过程中，台湾作家白先勇来到了上海，白先勇是《谪仙记》的原作者，是台湾现代派文学主要作家之一。他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战将白崇禧，人称小诸葛，权重一时。但自随蒋介石溃退台湾以后，终因政见不合，在极度的政治压抑和思乡之情的折磨中，郁闷而死。大树倾覆，家道零落，白先勇写的《谪仙记》，就是诠译着这么一个凄凉和哀怨的故事。他把自己的这种人生体验，以及把他所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人生体验，统统写进了这么一篇短短的作品里，可以说，他把作品中的人物写活了，特别是李彤。白先勇非常“熟悉”李彤，他不但熟悉她的外表，还了解她的内心，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先勇就是李彤，李彤就是白先勇。

白先勇来上海，一是来看老朋友谢晋，这之前，他们已经见过好几次面了，但介绍他们认识的并不是什么人，而是谢晋的电影《天云山传奇》，那是在美国洛杉矶，白先勇在影院看完这部片子后，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对一位知心朋友说：看了这部影片，我开始相信中国的政策变了。这样尖锐的题材，居然在大陆可以拍，而且可以拿到美国来放，这说明这个国家敢于正视自己过去的错误了。于是，他找到了正在美国的谢晋，那一晚，他们谈了很久很久。白先勇来上海的第二件事是想来了解《最后的贵族》的进展情况，特别是电影的主旨。为此，他很想听听导演谢晋和编剧白桦的意见。于是，在他抵沪数天后的一个晚上，在白先勇下榻的酒店，他与谢晋见面了，在淡淡的茶香中，两位艺术家作了一次酣畅的长谈。

但要拍好《最后的贵族》，关键还是要塑造好典型的人物性格。李彤这个人，正是大动荡时代的特定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在过这样的典型。我们都喜欢津津乐道地谈论《红楼梦》《三国演义》或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这些人物至今仍给我们很

多启发和美好享受。但我们的电影所塑造的人物，就达不到这样的程度。电影中的人物比较单一，不够丰满和深刻。很多人瞧不起电影，认为电影没能塑造出不朽的典型，不能不说是个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不光是剧本的写作问题，作品写好了，演员演不好，人物还是塑造不出来。

在与谢晋作了彻夜长谈后，白先勇又与编剧之一的白桦对剧本作了深入的探讨。他们的意见亦一致。白桦赞同白先勇的观点，他说："白先勇对李彤这个人物的思索已经超出所谓国共两党之争、成败、是非等等之外了，他以全部激情描写的是人类之中的一个独特的，写这个人走向深渊的那段最痛苦也是最美丽的历程，（这就是这个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我无条件地给予李彤以全部的同情、理解和爱。我完全忘了她是中国最后的贵族的一个小姐，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同胞、一个同类、一个至死都不自甘沉沦而又承担不了如此沉重的痛苦和爱恋的人。"

白先勇此次上海之行的最后一个活动是寻找自己的祖居，他父亲在大陆时，在上海有好几处房产，当时的国民党许多大员都这样，解放后，这些房产全被人民政府接管了。现在，这些房子有的被居民居住着，有的则用作了单位的办公房，有的则成了某家医院的一部分。那天谢晋陪着他，长久地在这些当年曾无比辉煌和荣耀的小楼前踯躅着、徘徊着，回忆着历史的嬗递，感叹着沧桑的巨变。最后还是白先勇先开口："走吧。"次日一早，白先勇就离开了上海，飞回台湾。

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和酝酿，《最后的贵族》即将于7月的中下旬正式开机。在这之前，谢晋已亲赴美国、意大利及威尼斯等地选取外景，国内的一些景点，也都由他亲自踏勘和选定。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和习惯，只有这样，他的心里才踏实，现在一切准备工作，已差不多准备就绪了。

就在谢晋紧锣密鼓地做着《最后的贵族》开机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时，一个名叫上海巨星影业公司的机构这时候破土而出了。巨星影业

公司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子公司，由谢晋任艺术总监，上影厂的常务副厂长迟习道任总经理。公司下设制片部、创作部和经营部，在经济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享有自己挑选剧本、筹措资金、组员拍片的权力。作为我国第一家具有相对独立制片权力的影业实体，谢晋成立这样一家公司，当时的议论是很多的，但从总体上来说，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领导也是全力支持他创办这家公司的。而从谢晋本人看，这是他多年的愿望。1955年他与石挥等人成立的“五花社”就是他这个愿望的萌芽，后来这个萌芽虽在反右斗争中被残暴地扼杀了，但这个愿望却从未在谢晋的心中消失过。对此，他曾这样说过：“我国各制片厂对导演的安排，做法不一，这个问题在我记忆中也是动荡、折腾二十几年了。除了极‘左’路线干扰以外，对创作人员的安排老是想来个划一不二，其实艺术最忌划一。我想的和三十多岁的青年导演不一样，也和七十多岁的沈浮同志不一样。沈浮同志又和张骏祥同志不一样，因为张骏?又做局长又要当导演。所以试图把一个厂的导演一刀切地划分是最忌讳的。我觉得创作室的作法可以，固定摄制组也可以，几个导演搞一个组也可以，千万不要划一。每个导演的想法不一样，我自己十几年前的想法同现在不一样，十年后体力下降不能拍戏了，想法还会是另一样，这方面也希望有关部门的领导尊重规律，解放思想。”

成立巨星影业公司，可以说是了却了谢晋平生的愿望，开创了中国电影界以导演作为独立法人的先河。这样，中国几乎所有的电影制片厂都要以成立由导演独立“组阁”的摄制公司，这是电影艺术发展的走向和必然，是无法阻挡的。遗憾的是，“巨星”后来在上海的命运并不佳，在公司摄制了《最后的贵族》和《清凉寺的钟声》及《老人与狗》等几部片子之后，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由于某些关系仍未理顺，导致了子公司与制片厂之间的摩擦越来越频繁，虽经有关领导和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最终因调和无望，只好分手。这次分手不仅仅只宣告了“巨星”的歇业和解散，而更重要的是导致了谢晋与上影厂之间

的彻底剥离。尽管这种剥离对谢晋来说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毕竟是上影厂的导演，他是在上影厂良好的艺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也可以这么说，没有上影厂也就没有他谢晋，但有些事情又是很复杂的，一言难尽的，谢晋不想使这些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他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复杂心情下，谢晋离开了上影厂，确切地说，他不再当上影厂的导演了，而是成立了另一家公司，这就是后来的上海谢晋——恒通影视公司，这当然是后话了。

在《最后的贵族》开机前，谢晋推辞了几乎所有会影响到他创作情绪和精力的一切社会活动，但有两件事，他却是无法推辞的。一是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二十六届卡罗维法利国际电影节。作为世界五大电影节之一，这个电影节是备受各国电影界人士重视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节上，要放映他的《芙蓉镇》。还有一件事是去深圳参加第十一届百花奖、第八届金鸡奖颁奖大会。因为在这届金鸡奖的颁奖仪式上，他要主持为获奖者颁奖。这两个活动都是既耗时间又耗精力的大活动。好在一个在7月初，一个在8月底。冲突还不大，但到了6月底，真的要去办出国签证了，谢晋又犯难了，《最后的贵族》马上要开机，他作为导演怎么能离开呢，左思右想，他觉得还是不去为好，但他不去，总得有人代他去，他想到了徐松子，徐松子虽在片中扮演的不是主要角色，但她演的李国香确实不错，这次去，获奖的可能性很大。决定了之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中国电影代表团的负责人和徐松子本人。在得到了双方肯定的答复后，谢晋也就专心致志地去忙他的《最后的贵族》了。7月初，徐松子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如期赴捷。有一天晚上，正在北京出差的谢晋忽然接到了上影厂副厂长，本届卡罗维法利国际电影节评委于本正和徐松子从捷克斯洛伐克打来的电话，听得出，他们在说话时很激动，他们告诉谢晋：《芙蓉镇》在电影节上放映之后，观众的反应非常强烈，在由22个国家130多部影片参加的角逐中，它夺得了本届电影节上的最高奖——“水晶杯”奖，徐松子也获得了电影节戏剧家评委奖。

接到电话，谢晋的心情也和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的心情一样激动，他认为《芙蓉镇》的获奖，不仅仅是对一部电影的肯定，而是表明了整个民族的觉醒。《芙蓉镇》从拍摄、送审以至放映过程中的曲折，可以折射出解放以后中国电影的不凡命运和沉重。中国电影从1950年起便涉足卡维罗法利电影节，但送去角逐的大多是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影片，在漫长的38年中，在与勃兴的意大利现实主义派的竞争中，中国的电影导演和明星们目睹观众对后者的狂热和崇拜，不免倍感寂寞和冷落……

7月22日，中国电影代表团从卡罗维法利电影节载誉归来，谢晋早早地等候在北京机场的出口处，当上影厂副厂长于本正捧着那只由捷克著名工艺家设计的，用驰名世界的捷克玻璃制作的水晶球步出出口通道时，迎候在旁的电影界领导和同仁们纷纷涌上前去，将一束束鲜花送给他们。谢晋今天既是迎客者，又是被欢迎者，当欢迎的人群把鲜花送给代表团成员时，大家又转而把鲜花送给了站在一旁的谢晋。

次日，抱着17公斤重水晶球的谢晋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上。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陈至立及副部长徐俊西、市电影局、上影厂的有关领导在机场迎接他。谢晋在机场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这部片子完成前后经历了风风雨雨，两年来它经受了考验，也说明了像《芙蓉镇》这类影片还是有生命力的。"《芙蓉镇》的确是有生命力，就在谢晋说这段话的几天之后，北京有一位电影评论家想重温一下《芙蓉镇》的情节，便来到北京正在上映此片的一家电影院，他发现在近千人的大厅里，竟然座无虚席。这使这位评论家十分惊讶，没想到一部影片，在两年之后，"剧场效果"竟还如此强烈，可见，时间在滤筛着每一部作品，最终的裁判者应当是人民。

数天之后，上海市委宣传部为影片《芙蓉镇》获卡罗维法利国际电影节大奖举行隆重的庆功会，以?彰导演谢晋和影片的创作人员。此前，市电影局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已为《芙蓉镇》开了表彰会并颁了奖。市电影局和上影厂奖给谢晋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奖给《芙蓉镇》

摄制组二万元，编剧古华和阿城各奖二千五百元。此后市政府又奖给摄制组一万元。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手捧沉甸甸的奖金，谢晋内心异常激动，他说："遥想当年，我拍的《舞台姐妹》在上海遭受批判时，我是多么的孤立无援，而今天，我拍的《芙蓉镇》同样受到了责难，但处境却大不相同，我要感谢在《芙蓉镇》栉风沐雨时给予我大力支持的领导和观众们。"

炎热的7月很快在谢晋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过去了，接着，秋天便不知不觉来到了。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对于谢晋也一样，今年的喜事特别多。除了投拍《最后的贵族》，《芙蓉镇》获国际大奖外，8月中旬由静安区影评协会出面，又为谢晋举办了《谢晋电影回顾展》，有七部影片参加了这次回顾展，总共放映67场，观众达37000多人次，平均上座率98%，这样高的上座率，在电影市场日渐不景气的状况下，对谢晋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欣慰，而对中国的电影界来说，又不能不说在揭示着一种希望。

在回顾展的开幕式上，谢晋作了一番非常精彩而又发人深省的发言，他开玩笑说："给活着的电影导演搞回顾展，这在我国影坛似乎还没有过，说实在的，我国的电影导演要搞一个回顾展是很难的。一来是拍的影片不多，二来是拍的不少影片已无法作回顾，同时他又说：从这次回顾展来看，我的影片还有这么高的上座率，特别是《芙蓉镇》最近又在卡罗维法利获大奖，它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世界特别是东欧对中国的改革与中国的政治问题很感兴趣。当然，中国电影离全面进入世界市场的目标还很远很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自满。"

《大师谢晋》 林青霞爽约“贵族”（1）

二、林青霞爽约“贵族”（1）

但收获的季节也有收获不到的果实，这个收获不到的果实而且是个大果实，她就是台湾影星林青霞，林青霞原定在《最后的贵族》中饰演第一号主角——李彤。她是谢晋特别看中的，在台湾的众演员中，谢晋比较喜欢的有三位：林青霞、张艾嘉、柯俊雄。他曾对一位记者说：“我看过林青霞主演的影片不下五六部，她的戏路宽，表演富有个性，气质清纯、内向，在影坛的长跑中压倒了一批批角逐者。”1986年2月，谢晋刚从法国参加恺撒国际电影节的颁奖活动途经香港。晚上，香港南方影业公司宴请谢晋、卢燕和陈冲。卢燕是一位中美文化交流的搭桥人、牵线人，席间，她悄悄地对同桌的谢晋说：“林青霞正在香港拍《刀马旦》，要不要和她见见面？”谢晋当然很愿意。

这一天晚上，已过了凌晨一点了，卢燕陪着拍完夜戏的林青霞来到了谢晋的下榻处。一个大陆的大导演和一个台湾的大影星就这样见面了。林青霞一见谢晋的面，就像是见着老熟人，笑着打招呼说：“谢导，我刚看过你执导的《牧马人》，拍得真好，我好喜欢。”谢晋说：“你拍的不少片子如《窗外》《我是一片云》等我也看过，拍得不错。”

就这样，两位来自海峡两岸的电影艺术家，虽然存在着地域的差异，年龄的差异和政见的差异，但相同的根、相同的肤色、相同的语言和相同的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把他们两人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他们谈得是那么默契，那么投机，给对方留下的印象是那么的深刻和难忘。

就在这一次见面中，谢晋向林青霞透露了他即将筹拍由白先勇的小说改编的《最后的贵族》的电影，并且直截了当地问她：如果影片

真的上马的话，你愿不愿意饰演其中的主角。林青霞不置可否地一笑，从她莞尔一笑的眼神中，谢晋的心中已经有底了。

1987年9月份，已正式确定拍摄《最后的贵族》电影的谢晋想约林青霞见一次面，以便对扮演李彤的角色作最后的敲定。因林青霞无法来大陆，见面的地点只好商定在香港。那一天，林青霞按约定的时间从台湾来到了香港。而谢晋却因延误了签证的时间而未能按时赴香港，而这一延误竟使林青霞在香港空等了五天，到了第六天，当谢晋乘坐的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降落时，在另一条跑道上，林青霞乘坐的飞机正好凌空而起。

一个月之后，谢晋和制片主任及摄影师等六人飞到了美国为《最后的贵族》一片看外景。到达加州后没几天，听说林青霞也在美国。谢晋即打电话到林青霞的住处，林青霞不在，她到赌城玩去了，谢晋又打电话到赌城，林青霞接到谢晋的电话后，便在那边欢叫了一声："我马上来。"从赌城到洛杉矶走高速要5个多小时，林青霞嫌时间太慢了，就立即赶到飞机场，搭乘最早的一班飞机飞到了洛杉矶。

晚上，在马利贝特大旅馆的咖啡厅里，谢晋与林青霞又一次相见了，不过这一次相见，与上一次有所不同，这一次他们是以合作者的身份出现的。这之前，谢晋曾托一位朋友将《最后的贵族》的剧本送给林青霞，希望她好好看一看。

在咖啡厅柔和的灯光下，谢晋和林青霞面对面坐着，林青霞一面饮着在《最后的贵族》剧本中女主人公李彤最爱喝的曼哈顿鸡尾酒，一面娓娓而谈，她年轻而美丽的脸上，泛着兴奋的少女般的红光，她说："李彤的角色对我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因为我理解李彤的内心世界，她的经历我都有过。"林青霞还笑着告诉谢晋：为了争取李彤这一个角色，她已一连推掉了由李翰祥执导的《同治实录》和由严浩执导的《棋王》等四部影片。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呢。

谢晋说："我喜欢让演员做小品，你在饰演李彤的角色时，还有什么距离吗？"林青霞满有把握地说："我没有距离，我就是李彤。"谢晋

接着又说道："我这个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是很严厉的，因而有人叫我'法西斯导演'，你受得了吗？"林青霞笑道："我就是喜欢要求严格的导演，最怕导演什么要求也没有。"

一个理想中的默契合作就这样简单决定了，然而这又是一个多么不简单的决定啊。新中国成立40年来，从来也没有一位台湾演员来大陆拍过戏，如果这次合作真能成功，这不仅会在海峡两岸的文化演艺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更会对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产生积极的意义。

这起看起来仅仅是两岸演艺界之间的合作，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追踪与关注，当然，也毫无疑问地受到了大陆和台湾高层的密切关注和重视。

最早作出反应的是台湾当局。当林青霞正式作出决定并对外宣布赴大陆拍摄由谢晋执导的影片《最后的贵族》时，她曾到台湾新闻局打听，希望得到他们的允许和认可。但新闻局对此的态度是明确的：不可以。林青霞不想得罪新闻局，她想再做一做工作，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谢晋，希望谢晋再等一等。没想这一?又等了几个月，台湾新闻局的态度丝毫未松动，而谢晋这里却先"松动"了，原计划剧本中有林青霞在大陆的戏，这次为了能请林青霞出山，谢晋只好把林青霞在大陆的戏删掉，统统放到美国、香港拍。但新闻局仍然未表态。

到了1988年2月，《最后的贵族》已经推迟开拍半年时间了。这时候，在片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一些演员如潘虹、肖雄等人都已相继集中在上海，熟悉剧本和生活。再等下去，万一林青霞真的来不了，损失可就太大了。但谢晋表示：再等等。这时候陈冲从美国回到了上海，她找到了谢晋，希望由她来扮演李彤的角色。谢晋没有正面表态。但他事后说：李彤这个角色难度很大，她既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极熟悉战后美国社会生活的情况，同时，她年轻美丽又阅历复杂，内心活动变化深刻，外部动作幅度很大。因此，他表示仍希望由林青霞出演。只要她能来，《最后的贵族》宁可等。

《大师谢晋》 林青霞爽约“贵族”（2）

二、林青霞爽约“贵族”（2）

漫长的等待是颇让人心焦的，为了不让大好的时光在等待中流失，谢晋决定将原先暂时放下的重拍《桃花扇》的计划提上来，为此他在这期间又跑了不少的地方。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最后的贵族》何时开机仍然是个谜。对此谢晋心里焦急，已集中的演员们心里急，热心的观众心里急，台湾那边林青霞的心里更焦急。6月29日，台湾方面终于就林青霞可能赴大陆拍片一事做出公开表态，称：“针对影星林青霞可能前往大陆拍片问题，新闻局电影处今天表示，凡电影从业人员赴大陆参与拍片者，如经调查属实，仍将依照《戡乱时期国片处理办法》办理。”

据了解，林青霞已答应大陆导演谢晋的邀请，拍摄电影《最后的贵族》，预计于下个月在上海开镜。电影处说，凡电影从业人员赴大陆参与拍片者，其影片一律禁演，演员证也将撤销三个月。

7月2日，也就是说在中央社发表了那篇文章的第三天，林青霞也对此作出了明确的态度，台湾《中国时报》在采访了台湾新闻局电影处官员和林青霞本人后，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林青霞对当局警告作出反应——只要与谢晋合作拍到好电影就一定勇往直前。

文中称：新闻局电影处专员汪传清，前天晚上在长途电话中，与林青霞就最近盛传她答应拍《最后的贵族》一事，希望对林青霞的意愿加以了解。新闻局在明白林青霞确有与谢晋合作的意愿时表示，该局将会照章办理。记者昨日找到林青霞，问及她与新闻局通话后的反应。对于新闻局日前的表示，林青霞说：“我希望新闻局不会这样做，我只不过是想拍一部好戏，让所有的中国人看到我的电影，这是身为演员最大的愿望。而我觉得自己没有错，反而应该得到政府的辅助与鼓励才对。”

林青霞是否与谢晋合作，圈中人反应不一，有些极力支持、鼓励，有一些却反对。

而支持者的目的是希望林青霞走出“第一步”，而反对的却怕林青霞一旦受到制裁，失去一个台湾市场，从而不敢再找林青霞拍戏。

对外面的反应，林青霞非常平淡地说：“只要这次与谢晋合作，可以拍到一部好电影，我一定勇往直前。”

林青霞最后强调，她答应了拍谢晋的《最后的贵族》，绝不会再为客观的环境而出尔反尔，因为她要守信用。

海峡两岸的媒体关于林青霞来大陆拍片的宣传在7月的中旬达到高潮。而林青霞与台湾当局的对峙也几乎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7月18日，上海《新民晚报》在第二版右上角发表了一篇颇引人注目的文章，题目是：台湾影星林青霞决心顶住压力，饰演《最后的贵族》女主角一事不会改变。日前曾来沪与谢晋商谈拍片事宜。文中称：台湾著名女星林青霞目前正是海峡两岸电影圈注目的人物，自从她答应在谢晋导演的《最后的贵族》担任主角的消息传出后，受到了来自台湾当局的压力，台湾“新闻局”声称若林青霞与大陆影人合作，将“照章办理，影院禁演，演员吊销执照”。此外，台湾电影圈内外不少人也劝林青霞审慎从事。

对此，林青霞相当坚决，最近她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汪曼林采访时说：“我明白别人的好意，但除非剧本不好，我的决定是不会动摇的。据我所知，谢晋已将《最后的贵族》的演员齐集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准备开拍了，如果我出尔反尔，那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7月上旬，林青霞的新片《今夜星光灿烂》拍成，她即赴美国探亲，据香港《成报》10日报道：林青霞在离开香港的当日即7日先抵达上海，跟谢晋商谈拍片事宜。她在上海逗留了一天一夜，已于9日中午赴洛杉矶。

然而中国的广大观众万万没想到，就当这篇文章在新民晚报刊出数天后，林青霞竟突然在台湾宣布：取消去大陆的拍片之行。这使许

多人感到纳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于这件事蒙受了最大打击的谢晋心里最清楚，但他则是有苦难言。不久之后，他才向几位新闻界的朋友披露了这件事的内幕，他说：《新民晚报》那篇文章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林青霞‘日前曾来沪与谢晋商谈拍片事宜’，但一般读者都没有注意文章这句话，那时海峡两岸的人是禁止往来的，去年台湾《自立晚报》两位记者因为赴大陆采访而被台北地方法院立案审理。林青霞自然也不能除外。但为了最后商定拍片事宜，林青霞还是冒着风险秘密来了，对于这件事，从北京到上海的高层领导都非常重视，关照要采取一切措施搞好安全和保密，不得有半点泄漏。林青霞来了之后，果然没有透露风声，大家谈得也很愉快，但问题出在上了飞机之后，那天我去送她，把她送上飞机后，我就回来了，不料那天飞机的发动机出了故障，在排除故障的这段时间里，所有的乘客全部下来，林青霞也只好下来，在候机厅休息时，不料被香港的一家报纸记者认出，他当即认为这是一条重要新闻，于是就在机场写了一条消息，立即发往报社，没想这就闯下大祸，当时台湾正在召开“中常会”，大陆和香港的关系有望悄悄解冻。没想这时候竟出了这个漏子。那家香港报纸在当天登了这条消息后，全世界立即有50家报纸予以转载。但这件事林青霞还蒙在鼓里，那天她刚下飞机，母亲来接，就问：你怎么到大陆去了，林青霞还想掩饰，说：没有呀。她母亲说，你还说谎，香港报纸都登了。林青霞取过她母亲手中的报纸一看，脸都白了。当时，有几个也来接机朋友说：原本讲好，要绝对保密的，怎么人还未到台港，马上就捅了出去，这不是在故意制造舆论么。对于这件事，林青霞非常生气，也非常伤心，决定不再参加《最后贵族》的演出。

至此，被媒体炒了一年多的由林青霞出任主演《最后的贵族》的舆论终于落下了帷幕。谢晋为之努力了一年多的辛劳也因为这起偶然事件而化为泡影。虽然，林青霞后来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毕竟这件事在她的心中投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当然，她并没有责怪谁，她

更不会责怪谢晋，对谢晋，她至今仍抱着深深的敬意。但她还是说了一句十分中肯的话：“一部片子的宣传，开拍前做得太大，并不一定是好事。”

《大师谢晋》 林青霞爽约“贵族”（1）

三、赶潘虹“上架”（1）

《最后的贵族》因饰演主角李彤的林青霞中途变故而陷入了困境。李彤在哪里？谁来演李彤？处在极度苦恼之中的谢晋曾不止一遍地问自己。也不止一遍地问别人。李彤没有着落，《最后的贵族》又从何谈起，但《最后的贵族》又不能因为没有“李彤”而偃旗息鼓。这对谢晋，对其他的演员，对已组建起来的摄制组全体人员来说太不公平了，也太伤了他们的自尊了。

这时候，有一个人，不知不觉地跳进了谢晋的眼帘，对这个人，谢晋其实已经注意很久了，她就是潘虹。潘虹原定在《最后的贵族》中饰演黄慧芬，黄慧芬是第二号主角，在戏中分量并不轻。现在突然决定由潘虹饰李彤，她会接受吗？这一天，正在北方拍《顽主》的潘虹突然见到谢晋导演站在她面前，不禁吃了一惊，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谢晋便把林青霞因故不能前来大陆拍片的情况与潘虹说了下，然后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现在决定由你来演女主角李彤。”

“由我演李彤？”潘虹很吃惊地问。

“对，由你演李彤。”谢晋再次肯定地说。

潘虹美丽的颈脖垂下了，她的脸因激动而通红。这太突然了。李彤是第一号主角，在片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万一演砸了，她怎么向谢导演交代，向广大电影观众作交代。坦率地说，她对李彤，对她在海外的生活，对她的气质，对她的生活习性，一点也不熟悉。现在，要她去演一个她并不熟悉的人，这太为难了。

若干年后，当《最后的贵族》已经拍竣并在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之后，潘虹曾对一位朋友谈起过当时听到谢晋要她饰演李彤时的那种惶恐不安的心情，她说：“说心里话，接到谢导演的通知，要我接替林青霞演李彤的时候，我脑子里嗡了一下，甚至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坦白地说，我不是一个很谦虚的演员，我以为一个演员最可贵的

不是谦虚，而是进取，在我的艺术银河里，我演过杜十娘、陆文婷、曾树生、徐丽莎、婉容等十几个从古至今的艺术形象，青楼的凄凉、井边的控诉、宫廷的挽歌……演陆文婷的时候，社会舆论压力不比演李彤轻，不少人是以观望和怀疑的态度看我接这个角色的，但是我充满自信。我相信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只要我努力去寻找，我不仅能找到一个陆文婷，而且可以找到陆文婷的一代人。但《最》片在上影厂众目睽睽下，加上谢晋导演的知名度，加上对李彤的生活圈子我很陌生，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在这之前，早已确定我演黄慧芬，服装全部都做好了，人们一喊‘黄慧芬’，我立刻会搭腔，总之我是完全进入了这个角色……”

她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向谢晋吐露了出来，谢晋笑了，他说：“黄慧芬你熟悉吗？黄慧芬你也不熟悉，但你为什么接受这个角色呢，因为她不是主角，心理负担轻，现在叫你演李彤，并不是你演不好，而是你心理压力重，其实你是能够演好李彤的，你有这样的功力，我相信你。”

潘虹的眼睛湿润了，这是一位大导演，是一位恩师对她的鼓励和鞭策。在她成长的道路上，这位恩师似乎始终默默地关心她、注视她。她不会忘记那一年，她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分配进上影厂当电影演员，不久就被谢晋叫去在他导演的《青春》一片中饰演一名海军战士，正在这时候，峨嵋电影制片厂正在筹拍的《奴隶的女儿》一片因缺少一名女主角，他们看中了潘虹，于是就派潘虹后来的丈夫米家山前来和谢晋商量，没想谢晋竟一口应允了米家山，并找潘虹谈了话，对她说：“对一个演员来讲，成功与否很可能在一部戏中就能决定命运，虽然你在我这部影片中演的角色很有戏，但毕竟不是主角，你还是去他们那儿吧，你会成功的。”由于谢晋的豁达和鼓励，使潘虹在那部片子中一举成名。以后，她虽然再没有在谢晋导演的片子中担任过角色，但只要有见面的机会，谢晋就会给她以父辈般的教诲和关怀。这些年来，她殚思竭虑地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具有浓郁悲

剧色彩的女性形象，给广大观众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充满人性的、撼人心魂的艺术形象，无不与这位艺术前辈的人格魅力和艺术熏陶有关，可以这么说，在潘虹的心目中，谢晋是一个永远可以信赖的好朋友，是一位永远关怀着她成长的长者。现在，当他为自己提供了这么好的一次施展艺术才华和挑战艺术高峰的机会时，她还有什么理由犹豫不决呢？于是她对谢晋说："谢导演，你放心吧，我演，而且一定努力演好。"

《大师谢晋》 林青霞爽约“贵族”（2）

三、赶潘虹“上架”（2）

《最后的贵族》因饰演主角李彤的林青霞不能前来大陆拍戏，而由潘虹接替她的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舆论顿时热闹起来，各种议论和猜测应运而生。而议论和猜测的焦点则是：在林青霞和潘虹两人中，究竟谁演李彤更为合适呢？对潘虹不利的是，尽管她是国内两届“金鸡奖”得主，被日本列为世界十大明星之一，并且在她作出饰演《最后的贵族》女主角李彤的决定前不久，她又以自己无可争辩的演技，被蜚声国际影坛的法国大导演戈达尔选中，饰演由他执导的艺术纪录片《世界电影史》中青年时代的嘉宝。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尤其对于一个亚洲的演员来说，可以说是相当不易的殊荣。但话又回来，被称为宝岛玉女的林青霞又有其无可置疑的号召力，林青霞式的微笑、林青霞式的服装、林青霞式的发式、乃至林青霞式的步姿，都是当时大陆少男少女刻意模仿的热点。这一股又一股的林青霞热浪，对个性与林青霞截然相反的潘虹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冲击。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与上影厂合作拍摄《最后的贵族》一片的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因主角易人，他们决定立即压缩投资，谢晋虽竭尽全力加以说服，但终未如愿。

8月的中旬，曾被媒体炒了又炒的影片《最后的贵族》，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筹备和各种各样的波折之后，影片的导演谢晋终于向外界透露：9月初，《最后的贵族》将正式开机。虽然这个消息有点姗姗来迟，但对全国广大的电影观众来说，总算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盼头了。

由于台湾国民党“十三大”对大陆政策不变，尽管在8月初，原已宣布不再饰演《最后的贵族》女主角李彤的林青霞经过慎重考虑后，再次致电谢晋，表明自己所受的压力很大，但她实在舍不下李彤这个角

色，因此要求延期开拍，但基于影片的所有计划均已安排妥当，谢晋只好表示难于再次延期。

消息一经透露，媒体便格外关注。当然，最忙的是谢晋，他不仅要应付来自海内外许多记者的追踪、采访，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开机前的各项准备，这是《最后的贵族》的第一炮，必须打响。

就在他忙得分身乏术时，来自北京和深圳方面的电话这几天也明显多了起来，因为，第十一届百花奖和第八届金鸡奖颁奖大会的时间临近了。作为本届金鸡奖的主任评委，谢晋的任务是很重的，他不能再呆在上海了，他必须立即赶到深圳去，那里正有一大堆事务在等着他。于是，在匆匆地安顿好上海的有关事务后，他就急急地赶到了深圳，与他同行的还有潘虹等。潘虹是第一届金鸡奖得主，虽然她这次不在获奖者之列，但谢晋这次请她来，是别有用意的，因为在谢晋的眼里，潘虹现在则是李彤了，她现在应该以李彤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8月20日晚，盛大的“双奖”颁奖晚会如期在深圳体育馆举行。整个体育馆座无虚席。除了前苏联、法国、日本等国的电影同僚及中外记者两百多人专程赴会外，特别是香港各界组成了近百人的庞大代表团，同庆盛典。

谢晋这一天的精神特别好，虽然在这次“双奖”中没有他的作品提名或得奖，但他还是从内心里流露出对所有获奖者由衷的祝贺，特别是对年轻的导演和演员们，如张艺谋导的《红高粱》，如刘晓庆演的《原野》等等。从这些不凡的作品中，他看到了中国电影的未来和希望。他曾对从他手中接过奖杯的刘晓庆这样说：“《原野》历经磨难，现在终于获了奖，希望下次颁奖时能再看到你。”面对这位曾在她最危难的时候理解她、提携她的老导演、老前辈，刘晓庆手捧奖杯，心中百感交集，她含着泪花，环顾四周，既是对谢晋说，也是对场内的观众说：“如果八年前领到这个奖，我会更高兴。”

9月3日，准备就绪的《最后的贵族》如期在上海开机，开拍的第一个镜头是“律师事务所”。

谢晋把这第一个镜头选在市中心的瑞金宾馆。他这样选择是别有匠心的，因为瑞金宾馆是解放前由洋人建筑师设计的，造好后既住过有钱的富人，又做过美军的俱乐部。因此，“洋味”很足，其整个格调十分符合《最后的贵族》选景的需要。

《大师谢晋》 林青霞爽约“贵族”（3）

开拍那天，这家闹中取静的宾馆真是热闹极了，整个场面，可以说是“贵族”们的巨大盛会，豪华、气魄、高雅、隆重。在衣锦如冠彬彬有礼的人群中，李母的饰演者美籍华裔影星卢燕亮相了，黄慧芬的饰演者李克纯亮相了，雷芷苓的饰演者肖雄亮相了，张嘉行的饰演者卢玲亮相了……还有一些重要角色的扮演者如祝希娟、毛永明、王频、李维新、颜颇德……一个个都亮相了。在拍摄现场，记者们不停地穿梭其间，闪光灯不停地闪烁。谢晋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泛着潮红的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微笑，大家正是从他这张充满自信的脸上，看到谢晋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和拼搏，看到了这部片子的美好前景和希望。

诚如李母的饰演者卢燕对记者说：“谢导请我参加《最后的贵族》的演出，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任务，我到上海后，经过几天排练，发现谢导对演员要求非常细腻，我很羡慕所有能够在这部影片中和谢导合作的演员，因为他给了演员们以充分发挥自己表演才华的机会，这些条件在国外是不可能的。这些精益求精的工作环境，因为经济条件，在国外是不可能有的。”为此，她预言：《最后的贵族》将在明年的“百花奖”和“金鸡奖”上能够给谢晋带来六连冠的荣誉。

对此，潘虹也深有同感，她颇有信心地说：“我想，这次应该说是我在那个射程的距离还没有丈量之前，站在了李彤的位置上，但是我也清楚这个角色对我来讲，将是一个全新的意义，我希望我能付出更多更强烈的力量，使我的艺术水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按照剧本规定的场景，《最后的贵族》有50%的镜头要去美国纽约拍摄，有40%的镜头要在上海拍摄，剩下的10%要去威尼斯拍摄。从场景的拍摄比例看，上海的重场戏分量很重，因此，谢晋要求，上海的戏一定要拍得很美，很豪华和辉煌，因为这是主人公一生中最美

丽的时刻，也为主人公最后的悲剧结局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时也意蕴着在金碧辉煌中这群最后的“贵族”们不可抗拒的归宿。

应该说，在上海一开始拍摄的几场戏是成功的，起码在谢晋看来是这样的，但别人怎么看，他心中则没有底。为此，就在影片开机不久，谢晋就邀请了一些好朋友，来上影厂的电影放映室看他刚拍的“无声片”。整部样片接起来还不到十分钟。短是短，但这是整部影片的开头，开头如何，决定着整部影片的命运和成败。对此，谢晋是非常看重的。就在样片放映之前，他便亲自站在大门口，迎接前来观片的新老朋友们。有一位精细的记者，当时就曾观察过谢晋的神态，他说：“我感觉到谢晋虽然在和大家谈笑风生，自信、激昂，但神情中也掩饰不住对潘虹取代林青霞能否成功的担忧。”

这位记者可以说是切中了谢晋当时的脉搏，《最后的贵族》能否取得成功，其中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最最关键的因素，则系在李彤的扮演者潘虹的身上。李彤成则成，李彤败则败。拍了这么多年的片子，又拍了这么多优秀片子，谢晋第一次为无法把握李彤的成败而产生深深的忧虑和惶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他还没有吃透白先勇原著的精髓，还是他对“贵族”这个独特的群众缺少根本的了解，抑或是他的艺术素养，他的生活积累和人生经历，根本就不宜去闯这个陌生题材的禁区。坦率说，他当时对此并未加以认真地思考和琢磨。他是凭着一个艺术家的激情和追求，去撷取、挖掘和创作这个独特的题材的。因为李彤这一艺术形象在我国电影艺术的长廊里，毕竟还未出现过，这个人物形象对任何一个有追求的艺术家来说，都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和吸引力。

只有到了若干年以后，当已经公映的《最后的贵族》并没有出现谢晋一开始所期望的那样轰动的场面后，他才回过头去，对它作了清醒而深刻的思索。

这是一个艺术家在成功道路上的必由之路，任何人都会有这样一种经历，即使是对谢晋这样的大艺术家来说，也是无法避免的。

那天样片放完之后，谢晋第一个就请坐在他旁边的香港大导演张鑫炎发表意见，张鑫炎对这段短短的无声片作了充分的肯定。特别是对整个画面和摄影的美，作了高度的评价，但他也建议谢晋对李彤生日这一场景戏应作必要压缩，因为扮演四位贵族小姐的演员年龄太大了，如果时间延得过长的话，这会从造型上和气质上给影片留下不足和遗憾。对此，潘虹自己也意识到了，她曾开玩笑说："四个小老太婆，演了四个妙龄少女，我从来也没有演过比自己年龄小的角色，没有结婚前就在《苦恼人的笑》里演妻子，没有生过孩子，就在《人到中年》中扮演两个孩子的母亲，这回破天荒老演小，30多岁的人啦，却要演一个20岁的少女，这在年龄上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

对张鑫炎导演的意见，谢晋是重视的，当然，他自己也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为此，他也作了种种努力，以弥补演员与角色之间年龄的差异。不过，他认为要缩小这个差异，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握好演员的情绪，他再三叮嘱潘虹："我不要求你演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我就要求你给我演出一个李彤。"他为此还专门给摄制组立下一条规矩，所有的人都不许叫她们的名字，而只准叫"四个女孩子"。谢晋自己带头这么叫，开始的时候，四位女演员对"四个女孩子"不是很习惯，听到叫声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愣着不吱声。慢慢地她们习惯了，认可了，认为自己就是"四个女孩子"。这样就帮她们清除了心理上年龄的障碍，从而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对谢晋的这一做法，潘虹后来曾这样动情地说："没有谢导演，就没有这个创作集体，我到过很多摄制组，从没有一个像《最》片那样有着如此良好的创作环境，他们会很快让你进入规定的情景，需要拍感情戏的时候，全场人的情绪都会为你作铺垫，绝对不像有些摄制组那样大声喧哗。"

《最后的贵族》在上海部分的戏拍得很顺利。上海是谢晋的大本营，再加上从市里到方方面面都很关心这部电影，因此可以说是一路的绿灯。

但戏拍得很顺利，并不等于说谢晋很悠闲，他仍然是个大忙人。因为是名人，他的社会活动似乎从来也没有间隙过。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向他涌过来。

到了10月底，又有两个大活动，需要谢晋作出选择了，一个是10月30日的上海电影节，一个是10月31日的浙江省电影家协会的换届。这两个活动对谢晋来说都是不能忽略的。上海是他事业的发祥地，而浙江又是他的故乡，但因为两个活动时间只隔了一天，他只能参加其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他只能参加上海电影节，因为他担任了这个电影节的评委会主任。他给浙江省电影家协会发去了一份贺电，并对自己未能参加他们的盛会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他的这份歉意是真诚的，绝不含有丝毫虚伪和应酬的成分。因为浙江的影视艺术家们一直把他当作是故乡的儿子。他们除了尊敬他、信任他、还热爱他。可以这么说，浙江是谢晋电影事业中一块非常扎实而可靠的基地，在这块基地上，谢晋以前和以后所从事的每一次与电影有关的活动，都比在其他地方要得心应手得多。而浙江的电影界，则在这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师谢晋》“贵族”赴美谢晋抠钱（1）

四、“贵族”赴美谢晋抠钱（1）

文代会结束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便陆续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谢晋也匆匆赶回上海。因为在上海，有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在等着他，就是《最后的贵族》摄制组去美国的签证被卡住了，而何时能够批下来，还是个未知数，这使谢晋感到非常恼火。因为这之前，摄制组是办过签证的，但那是一种一般的签证，持这种签证去美国拍电影，会处处碰壁，甚至随时有被驱逐出境的可能，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干什么都有法：拍公共场所、拍私人住宅，连吃、住都牵涉到美国的“法律”，因此，那种身份证不管用。只有持一种H-I签证，才比较保险，同时，有了这种签证，还可以在美国工作若干年，但办理H-I签证又特别难，按美国政府的规定，它是专门发给其他国家有成就的人的一种特殊签证。当然，按谢晋这么大的知名度，再加上他又是评选“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委员会会员，他要获得H-I签证，是轻而易举的事，但问题是他手下的这些人怎么办，最后通过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方才同意这些人按有成就的特殊人才来对待。于是，大家便立即行动起来，按美方办H-I签证的要求，各人都把自己的“成就”罗列了一下，还附加一些文凭、证书。统统复印好后寄到美国。另外，热线联络也开始了，长途电话、电传频繁地往返于上海、纽约之间。而在同时，摄制组全体人员已做好了一切出国准备，二十四只服装器材箱已全部上锁，并扎了箱带，私人所用的衣物也不例外都装了箱包，并送到组里，所有待命人员虽不需天天到厂里“上班”，但大家的心情比上班还要焦虑。有时人虽待在家里，电话却不断打到厂里。用当时的话说，这叫处于一级战备。

但H-I签证就是没有消息，几乎所有为之在努力的人，包括谢晋在美国的一些朋友，都不知道这中间究竟是哪个环节上卡了壳。

等待是焦急的，而当焦急变成了烦躁和不安时，人心就出现了动摇。谢晋是看到这点的，但他有什么办法呢？在国内，像他这样有名的大导演，他拍片的条件是够优越的，但去人家国家拍片，他也是力不从心的。

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受冲击最大的当数潘虹了，潘虹原是安排在《最后的贵族》完成后，再去拍戈达尔的《嘉宝传》，为此，她已与这位法国电影大师签了约。能够被戈达尔选中，并且在他执导的影片中担任角色，这是世界上影星们梦寐以求的幸运。这幸运如今落到了潘虹的身上，她是多么珍惜这次机会啊，但一切似乎都在与她过不去。开始是被林青霞拖了半年多时间，如今又被美国的签证卡了几个月时间，戈达尔与他的制片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直跳脚，而潘虹心里此刻比他们还焦急，但她又有什么办法呢？毕竟，她除了失去戈达尔的信誉外，她还将失去一次难得的机会，而这可是在她整个艺术生命中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啊。

谢晋在这无望的等待中，变得有些坐立不安了。他的这种坐立不安主要的来源于演员们的情绪变化。因为他发现，许多演员由于无事可做，已频频出现在南京路的商店里和某些娱乐场所，而毛永明则每天闷在家里翻来覆去地打他的电子游戏机。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必须给演员们弄点“活”干干了。这一天，所有待命的摄制组人员接到了到厂部报到的通知，大家以为签证的事有了眉目了，便兴冲冲赶到厂里一打听，谁知谢导叫他们来，是叫他们拍电视剧小品。大导演大明星又是大剧组拍电视剧小品，这叫杀鸡用上了牛刀，以前大家谁也没听说过，更没有经历过，但这次他们是乐意的，因为闲着没事干，那滋味的确不是好受的。

电视剧共分上下集，总共十五个小品。每个小品短则1分钟，长则10分钟。虽短，但大家拍得却特别认真。有一次拍《啤酒风波》这则戏，上海正好遇到了寒潮，按据情，饰顾客的潘虹、濮存昕、毛永明等都要在店门口排队，期待买几瓶啤酒好回家过年，谁料店经理（徐

松子饰）却拿啤酒做人情卖大户，大家不仅没买到啤酒，还遭到了店经理的一顿抢白，真是又气又饿又冷。戏拍好后，剧情算是结束了，但几个演员却真的闹起了感冒。

就在大家吞着药片，喝着药水，还有几个正在打着吊针的时候，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来了电话，他们请谢晋去一趟。谢晋去了，但很快就回来了，当他当着大家的面在摄制组的办公桌上，将那一本本盖着签证大印的护照摊开的时候，大家这才意识到，剧组日思夜盼的H-I签证终于批下来了。而这一等，竟足足等了两个月，两个月前，他们打好的道具箱包是干干净净的，如今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而更重要的是，两个月前，正是《最后的贵族》拍片最好的秋季，据几位先行去美国选景的副导演、摄影、美工、制片回来讲，秋季的纽约，是一个五彩缤纷，色彩丰富的季节，十分符合《最后的贵族》的剧情，而现在，纽约等待他们的则是冷峭的寒风、飘落的冬雪和枯枝败叶以及灰色的调子……《最后的贵族》在美国部分所要求的春夏秋冬?别有加的镜头，大部分则是无法拍到了。而对于一部影片来说，明显的季节特征，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是艺术质量最起码的要求。

1988年12月24日，是《最后的贵族》摄制组赴美的日子。因为，在这之前的三天，即21日，早已向外界透露并由谢晋出任艺术总监的上海巨星影业公司正式成立，在成立仪式上，谢晋提出在拍毕《最后的贵族》之后，另有三部影片也将接着拍摄，它们是根据女作家霍达的报告文学改编的《国殇》，反映留美女大学生生活和心态轨迹的《到美国去》以及由中、日、美联合投资的历史巨片《赤壁大战》等。如果《最后的贵族》不完成，后面的拍摄计划势必要推迟。因此，选定24日去美国，是谢晋被迫作出的抉择，除此以外，他已别无选择。因为现实是明摆着的，要么推迟，要么就走，而推迟是根本不可能的，美国不是中国。在国内，为了一部片子的艺术质量，他完全可以推迟拍摄时间。但在美国，他的这种愿望是不现实的。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就是，去美国，马上就去。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冷峭的寒风掠过上海灰蒙蒙的上空，也掠过《最后的贵族》赴美拍片的19位人员的心头。有关方面的领导来虹桥机场为大家送行，大家紧紧握手，默默相对。唯有灼热的眼神在做着无声的交流，那里面包含着信任、期待、信心和决心。

大家提着沉甸甸的行李，更怀着沉甸甸的心情跨进中国民航国际航班的班机。而谢晋则站在进机处，向送行的领导和朋友们挥手。不过他的手挥得并不潇洒，而是又慢又沉，就像他在拍片中喜欢运用的高速镜头那样。因为他心里最清楚，此次美国之行，并非是一次愉快的旅行，而是一次悲壮的远征。

《大师谢晋》“贵族”赴美谢晋抠钱（2）

四、“贵族”赴美谢晋抠钱（2）

《最后的贵族》终于在美国开机了。摄制组租住在纽约市内两幢档次很低的私人房子里。除了谢晋一人一间外，其他人大都两三人一间，还有两个女演员睡双层铺。一间小客厅成了吃饭间、工作间、化妆间和会客室，一间洗澡间是共用的。伙食自己开，这样除了能吃到较对胃口的饭菜外，更重要的还想节约一点钱，因为临时大家还想买点免税商品回家呢。总之，生活是绝对清苦的，这对于在国内住惯大饭店，吃惯了大宴席的一些名演员来说，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没有钱，谢晋兜里总共才装了30万美元，这点钱如果交给一位美国导演拍片的话，还不够他支付一位明星的酬金。而谢晋的这点钱却包括了一部片子的全部支出。

唯一的办法只有“抠”，谢晋“抠”，制片“抠”，所有的人都得“抠”。因为钱实在太少了，除了抠出制作费，抠出用场费用，还抠劳务费，在美国请一位群众演员和特约演员的价格是每天100至150美元之间，高一点的200美元也有，这么高的劳务费剧组无论如何付不起，谢晋最多只能出50美元，可要降到这个水平，他和同事们得做多少工作啊。

在美国请一名司机也要花很多的钱，为了省下这笔钱，谢晋只好把这个“美差”落到了一位香港副导演身上。可这位副导演自己的工作也很忙，现在又要叫他兼司机，每次下场时不是恼怒得骂街，就是困顿得想睡觉。于是另一名副导演武珍年想了个办法，每到这时候，她就派几个小姐、女士坐在他旁边，与他逗趣、聊天，好让他保持兴奋，把车平安地开回住地。

作为一名艺术家，当谢晋在从事的精心之作受到金钱制约的时候，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况且这又是在美国，尽管谢晋想尽了办法，甚至绞尽了脑汁要保证影片的艺术质量

不降低，但实际上，留下的遗憾还是不少的。为了省钱，影片应该拍的全貌，他们只好拍局部。为了省钱，应该租用更多的道具车，以便造成那个时代的气氛，可为了省下每部车一天175美元的租金，他们只能给主要演员配车，其他的一律免了。为了省钱他们不得不在一些最为理想而实际上又去不了的景点旁徘徊，久久不愿离去。剧本中有一个绿园场景，他们每次经过的一个地方正好有这一个“绿园”，每到夜晚，那一串串的白炽灯把千姿百态的树枝装扮得就像水晶宫那般耀眼、富丽。可他们却没有勇气走近它，因为那是绝对不可能借来拍戏的，它太昂贵了。最后他们只好在一条平常的街上找到一家陈旧的酒家来代替。谢晋提出要把一个美元掰成两半花，把省下的每一块美元都用在胶片上，这可以说是谢晋在这次美国之行中最慷慨的一次承诺了。可这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美国电影界，一部片子的耗片比，一般都在几十比一，科波拉、斯皮尔伯格等大导演的耗片比可高达百比一，连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系毕业作品都是十二比一。中国呢，说出来是难以置信的，三比一，这个耗片比，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低的。谢晋例外点，但也不过是四比一或五比一。这次谢晋提出要把省下的钱用在胶片上，充其量也只能达到六比一。而这个比例，在中国已经是最高的了。

同样的，因为钱的原因，也使剧组的演员们吃足了苦头。特别是女演员，她们要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去拍夏天的戏，身上穿的全是薄纱般的短旗袍，周围又没有任何暖气，但在表情上，又要流露出在夏季的欢快和热烈。这需要有多大的克制力、想象力和表现力呀。有一次，该潘虹上戏了，说来也奇怪，每逢潘虹上戏时，天气总是特别的冷，而且又往往总在风口上。那一天，她饰的李彤从歌剧院出来，身上穿着一件紫色斜露肩的拖地长裙。夏风轻轻地吹拂着（其实是寒风），与她配戏的扮演南美人那位小青年连鼻子都冻得通红了，她却站在十九层高的情人邓茂昌的公寓凉台上眺望着纽约的夜景。身上只穿着一件透明得可见胸罩和内裤的黑晨衣。但她的表情却是那么的自

然，精神又是那么的饱满。而在她旁边，摄制组的工作人员穿着羽绒大衣，戴着帽子，围着围巾，把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还冷得瑟瑟发抖。一旁的谢晋感叹说："我们虽然缺少钱，可潘虹的这种品格，我看比百万、亿万美元更值钱、昂贵。"

但潘虹最后还是病倒了。那天，她有一场戏，李彤穿着三点式泳衣和公子哥儿坐着急驶的敞篷车去兜风、嬉戏。导演一声令下：开机！敞篷车便在宽阔的大道上疾驶起来，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就像刀子一样在潘虹大部分裸露的肌肤上剜割。戏拍完了，潘虹的皮肤发紫了，肌肉也冻得麻木了。当天，她就发起了高烧。到了第二天，刚打了退烧针的潘虹又要上戏了，面对如此恶劣的拍片环境，再加上近段时间来所遇到的种种不快和因身体不适带来的烦躁、怨恨，使她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她终于大喊道："我们还是人吗？"

一向温顺、内向而又肯吃苦的潘虹发出的怒喊，充其量只是一种发泄，其实，她是最了解谢晋的，来美国拍片的种种不尽如人意，谢晋所承受的压力和遭受的怨恨远比他们多得多，可他又向谁去发泄呢。说来说去，还是自己穷，没有钱。斯皮尔伯格在上海拍《太阳帝国时》，也是在冬天，可他们专门从美国运来了暖气车，那里面不仅有沙发、有化妆台、有饮料柜，还有床，可这得花多少美元啊。

潘虹发泄了"不满"后，一大早又起来化妆了，她当然不会撂"挑子"，如果真的停一天，那得浪费多少美元啊。她这天拍的是一场少女戏，而且是一场欢蹦乱跳的少女戏，她拍得很成功。戏拍完后，她又与谢导、白先勇商量去威尼斯拍片的事，直至深夜。这就是潘虹，这就是中国演员的人品和艺品。对此，差不多有同样经历的黄慧芬的扮演者李克纯说过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去年酷暑炎夏我们在上海瑞金宾馆拍少女戏，都带了头套，又加上室内照明高温，又闷又热，偏偏我又得了急性胆囊炎，不停地吐，几天内不能吃东西靠输液维持，虚弱无力恍恍惚惚，却还要装作天真的少女。热的折磨过去后在美国又尝到了极冷的考验。当时纽约正值寒冬季节，我们需要拍夏天戏。当

游艇在大西洋上向自由女神驰近时，迎着扑面寒风，我们穿的无袖旗袍形同虚设，瑟瑟发抖偏要故作凉爽。当镜头结束时，眼泪刷地一下流下来，我感觉冷到极点那不是冷是疼，就像鞭子抽打上刑一样，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我流的不是伤心的泪，而是激奋的泪，内心没有任何抱怨和委屈。在瑞士虽然物质文明水平很高，我还是觉得空虚，而这到处奔波吃苦，不稳定的生活却使我内心感到充实。”

就在这没完没了的折腾中，《最后的贵族》终于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镜头，但谢晋原本胖胖的脸，仿佛成比例似的，也在一圈一圈地瘦下去，他的那双隐藏在镜片后面的睿智的眼睛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天总是红红的，仿佛有烈焰在燃烧。

《大师谢晋》 谢晋大骂潘虹“混蛋”（1）

五、谢晋大骂潘虹“混蛋”

不错，从踏上美国的第一天起，谢晋的心情就一天也没有顺畅过，在这个陌生的国家里，令他生气发怒的事情太多了，但他都咬咬牙忍住了。因为这次来美国，他不是来这里当电影节评委，可以比较超脱地和外国的导演去争执、去辩论，甚至去争吵。他到这里来是拍戏的，他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人，一个需要到处求人看人眼色并且处处碰壁的人，这使他在心理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受不了，的确受不了，他一辈子很少受过这种窝囊气。特别是听到与他合作多年的周鼎文的签证一直被美国人卡着不批下来时，他愤怒得简直要爆炸了。这一天，他终于找到了爆炸的突口，他把多日来积聚起来的各种各样的不快、恼怒、怨气汇聚成一股愤怒的火，一股脑儿地喷泻了出来。

但他喷泻的对象并不是美国人，而是摄制组里的自己人，起因也并不是什么大事情，而是一件很偶然的小事情，或者可以说是一场误会引起的。

那天，在“绿园跳舞”一场戏的排练前，谢晋安排部分剧组人员去商场购物，也算是见缝插针吧。但在购物当中，大家都走散了，于是就你等我，我等你。没想到把时间给耽误了。谢晋是个时间观念很强的人，那天他早等在“绿园”的排练场，看见大家大包小包地把东西从车上拎下来，他的脸僵着，难看得吓人。购物回来的演员们一见谢晋这脸色，早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便一个个溜进排练场。大家知道，这个时候，最好乖乖地坐在角落里，别让谢晋看见就好了。

排练开始了，先排练潘虹(即李彤)与英达（即周大庆）的对舞。来美国后，谢晋专门花钱给他俩找了一位职业舞蹈教师。不知道是没有交代清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那个舞蹈教师教的只是恰恰舞的基本舞步，而不是按剧情要求体现出李彤的疯狂情绪来。

谢晋一见他俩老半天只是一拐一拐地你进我退，毫无表情，根本体现不出疯狂的舞姿来，火就腾腾地上来了，还好，他总算克制住了。

这时候，在场的副导演武珍年见潘虹和英达进入不了状态，就拉了旁边的毛永明到了舞池中，两人也学起恰恰舞，他们的意愿是想帮两位演员找感觉，同时也想弥补一下刚才迟到的失职。谁知谢晋不吃那一套，见武珍年拉着毛永明也在学跳舞，便再也克制不住了，大骂道："连副导演都在凑热闹，这样的舞步怎么拍，明天就要拍了，只有三天，又不能像国内那样停下来让你们去学。"谁知英达不了解谢晋的个性，他还想辩白几句，没想越是辩白，谢晋火气越大，最后竟气得跺起脚来，又挥拳，又大吼，而当他的愤怒目光触到潘虹的脸上时，他便把那腔怒火一股脑儿向她泻了下去："潘虹，你舞没学好，还迟到，混蛋，都是混蛋。"

被谢晋的怒吼吓坏了的潘虹脸色煞白，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她是一个性格内向而又心肠很软的人，从她与谢晋相识至今，她从来也没见过谢导发这么大的火。她知道谢导心里难受，他今天向大家发火，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因此，尽管刚才购物的迟到与她毫无关系，她是准时登车的，虽然心里颇感委屈，但她还是忍住了。她想，只要谢导心里痛快些，他要发火，就让他去发吧。

这天晚上，自知误伤了许多人的谢晋，在排练结束后，像小孩子犯了错误似的悄悄地躲入了自己的房间。不仅羞于下楼泡茶，甚至不好意思与大家共进晚餐。制片主任毕立奎见状，便出来打了圆场，并叫谢晋拿出一瓶茅台酒来，供大家共饮消气。大家也就下了台阶。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时间一长，大家也就淡忘了，但谢晋却把这件事一直记在心头，在一次摄制组的总结会上，他要所有的人都来参加，一个也不能漏掉，大家以为又要听他的"指示"，谁知会议一开始，他就用略带温柔而伤感的语调说："这次出来，我发了不少脾气，伤了不少同志，请大家原谅……"

他这番开场白，使大家顿觉愕然，场内一片沉默。是啊，还能说什么呢，大家谁不了解谢晋，他是因为急，因为被逼得没办法了，才将无名火发泄出来的。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头，严是严了点，可他严得有道理，严在点子上。这比目前一些临时拼凑起来的散散漫漫的摄制组，真是有天壤之别了。

《大师谢晋》 谢晋大骂潘虹“混蛋”（2）

但话又说回来，《最后的贵族》在美国拍片时的磕磕碰碰虽很多，但顺利的地方也不少。这当然要得益于谢晋的朋友多，这些朋友中，有些是老朋友，如卢燕、白先勇、董鼎山、林青霞等等，有些则是新朋友。他们总是尽所能地来帮助谢晋拍好片，而这种鼎力相助，是没有任何金钱关系的。因此也就显得更加的珍贵。比如美籍华人作家董鼎山先生，他不仅要为摄制组的事在美国有关部门跑来跑去通路子，还常邀请谢晋和有关演员到他家里去作客。摄制组在美国拍片时，正好遇到了元旦，他就亲自上门把摄制组全体人员请到他家去过年，他的瑞典太太专门烧了可口的瑞典菜，为大家打牙祭。

林青霞也在这段时间里来看望过大家，那天她穿着一套黑色的上衣、黑色的裙子和黑色的大髦，飘逸而潇洒，实足一个英俊的女公子。那天她突然来到了纽约的一间酒吧里，这是一间百年老酒吧，《最后的贵族》中男主人公陈寅与他从前的恋人李彤别后相会的一场戏正在这里拍摄。林青霞见到了潘虹，并且上去紧紧地拥抱了她，潘虹那天穿着一件白色的套裙，她们两人拥抱时，黑、白相间的服饰在两人灵动的身躯相拥时，紧紧地交融在一起，成为一种十分显眼而和谐的组合色。从林青霞那双充满艺术灵气的眼睛中，看得出她在感谢潘虹，因为毕竟在她突然宣布不饰李彤一角时，潘虹顶替了她，从而没有给影片造成太大的损失。同时，她似乎又在深深地祝福潘虹，因为李彤这个角色很难演，但潘虹却给她演活了，而正因为如此，林青霞似乎也有点“眼热”，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嫉妒。但她并没有把这种嫉妒流露在脸上，而流露在她脸上的仍然是那深深的歉意和祝愿。她拉着谢晋的手说：“我从华盛顿来，布什就职典礼一完就来，我一定要来，看看你们也好，你们需要支持。我就算个支持吧。”

林青霞说完就匆匆地走了，她虽然没有在银幕上留下影迹，但她那颗真诚而热情的心却留下来了，望着她那远去的身影，大家都不免

感到有些惋惜。

春节以后，《最后的贵族》在完成了上海的40%的景和美国纽约的50%的景之后，接下来就要去威尼斯拍剩下的10%的景。当时，摄制组就在纽约分成了两支队伍，一支由谢晋带队，率有关的人员移师威尼斯，不过这支队伍人员并不多，因为那里拍的景相对要少一些。另一支队伍由副导演武珍年带队，先期回国。由于与谢晋长期合作的剪辑师周鼎文的签证被无故卡住，造成他不能如期赴美，因此，武珍年回到上海，在后期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1989年3月初的一天，在摄制组移师加州拍完了一组外景之后，《最后的贵族》两路人便各奔东西。在送走了武珍年带队的一路人马回国后，谢晋也当即搭机来到了意大利，与他同行的有潘虹及摄影师卢俊福等人。他们在威尼斯要拍的镜头并不多，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女主人公李彤就要在这里完成她最后的归宿。

由于经费的原因，也因为3月中旬要和潘虹一起参加全国政协全委会，谢晋这次来意大利只能呆两周时间，在威尼斯也至多呆一星期时间。时间虽然短，但对谢晋来说却是终生难忘的。因为他不仅在这里拍完了许多他想拍的满意的镜头，还在这里拜见了那个他非常崇拜又一直渴望见到的曾影响了他创作的人，这个人是他在几十年前就认识了，但又从未谋过面的德•桑蒂斯。对于这次会见，作者罗君在一篇题为《相见恨晚》的文章中做过这样的记述：初春的夜晚，意大利威尼斯这座富有魅力的“水城”休憩在无数星星的俯视之下，远离城郊一个古堡式的小镇上，谢晋走进一幢艺术气味浓烈的别墅，这里住着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创始人，影片《罗马十一点》的导演，80高龄的老人德•桑蒂斯。

在布满雕塑、绘画的客厅里，德•桑蒂斯老人从他珍藏的一大堆照片中，抽出两张1952年访问中国时的照片，谢晋俯身细看，一张是在中南海，桑蒂斯与周总理、郭沫若、茅盾、周扬等谈笑风生，一张是桑蒂斯和汪洋、蔡楚生、史东山在北影厂。老人沉浸在幸

福的回忆里，关切地问起朋友们的近况。谢晋告诉他：周总理、茅盾、郭沫若、蔡楚生、史东山都作古了。老人频频点头，他也告诉谢晋，你还想看望的《偷自行车的人》的导演德•西卡也不在人间了。

为了缓和情绪，谢晋转换了话题，谈到老人拍摄的影片《橄榄树下无和平》《艰辛的米》《罗马十一点》等片，50年代在中国放映时，整整影响了一代观众，他告诉老人自己也是他的“忠实信徒”，在年轻的时候，《罗马十一点》看了十遍，写下了20万字看片札记，从人物性格到影片节奏，从布光的运用到服饰道具，都进行细微的品味和仔细咀嚼。这些札记“文革”中被抄走，前几年才找到并已整理出版。

在这次会见中，谢晋与德•桑蒂斯还探讨了意大利电影由辉煌到衰落的缘由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中所遇到的问题等，两位在东西方有巨大影响的艺术家谈得十分投机，直至黎明将近，谢晋才恋恋不舍地告辞。

1989年的春天终于来临了。不过，这个春天对于谢晋来说，是在不知不觉中体味到的，因为无论在美国的纽约，还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他们都是在严寒酷冬中度过的。在那样的季节里，他们无法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只有在回到祖国之后，在回到了脚下这块熟悉的土地上的时候，他才猛然发现，原来春天已经来了。